RUSSIAN STUDIES

俄罗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6 年　第 5 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音序排列）

主　任

冯绍雷　何建华　翟　崑

委　员

毕洪业　邓　浩　丁晓星　费海汀　封　帅

宫　楠　顾　炜　郭丽双　郭培清　胡　键

胡志丁　黄琪轩　江天骄　匡增军　李开盛

李自国　梁　强　刘军梅　刘　莹　鲁传颖

马　斌　马　强　庞大鹏　曲文轶　施　越

苏　畅　孙　超　孙德刚　汪诗明　杨攻研

殷之光　尹如玉　曾向红　张　建　张　昕

章永乐　赵可金　赵　隆　赵宁宁　郑春荣

俄羅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习近平外交思想

4 凌胜利 / 东北亚国际格局与中国周边外交

国际组织

13 张建平　董建业 /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合作的功能比较

大国关系

34 于　滨 / 美国国际研究学会 2026 年会侧记——兼论国关/地区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66 赵雅婷 / 非洲政治格局中全球大国、地区大国与关键国家的互动逻辑研究

94 张　建　杨　润 / 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法国与俄罗斯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的博弈

俄罗斯经济

118 姜振军　亢艺颖 / 全球粮食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及其对中俄粮食安全合作的影响

153 俄文摘要

160 英文摘要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刘　军
副 主 编：陈大维　肖辉忠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6 年 10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6 年第 5 期（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Лин Шэнл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 политика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Китая ……（4）
Чжан Цзяньпин, Дун Цзянье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АТЭС, инициативы «Пояс и путь» и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13）
Юй Бинь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ежегодном конгрессе Ассоци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ША 2026 года: о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34）
Чжао Яти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логик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глобальны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держав, а также ключев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ландшафте Африки ……（66）
Чжан Цзянь, Ян Жунь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Франции и России в секторе критически важных минералов в Африке на фоне реструктуризации глобальных цепочек поставок……（94）
Цзян Чжэньцзюнь, Кан Иин
Нов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труктуре мировой торговли зерном и их влияние на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фере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18）

Аннотации……（153）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6 年第 5 期（双月刊）

Contents

Ling Shengli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in Northeast Asia and Chin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4）
Zhang Jianping, Dong Jianye
The APEC,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Eur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A Functional Comparison……（13）
Yu Bin
The 2026 ISA Convention: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 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rea Studies……（34）
Zhao Yating
The Logic of Interaction among Global Powers, Regional Powers, and Key States in Africa's Political Landscape ……（66）
Zhang Jian, Yang Run
France-Russia Competition over Critical Minerals in Africa amid the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Supply Chains……（94）
Jiang Zhenjun, Kang Yiying
New Changes in the Global Food Trade Landscape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hina-Russia Food Security Cooperation ……（118）

Abstracts……（160）

习近平外交思想

东北亚国际格局与中国周边外交

凌胜利*

【内容提要】“十五五”时期，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极为重要。东北亚地区因大国林立、热点交织、阵营对抗等原因，对中国周边外交构成重要挑战。对此，我们应该客观审慎研判东北亚地区战略环境，合理规划东北亚外交目标，明确界定东北亚地区利益，采取合适的战略手段，实现中国东北亚外交的科学谋划与精准实施。

【关键词】东北亚地区　周边外交　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4.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5-0004(9)

“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①]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面临着深刻复杂的变化，周边地区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在东北亚地区，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尤为突出，也使得加强东北亚外交谋划尤为重要。

一、东北亚地区战略环境分析

伴随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各国内政外交的调整，东北亚战略环境呈现大国博弈复杂、地区合作受限、热点问题交织的复杂态势。

一是东北亚地区大国林立，彼此之间的博弈错综复杂。在东北亚地区，存在中美俄日等大国，大国关系的演变成为影响东北亚地区环境的重要变量。

* 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政府网，2026 年 3 月 13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

中美战略博弈持续存在，两国在东北亚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引起的权力转移态势，使得美国将中国视为在东北亚地区的首要战略竞争者。[①]在美国确立的“竞赢中国”的目标导向下，中美战略竞争是影响东北亚战略环境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②]中日关系近年来竞争加剧，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推行激进政策，导致中日战略分歧增加，双边关系下滑明显。美俄战略竞争重心虽在欧洲地区，但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双方在东北亚地区的博弈。美俄关系虽有所缓和，但是结构性矛盾并未解决，其战略博弈仍将延续。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关系而言，一方面是部分大国内政外交的不确定性增强，导致大国关系更具挑战性。如特朗普 2.0 政府继续基于“美国优先”政策导向，对东北亚地区相对忽视，其“交易主义”思维主导对外政策日益明显，致使该地区主要大国的博弈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大国博弈加剧导致东北亚阵营对抗风险增加。基于大国竞争考虑，美国近年来不断强化美日韩三边合作，使得其在东北亚地区的“联盟化”态势更加明显。与此同时，俄朝关系也不断加强，形成与美日韩阵营的对抗态势，地区阵营对抗的风险有所增加。[③]可以预计，“十五五”期间，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博弈态势依旧，中国应统筹大国关系，避免阵营对抗加剧，塑造相对有利的东北亚地区环境。

二是地区合作受限因素较多，东北亚地区合作机制化面临较大困难。纵观中国周边地区，东北亚地区的合作机制建设明显落后。在合作机制建设层面，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长期供给不足，现有多边框架的功能性与包容性偏弱，域内国家政治互信匮乏直接制约了区域机制建构进程。[④]在安全领域，受政治互信、领土主权争端、历史恩怨等因素影响，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比较少见，更缺乏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地区安全机制。在经贸领域，美西方国家通过推动产业链“在岸化”、“近岸化”和“友岸化”布局，促使全球价

① 祁怀高、李开盛：“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预测分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9 页。
② 周方银：“‘十五五’时期中国周边环境展望及应对策略”，《国际展望》，2026 年第 2 期，第 7 页。
③ 张蕴岭、朱峰、樊小菊：“百年大变局下的东北亚之变”，《东北亚学刊》，2025 年第 2 期，第 1-14 页。
④ 巴殿君、王振彬：“百年变局下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新变化”，《东北亚论坛》，2025 年第 1 期，第 33 页。

值链加速区域化与阵营化。[①]经贸合作的政治化、安全化加剧，导致中日韩经贸合作制度化深受冲击。总之，近年来东北亚地区合作机制进展有限，难以大幅减少合作的交易成本，也使得地区合作严重受限。

三是地区热点问题多发，东北亚地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较强。东北亚地区热点问题呈现多点交织、新旧叠加的复杂态势。朝核问题长期影响东北亚地区安全，尽管此前东北亚各国通过六方会谈等方式尝试解决，但由于美朝互信严重不足等原因而效果有限。当前随着朝鲜核导能力增强和美韩对朝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朝核问题解决将更为困难。钓鱼岛争端对中日关系持续产生影响，随着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更加明显，并积极拉拢美国介入钓鱼岛争端，使得该问题更趋复杂。与此同时，日韩之间的历史认知与领土争端也长期存在，受国内政党和民众意愿影响，日韩之间的分歧不时发酵，成为美日韩三边合作的明显短板。总体来看，东北亚地区各类热点问题悬而未决且不乏关联，构成了“十五五”时期东北亚安全的重要挑战。

二、中国东北亚外交的主要目标

“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②]基于中国主要战略目标设计，结合东北亚地区战略环境分析，需要合理制定中国东北亚外交的主要目标，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维度进行统筹规划。

政治维度的主要目标，是尽力维持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缓解阵营对抗风险，塑造相对睦邻友好的地区环境。“十五五”规划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③]。“十

① 王健：“聚焦‘十五五’：关键时期的外部环境与更有作为的大国外交”，《太平洋学报》，2026 年第 1 期，第 5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政府网，2026 年 3 月 13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
③ 同上。

五五”时期周边外交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命运与共的理念巩固战略互信，支持地区国家走稳自主发展道路，在政治方面避免地区滑向阵营对抗。[①]具体而言，维护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发展极为重要。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发展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基础，也是运筹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的关键抓手。中俄双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凝聚共识，可以为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中美关系的走向对于东北亚地区极为重要，中美元首会晤达成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谋求推动中美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不过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及其不确定性，维持中美战略稳定关系仍需双方共同努力。对于日韩等国，也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管控分歧、加强协调，既要在涉及核心利益问题上体现坚定意志，也要基于战略全局和长远眼光，推动与日韩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

经济维度主要目标是推动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加强地区供应链产业链韧性。回顾以往，中日韩经贸合作是东北亚地区合作的重要积极因素。近年来，由于中日韩产业结构在高科技领域日益接近，加上美国推动供应链产业链脱钩断链，使得中日韩经贸合作面临较大挑战。“十五五”期间，加强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依然是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十五五”规划指出，将“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②]东北亚地区作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试验场，需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区域经济循环的自主性。[③]针对东北亚经济发展态势，需要在增强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加强互联互通，推动供应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增强东北亚区域内部的经贸合作自主性，以共同发展促进共同安全。

① “奋力开创‘十五五’时期外交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26 年 1 月 26 日，第 3 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政府网，2026 年 3 月 13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

③ 王蕴、姚秋蕙：“扩大自主开放的科学内涵、重点方向和推进路径”，《新视野》，2025 年第 6 期，第 23-31 页。

安全维度的主要目标是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突破传统安全困境，塑造相对稳定的地区安全秩序。有学者指出，“十五五”期间，国家安全工作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作为重大战略任务，东北亚安全治理需超越零和博弈逻辑，在开放条件下实现高水平安全，避免安全议题泛政治化。[①]“十五五”规划特别强调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在传统安全之外愈加重视防范粮食安全、资源安全和网络安全等系统重要性领域的安全风险。[②]基于此，“十五五”期间，在东北亚地区要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促进热点问题降温，减少东北亚地区安全风险，使得该地区的安全矛盾可控，安全机制建设能够有所发展。面对区域安全复杂局势，中国要秉持“以和为贵”的理念，重视周边睦邻友好的价值，积极构建多元化沟通渠道，拓展各领域安全合作，避免东北亚地区生战生乱。

三、中国东北亚地区利益分析

近年来，周边地区的战略价值日益提升，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十五五”时期，经略周边尤为关键，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也意味着周边地区的利益界定需要清晰有序。

一是政治维度的国家利益。其一是确保大国关系总体稳定。东北亚地区战略环境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大国关系错综复杂且博弈加剧，大国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环境。中国与俄美两个世界大国保持良好稳定的关系极为重要。中俄关系是当今世界大国关系和邻国关系的典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不断走实走深，是中国东北亚战略运筹的重要基础。中美关系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当前中美双方已经就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但其仍需双方相向而行，妥善处理战略分歧、管控战略竞争，避免擦枪走火。其二是巩固中朝传统友谊。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新时期新形势下，中朝继续加强战略沟

① 唐永胜：“在世界变局中赢得国家安全战略主动”，《国家安全研究》，2026 年第 2 期，第 54-57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政府网，2026 年 3 月 13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

通、深化友好合作，对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大政治意义。[①]其三是维持中韩关系的良好态势。中韩两国在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全球发展方面肩负重要责任，有着广泛利益交集，两国长期坚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以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互成就，共同发展。[②]尽管尹锡悦执政时期两国关系遭受冲击，但过去十年，中韩关系总体态势不错。中韩关系的良好发展对于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极为重要，既可以合作缓解安全局势，也可以携手促进经贸合作。其四是中日关系斗而不破。日本右翼势力政治影响有所增强，导致其内政外交发生明显转变。日本对美战略追随更加紧密，对华战略竞争更加明显。尽管“十五五”期间，中日关系转圜空间不大，但避免竞争失控仍十分重要。

二是经济维度的国家利益。尽管东北亚地区经贸合作进展有限，但推动该地区的经贸合作仍是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利益。其一是加强东北亚地区的供应链产业链韧性，避免脱钩断链酿成系统性负面影响。回顾以往，中日韩经贸合作对于地区合作的积极影响显而易见。中日韩之间的经贸合作规模依然较大，如能正确处理经贸矛盾，增强供应链产业链合作的制度化保障，无疑对地区各国都相对有利。其二是促进东北振兴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良性互动。多年来，党和国家都将东北振兴视为中国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使命，然而受制于东北亚地区外部环境，东北振兴的潜能并未充分释放，发展速度也相对偏慢。统筹新发展格局与新安全格局在东北地区面临的挑战较大，其中促进东北振兴和东北亚合作的良性互动是必由之路。其三是加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化建设。尽管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发展缓慢，但是东北亚区域经贸合作机制建设可以化整为零，在诸如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物流通道等领域加强合作，尽可能提升东北亚地区经贸合作的机制化水平。

三是安全维度的国家利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极为重要，也是“十五五”期间中国东北亚外交的底线所在。其一是要避免东北亚地区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东北亚地区热点问题频发，历史恩怨难解，现实矛盾重重，导

① “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中国政府网，2026 年 6 月 8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6/content_7071413.htm

②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6 年 1 月 5 日，https://www.mfa. gov.cn/web/zyxw/202601/t20260105_11806708.shtml

致该地区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长期存在。一旦生战生乱，东北亚各国都会牵连其中，承担军事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二是要加强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建设，围绕危机管控、军事交流、热线电话等加强机制建设，通过双边和多边等多种安全机制建设，切实增强东北亚地区的风险防范和安全保障。其三是促进地区热点问题的管控和降温。东北亚地区热点问题较多，且容易引发地区局势紧张升级，严重影响地区合作总体进程。对地区热点进行管控和降温，倡导优先采取政治解决方式，有助于减少阵营对抗的风险。

四、中国东北亚外交的主要手段

面对东北亚地区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基于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目标设定和战略利益分析，中国应务实采取各种手段，不断增强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外交影响。

一是不断加强高层沟通，谋求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国家间关系走向对于东北亚地区形势的影响至关重要。与美俄两个世界大国保持稳定关系，有助于“十五五”期间东北亚地区形势的总体稳定。俄罗斯远东政策虽为中俄合作提供契机，但受西方制裁导致的产业能力下滑、跨境结算不畅等问题，使得俄罗斯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仍然不容乐观。[①]要通过元首外交等高层沟通，不断促进中俄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密切合作，拓展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共同利益，促进双方在东北亚地区的政策协调更加系统有效。面临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分化的复杂趋势，以及美国国内对华政治生态的恶化，促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非易事，需要从高层交往、分歧管控、对话协商等多方面共同努力。

二是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制度型开放，增强供应链产业链韧性。“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这彰显了中国持续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坚定立场。[②]对于东北亚地

① 李勇慧：“俄乌冲突下俄罗斯亚太外交政策新变化与新挑战”，《东北亚学刊》，2023 年第 1 期，第 105 页。

② Yanliang Li, Haibin Niu, Liansheng Cai, “China’s Vision for Universally Beneficial and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Insights from the 15th Five-Year Plan Recommendations”, December 2025, https://www.siis.org.cn/updates/cms/cm s/202512/04102016b753.pdf

区经贸合作，同样也要重视制度型开放的价值。为此，既要推动东北亚各国在经贸合作领域的制度建设，又要为资源、产品、技术、人才等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提供规则保障。针对东北亚地区供应链调整，可以利用中日韩在全球供应链中存在枢纽与节点的互补关系，加强供应链政策协调，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共同应对外部供应链“泛安全化”冲击，维护区域产业链稳定。①

三是加强东北亚地区互联互通建设，促进东北振兴与东北亚合作的良性互动。冷战结束后，有关东北亚地区合作出现过多种设想，其中互联互通建设尤为重要。“大图们江计划”、“冰上丝绸之路”、“中蒙俄经济走廊”、“东亚铁路共同体 EARC”等计划，都重视口岸、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加强本地区的互联互通，更为有效地发挥陆海联通的作用，从而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与共同繁荣。除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日益重要。加强东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既需要各国政治互信增强、经济依赖加深等积极因素的共同推动，也需要稳定的安全环境和长期的资源投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先易后难推进一些重要口岸、港口、物流通道建设，为东北亚地区经贸合作提供更为便利的物流条件。从统筹东北振兴和东北亚合作角度考虑，加强东北地区的边境口岸、交通枢纽建设，能够更好地推动东北亚地区互联互通，促进东北振兴和东北亚合作的良性互动。

四是加强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营造总体稳定的外部环境。东北亚地区合作的最大短板是安全风险较高，且对地区政治互信、经济合作负面影响显著。“十五五”时期的国家安全是对国家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全面维护，必须要在安全中谋求发展，在发展中巩固安全。②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是中国东北亚外交的重要目标，关键是要促进大国战略稳定、热点问题可控、安全机制建设增强。通过大国协调、危机管控、热线电话等诸多举措，不断促进东北亚安全局势缓和，从而实现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的战略协同。

① 金香丹：“‘特朗普冲击’下的日韩‘泛安全化’供应链政策困境与中日韩合作”，《东北亚论坛》，2025 年第 6 期，第 110–124 页。

② 唐永胜：“在世界变局中赢得国家安全战略主动”，《国家安全研究》，2026 年第 2 期，第 55 页。

五是促进东北亚地区人文交流，厚植社会民意基础。人文交流有助于夯实社会民意基础，促进东北亚国家间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近年来，日韩两国民间对华认知的负面看法都有所增加，也影响了中国与日韩两国关系的发展。东北亚各国之间由于历史恩怨、地缘政治等因素，民间负面认知长期存在，且容易因民族主义情绪激化等影响各国之间的交往。今后要加大东北亚各国的人文交流，特别是媒体、高校、青年、智库之间的交流，增进彼此的相互了解，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厚植东北亚各国友好交往的社会民意基础。

五、结　语

“十五五”时期，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对中国周边外交极为重要。对于中国东北亚外交而言，还面临着各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区域合作内生动力不强、安全与发展统筹困难等挑战，需要妥善应对。近年来，美日韩三国内政变动带来了对外政策的大幅调整，给东北亚地区合作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外交“内政化”，其对外政策的调整会引发日韩的连锁反应，使得东北亚各国关系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区域合作内生动力不足，是东北亚经贸发展面临的长期困境。尽管东北亚各国的经贸合作存在共同利益需求，但由于政治、安全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区域合作内生动力不足，严重地影响了区域合作机制建设。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是中国东北亚外交面临的难题，安全合作的短板严重制约了经贸合作的拓展与深化。相比于中亚、东南亚等次区域，东北亚次区域难以形成经济与安全两轮驱动效应，制约了安全与发展的统筹。总之，“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加强中国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极为重要。东北亚地区优势与劣势都非常明显，中国需要趋利避害，着力营造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推动东北亚地区共同发展。

（**责任编辑**　宋羽竹）

国际组织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合作的功能比较*

张建平　董建业**

【内容提要】俄罗斯“转向东方”进程加快，全球经贸格局区域化和碎片化及欧亚大陆通道体系重组，使中俄经贸合作制度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中俄合作已不宜仅从双边贸易增长或制裁压力下短期替代来理解，而应放在多层次区域合作框架中考察。本文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合作为对象，讨论中俄经贸合作如何嵌入不同层次的区域机制。文章认为，三类机制具有不同功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提供开放亚太、政策沟通和低敏感经济技术合作的辅助窗口；“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能源、产业链、口岸和地方合作，提供项目和通道工具；欧亚经济合作则以大陆通道、区域市场、第三方国家参与和规则接口为基础，构成更具制度含义的合作空间。本文的贡献在于，从“窗口-工具-空间”的功能分工解释中俄经贸合作的区域机制嵌入，而不是单独评价某一机制或重复描述贸易增长。未来应在通道、口岸、标准、支付、产业链和第三方国家参与机制上推进机制性对接，以降低对单一金融、技术和市场体系的脆弱依赖，缓释地缘经济碎片化和外部经济胁迫带来的不确定性，并提升欧亚大陆经济联系的韧性、包容性和制度可解释性，同时兼顾地方发展、企业合规与风险治理。

【关键词】中俄经贸合作　“一带一路”　欧亚经济合作　APEC　区域机制嵌入

【中图分类号】D814.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5-0013(21)

* 本文受到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前瞻报告项目资助。

** 张建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董建业，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产业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国际经贸秩序的运行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全球化并未终结，但贸易、投资、金融、技术和供应链安排日益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国际经济联系中的安全化、区域化和阵营化倾向明显上升。WTO《2023 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相较于进一步碎片化，更具开放性、分散性和包容性的“再全球化”更有助于提升世界经济的安全性和韧性。[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于地缘经济碎片化的研究也指出，贸易、金融和技术体系按政治阵营分裂，将导致福利损失并削弱多边主义。[②]

在这一背景下，中俄经贸合作的意义也需要重新理解。它既不是单纯的双边贸易增长，也不宜被简化为外部制裁压力下的短期替代安排。随着俄罗斯战略上“转向东方”进程加快、欧亚大陆通道体系重组以及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方式的持续调整，中俄经贸合作越来越多地嵌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一带一路”、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多层次区域、次区域合作框架中，逐渐形成系统性与机制性合作。不同合作框架具有不同制度属性和功能边界：APEC 更侧重开放亚太和非约束性政策沟通，“一带一路”更强调战略与规划对接、互联互通和项目合作，欧亚经济合作则更接近大陆通道、区域市场和规则接口的复合空间。因此，如何理解这些合作框架之间的功能分工及其衔接关系，便成为分析中俄经贸合作的现实基础、制度约束和未来路径的重要前提。

一、问题的提出：俄罗斯“转向东方”与中俄经贸合作的区域化

中俄经贸关系在近十余年经历了显著变化。传统上，两国贸易以能源、原材料、机电产品、农产品和边境小额贸易为主要内容，合作逻辑更多体现为资源禀赋互补和地缘相邻便利。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面向东方的经济转向明显加快；2022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美对俄金融、能源、技术、运输和投资领域制裁全面强化，俄罗斯外部经济联系被迫重组，中俄

①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ld Trade Report 2023: Re-globalization for a Secur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Future*, Geneva: WTO, 2023, pp.6-8.
② Shekhar Aiyar et al., Geoeconomic Fragmen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Multilateralism,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2023.

经贸合作随之具有更强的制度和战略含义。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23 年中俄贸易额达到约 240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24 年又升至约 2450 亿美元，2025 年则在高基数和支付、制裁压力下出现五年来首次下降，但仍保持在约 2340 亿美元量级，趋势向上。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6 年 1 月至 9 月，中俄双边贸易额为 2143.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6%，全年贸易额将创历史新高。这些变化说明，中俄合作已经从“量的扩张”进入到更加重视结构、通道和制度韧性的阶段。

如果沿用单纯双边贸易视角，上述变化容易被理解为制裁压力下的贸易转向；但若放在俄罗斯“转向东方”的长期演进中观察，中俄经贸合作的制度含义会更加清晰。俄罗斯“转向东方”，最初带有较强的外交和地缘经济色彩，重点在于通过亚太市场平衡对欧洲的依赖，并以远东开发带动国家经济现代化。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一转向不再只是外部压力下的临时调整，而逐渐同俄罗斯国内发展空间重组、欧亚大陆秩序想象和对外经济联系再配置相结合。

这一变化要求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双边贸易额、能源合同或单个项目层面。更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俄罗斯“转向东方”不断深化、欧亚大陆通道体系持续调整、外部经济压力明显上升的背景下，哪些区域合作框架能够为中俄经贸合作提供较为稳定、包容和可操作的制度支撑？

2012 年俄罗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举办了 APEC 领导人峰会。当年春天，笔者作为 APEC 国际专家小组成员之一，受俄罗斯政府邀请，与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的专家一起，曾在莫斯科白宫总理府就俄罗斯如何参与亚太合作向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提供专家咨询意见。笔者建议俄罗斯加快“转向东方”战略实施，特别是加强与中国合作，共同参与 APEC 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带动俄罗斯经济结构转型。但那时俄罗斯自认为是欧洲大国，奉行东西方平衡战略。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爆发打醒了俄罗斯，之后俄罗斯通过主动对接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欧亚大陆合作等举措加快转向东方。

相关研究首先注意到，俄罗斯“转向东方”并非单纯的外交方向调整，而是同国家战略、远东开发、亚太参与、能源出口方向变化以及欧亚大陆秩

序想象密切相关。崔珩、付兴旸将这一变化概括为俄罗斯“转向东方 2.0”，强调其已从外交政策层面的东方选择，扩展为以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全产业链合作以及欧亚大陆秩序重塑为内容的国家战略。[①]关于俄罗斯参与 APEC 和亚太经济合作的研究也表明，俄罗斯希望借助亚太市场、资本和技术改善远东地区发展条件，但其能力受到产业基础、人口分布、交通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等因素约束。[②]

另一类研究主要从中俄经贸关系本身展开，关注能源合作、贸易结构、产业互补以及政治关系对经济合作的影响。[③]中俄经济合作长期具有较强的资源互补特征，能源贸易构成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和中国企业参与程度提高，双方合作逐渐从能源领域向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农业、数字经济和地方合作延伸。不过，相关研究也注意到，中俄经贸合作仍面临结构不平衡、产业链嵌入不足、金融结算不畅、物流成本上升和企业预期不稳定等问题。[④]由此可见，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双边政治关系，也受到更广泛区域制度环境和市场条件的影响。

围绕“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研究，则更多关注中国倡议与俄罗斯欧亚区域安排之间的协调、互补和张力。[⑤]“一带一路”强调互联互通、贸易便利化和发展合作，欧亚经济联盟则更重视区域市场整合、规则协调和俄罗斯在欧亚空间中的制度地位。二者之间既存在合作基础，也存在制度定位、发展目标和参与主体的差异。随着中俄在能源、交通、物流和地方

① 崔珩、付兴旸：“俄罗斯‘转向东方 2.0’与‘一带一路’的互动合作前景”，《俄罗斯研究》，2026 年第 2 期，第 67–90 页。

② 王海滨：“目标与现实之间：论俄罗斯与亚太经合组织的经济合作”，《东北亚论坛》，2014 年第 4 期，第 95–108 页；Indra Overland, Gulaikhan Kubayeva, eds.,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Domestic Policymaking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Cham: Palgrave Pivot, 2018.

③ 李兴、韩燕红、陶克清：“‘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能源合作：成就、问题与对策”，《人文杂志》，2023 年第 4 期，第 66–76 页。

④ 陆南泉：“对新形势下中俄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23 年第 11 期，第 127–134 页；李兴、陶克清：“‘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政热经冷’说论析”，《人文杂志》，2025 年第 6 期，第 129–140 页。

⑤ 张建、杨瑞颐：“‘一带一盟’对接视域下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对‘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认知评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1 期，第 17–32 页。

合作领域联系加深，相关研究逐渐从宏观战略协调转向具体项目、口岸治理、通道建设和规则接口等问题。

也有研究把视角扩展到欧亚大陆通道、上海合作组织、中蒙俄经济走廊、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以及中亚、蒙古等第三方国家参与。[①]此类研究说明，欧亚合作并非单纯的中俄双边合作，而是涉及多国参与、多种机制并存和多条通道竞争互补的复合型区域过程。中欧班列、中蒙俄经济走廊、跨里海通道和北方航道等项目，使欧亚大陆经济联系呈现出多节点、多路径的发展趋势。[②]第三方国家的利益诉求、过境收益、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和规则协调意愿，都会影响中俄经贸合作的区域可持续性。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为理解俄罗斯“转向东方”、中俄经贸合作和欧亚区域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多数研究侧重单一合作机制、单一领域或双边关系本身，对 APEC、“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合作这三类区域合作框架之间的功能差异及其在中俄经贸合作中的分工关系关注不足。三者虽然均涉及亚太和欧亚区域经济联系，但制度属性、合作工具和空间功能并不相同。本文并非重新描述中俄贸易增长过程，也不单独评价某一合作机制的优劣，而是从“区域机制嵌入”的角度，比较不同合作框架在中俄经贸合作中的功能定位。

本文将三类框架概括为“窗口-工具-空间”的功能分工。APEC 是“窗口”，主要承担开放亚太、政策沟通和低敏感经济技术合作功能；“一带一路”是“工具”，主要承担基础设施、能源、产业链、口岸和地方合作的项目落地功能；欧亚经济合作是“空间”，主要承担大陆通道、区域市场、第三方国家参与和规则接口功能。通过这一分析，可以进一步解释，中俄经贸合作为何不能只从双边贸易增长或制裁替代角度理解，而应放在俄罗斯“转向东方”和欧亚区域秩序调整中加以考察。

① 胡伟、于书洋、葛岳静、刘峻峰、张建珍、胡渊：“中俄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联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经济地理》，2024 年第 5 期，第 1-11 页。

② 刘思琦：“高质量推进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宏观经济管理》，2024 年第 1 期，第 37-44 页；凯琳、魏力苏：“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问题、机遇及前景”，《云南社会科学》，2025 年第 3 期，第 48-58 页；焦一强、蒋存昊：“俄乌冲突下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动因、路径与实践”，《俄罗斯研究》，2025 年第 3 期，第 85-115 页。

表 1　三类区域合作框架的制度属性与功能分工

比较维度	APEC	“一带一路”	欧亚经济合作
机制属性	开放亚太论坛型机制，强调自愿、共识和非约束性合作	倡议型、项目型合作框架，强调互联互通和发展合作	复合型大陆经济合作空间，包含区域组织、运输走廊、地方合作和规则接口
地理指向	亚太区域	欧亚陆海通道，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北向通道	欧亚大陆腹地及其外延区域
主要合作工具	政策沟通、能力建设、经济技术合作、规则讨论	基础设施、能源、口岸、产业园区、物流和地方合作项目	海关、标准、运输走廊、区域市场、第三方国家参与和制度协调
对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意义	提供进入亚太经济治理的制度窗口	为远东开发、西伯利亚开发和能源出口转向提供项目抓手	为“大欧亚伙伴关系”和欧亚大陆战略自主提供空间依托
对中俄经贸合作的作用	提供开放区域主义话语和低敏感议题合作场景	推动合作从贸易增长转向通道、项目和产业链落地	降低区域交易成本，扩展第三方参与和规则接口
主要现实约束	非约束性强，难以处理制裁、支付和产业链等敏感议题	项目收益周期长，融资、支付和合规风险上升	国家利益差异较大，制度来源多元，协调成本较高
本文定位	辅助性制度窗口	主要项目工具	主要区域空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APEC 文件、“一带一路”白皮书、欧亚经济委员会资料及相关研究整理。

二、APEC：开放亚太的辅助平台及其局限

APEC 成立于 1989 年，是亚太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合作论坛之一。APEC 官方文件将其定位为利用亚太经济相互依存、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平台。其《布特拉加亚愿景 2040》提出，到 2040 年，

建设“开放、充满活力、有韧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并强调自由、开放、公平、非歧视、透明和可预期的贸易投资环境。[①]这种制度设计与中俄经贸合作中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目标是一致的。俄罗斯研究和欧亚区域研究中关于“转向东方”以及俄罗斯参与 APEC 的讨论表明，俄罗斯进入亚太经济网络并不只是外交姿态，也同远东开发、能源出口方向调整和对外经济联系再平衡有关。[②]对中国而言，APEC 是维护亚太开放经济秩序、反对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推进数字经济与供应链韧性议题的重要场域；对俄罗斯而言，APEC 曾是其“向东看”和远东开发战略进入亚太经济网络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在俄罗斯“转向东方”的早期阶段，APEC 的意义主要在于提供亚太身份和制度入口。俄罗斯加入 APEC 后，试图通过参与亚太经济治理，增强远东地区同亚太市场的联系，并在能源、交通和技术合作中扩大政策空间。2012 年符拉迪沃斯托克 APEC 会议也具有象征意义：它表明俄罗斯希望把远东从边缘地带转化为面向亚太的前沿地区。然而，APEC 能够提供的是开放区域主义的话语和低约束合作场景，而不是处理制裁、支付、投资保护和陆路通道建设的强制度工具。因而，在俄罗斯“转向东方 2.0”阶段，APEC 的角色有助于维持俄罗斯同亚太经济治理的联系，也有助于中俄在开放区域主义问题上形成一定政策呼应，但难以承担中俄经贸合作的主要制度功能。

然而，APEC 对当前中俄经贸合作的直接支撑作用有限。第一，APEC 的决策方式强调自愿和非约束性，适合首脑外交、政策沟通、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却较难在制裁、支付、能源运输和市场准入等敏感问题上形成可执行安排。第二，APEC 内部成员结构复杂，既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也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对俄制裁主要参与方。在俄罗斯受制裁的背景下，APEC 较难成为中俄规避金融封锁、扩大产业合作或协调欧亚大陆通

① “APEC Putrajaya Vision 2040”, 2020, https://www.apec.org/meeting-papers/leaders-declarations/2020/2020_aelm/annex-a

② 王海滨：“目标与现实之间：论俄罗斯与亚太经合组织的经济合作”，《东北亚论坛》2014 年第 4 期，第 95–108 页；崔珩、付兴旸：“俄罗斯‘转向东方 2.0’与‘一带一路’的互动合作前景”，《俄罗斯研究》，2026 年第 2 期，第 67–90 页；Indra Overland, Gulaikhan Kubayeva, eds.,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Domestic Policymaking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Cham: Palgrave Pivot, 2018.

道建设的主要平台。第三，近年来亚太经济议题与安全、技术和价值链重组议题深度交织，“友岸外包”、“去风险”和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治理等议题在 APEC 语境中不断上升。这些议题虽然以经济安全名义出现，但可能把开放区域主义转化为排他性供应链联盟。

从俄罗斯角度看，APEC 的吸引力长期同远东开发和亚太经济重心东移相关。俄罗斯加入 APEC 后，希望借助亚太市场、资本和技术促进远东地区发展，并提高自身在亚太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王海滨关于俄罗斯与 APEC 经济合作的研究指出，俄罗斯在 APEC 中既希望“搭乘”亚太经济增长的快车，也希望避免沦为单纯能源和原材料供应方。[①]这一判断在今天仍有相当的解释力。自 2014 年受制裁以来，俄罗斯对亚太市场的依赖有所增加，但其产业基础、交通基础设施、人口分布和投资环境并未随之迅速改善。换言之，俄罗斯需要亚太，但其进入亚太的能力并不只取决于外交意愿，还取决于远东港口、铁路、公路、能源加工、金融服务和地方营商环境等条件。

从中国角度看，APEC 的价值更多体现在维护开放区域主义话语和参与亚太规则讨论。中国与俄罗斯在 APEC 中可以就反对保护主义、维护 WTO 规则、支持供应链稳定和推进经济技术合作形成一定共识，但这类共识通常具有政策宣示和议题协调意义，难以直接转化为大型项目或制度性保护。尤其是在俄乌冲突后，涉俄议题在亚太多边场合容易被政治安全议程吸收，中俄如果试图把 APEC 作为处理制裁、支付或能源合作的主要平台，既不符合 APEC 的机制属性，也可能增加议题对抗性。因此，本文对其制度能力和现实约束作出相对审慎的评估。

因此，APEC 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窗口”功能，而非“承载”功能。它说明俄罗斯转向亚太并非始于俄乌冲突，也说明中俄在开放区域主义、贸易便利化、供应链韧性和经济技术合作等议题上仍具有一定共同语言。但当合作议题进入能源出口、进口替代、陆路通道、产业链重组、支付结算和合规金融等具体领域时，APEC 的制度约束力明显不足，合作重心自然转向更具项目落地能力的“一带一路”和更具大陆规则接口属性的欧亚经济合作。

① 王海滨：“目标与现实之间：论俄罗斯与亚太经合组织的经济合作”，《东北亚论坛》，2014 年第 4 期，第 95–108 页。

由此看，APEC 的局限并不意味着亚太方向对俄罗斯和中俄合作不重要，而是说明，当前中俄经贸合作的主要制度支撑更依赖项目型和大陆型机制。APEC 可以作为开放亚太的政策沟通平台和低敏感议题合作场域，但难以替代“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合作在通道建设、产业协作、地方合作和规则协调方面的功能。

三、“一带一路”：中俄经贸合作的通道、项目与发展叙事

在“窗口-工具-空间”的分析框架中，“一带一路”主要体现为中俄经贸合作的项目和通道工具。与 APEC 侧重政策沟通和开放区域主义话语不同，“一带一路”更强调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地方发展，能够把俄罗斯“转向东方”中的远东开发、能源出口、基础设施升级和进口替代需求转化为具体项目。国务院新闻办 2023 年白皮书将“一带一路”界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强调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①]其优势在于不以成员资格和排他性规则为前提，而是通过项目合作和发展需求对接形成网络。对于俄罗斯而言，这种倡议型合作的吸引力在于，它既能够同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面向亚洲市场的经济重组相衔接，也为其在外部限制增加的环境下调整对外经济联系提供了现实通道。

从空间结构看，中俄合作较直接嵌入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北向通道和中蒙俄经济走廊。2014 年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提出，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经济联盟和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相对接；2016 年三方签署《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意义不仅是改善交通条件，更在于把中国东北振兴、蒙古过境运输、俄罗斯远东开发和欧亚大陆桥联系起来。对中国东北而言，满洲里、绥芬河、黑河、珲春等口岸和跨境基础设施能够承接对俄贸易、物流、加工和服务功能；对俄罗斯远东而言，中国市场、资本品、工程能力和消费品供应有助于缓释其外部市场收缩压力。由此，“一

① 《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3 年 10 月 10 日。

带一路”的作用并非简单地承接中俄贸易增长，而是在俄罗斯国内空间开发和中国欧亚通道建设之间建立项目化接口。

从地理结构看，中俄合作较直接嵌入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北向通道和中蒙俄经济走廊。2016 年，中俄蒙三方签署《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该纲要也被视为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较早的多边合作规划之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意义不仅限于物理层面的改善交通条件，而是把中国东北振兴、蒙古过境运输、俄罗斯远东开发和欧亚大陆桥联系起来。

进一步看，“一带一路”对中俄经贸合作的意义亦不仅限于提供贸易路线，更在于把空间相邻转化为制度化连接。尽管中俄边境线漫长，但并不等同于高质量合作会自动发生。口岸通关效率、检验检疫标准、铁路轨距衔接、仓储冷链能力、跨境电商规则、企业信用信息和地方政府协调机制，都会影响相邻地区能否形成稳定的经济联系。过去中俄边境贸易曾较多依赖资源、农产品和小额贸易，抗风险能力有限。随着两国贸易规模扩大，合作主体从边贸企业扩展到能源、汽车、机械、物流、电商和金融服务企业，原有边境贸易模式难以满足新的交易需求。“一带一路”提供的通道建设、口岸升级和地方合作平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中蒙俄经济走廊可以被看作“一带一路”北向合作的典型通道。该走廊连接中国东北、蒙古国和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既涉及跨境铁路、公路和口岸，也涉及能源、农牧业、旅游、产业园区和人文交流。其难点在于，三国经济结构、行政效率、基础设施状况和发展诉求并不相同。蒙古重视过境收益和经济多元化，俄罗斯重视远东开发和战略自主，中国则重视东北开放、陆路通道安全和产业合作。三方利益有交集，但也存在协调成本。因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推进不能只依靠高层政治共识，还需要在项目收益分配、融资安排、环境评估、地方政府协作和企业参与机制上形成更加细致的制度设计。

从产业结构看，“一带一路”为中俄合作提供了从能源贸易向产业链合作延伸的空间。能源仍是中俄贸易的基础。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原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中国则向俄罗斯出口机械设备、汽车、电子产品、消费品和部分工业中间品。2022 年后，西方车企和电子企业退出俄罗斯市场，中国汽

车、工程机械和电子设备在俄罗斯市场份额上升，成为中俄贸易结构变化的重要表现。国内关于中俄经贸关系和能源合作的研究也注意到，贸易增长与支付结算、物流通道、金融合规和产业结构相互关联，不能只从商品结构解释双边经贸变化。[①]能源合作的战略价值在于稳定中国能源进口来源，并为俄罗斯提供长期市场；机电和汽车合作的战略价值则在于填补俄罗斯进口缺口，并推动中国制造在欧亚市场形成规模经济。

表 2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经贸合作的主要领域

合作领域	主要内容	对俄罗斯“转向东方 2.0”的意义	对中国的意义	需要关注的风险
能源合作	原油、天然气、煤炭、电力、核能及能源装备	稳定东方出口市场，支撑财政和能源产业调整	提升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	价格波动、管道依赖、绿色转型压力
交通物流	中欧班列、跨境桥梁、口岸、远东港口、北方航道	改善远东和西伯利亚外联条件	增强陆路通道韧性	运输成本、通关效率、制裁外溢
制造业与消费品	汽车、工程机械、电子产品、家电、零部件	替代部分西方供应，缓解进口缺口	扩大欧亚市场空间	售后服务、认证标准、支付合规
农业与食品	粮食、油脂、肉类、水产品、冷链物流	扩大非能源出口，带动地方经济	丰富粮食和食品进口来源	检验检疫、冷链能力、质量标准
数字与金融服务	跨境电商、数字口岸、本币结算、合规金融	降低交易摩擦，缓解支付压力	提升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安全	二级制裁、反洗钱、数据治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政策材料整理。

① 李兴、韩燕红、陶克清：“‘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俄能源合作：成就、问题与对策”，《人文杂志》，2023 年第 4 期，第 66-76 页；陆南泉：“对新形势下中俄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23 年第 11 期，第 127-134 页。

但是，单纯能源互补并不足以支撑长期合作。若俄罗斯长期主要出口能源和初级产品，而中国主要出口制成品和资本品，双边贸易将面临结构不平衡和俄罗斯对华依赖加深的问题。部分西方分析将这种关系描述为俄罗斯“初级产品化”或“从属化”，尽管其中不乏政治化叙事，但结构风险本身值得重视。解决办法不是放缓合作，而是提高合作层级。中俄应在天然气化工、农产品深加工、木材加工、新材料、装备制造、跨境电商、冷链物流、数字口岸和绿色能源设备等领域推动产业链嵌入，使俄罗斯不仅作为资源供应方，也能在加工、物流和技术应用场景参与合作。

从俄罗斯国内经济结构看，能源合作的稳定性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一定张力。能源出口为俄罗斯提供外汇收入和财政支撑，也使俄罗斯能在制裁环境下保持同外部市场的基本联系；但如果能源合作长期停留在原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交易层面，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会相对有限。对中国而言，稳定能源供应具有战略意义，但中国也需要评估过度依赖单一来源、单一管道或单一区域的风险。因此，能源合作更适合向“能源贸易加产业合作”演进。一方面，可以围绕天然气化工、炼化配套、油气装备维护、管道安全、能源数字化管理和储气设施建设形成更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风电、光伏、储能、氢能和电网改造等领域探索合作，使能源合作与绿色转型相衔接。这样的安排有助于减少“资源换制成品”的单一结构，也更容易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可持续叙事。

制造业和消费品贸易的扩张同样需要审慎看待。2022 年后，中国汽车、家电、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在俄罗斯市场份额上升，这是市场替代和供应链重组共同作用的结果。短期看，这有助于缓解俄罗斯进口缺口，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新的市场空间；长期看，如果缺乏售后服务、零部件供应、金融租赁、质量标准和本地化生产配套，市场份额增长可能难以转化为稳定的产业根基。中俄经贸合作要提高质量，就需要把商品出口同服务网络、维修体系、仓储物流和本地合作伙伴建设结合起来。特别是在汽车、工程机械和电子设备领域，企业不仅要考虑销售规模，还要处理认证标准、消费者权益、汇率波动和支付合规等问题。

“一带一路”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其不排斥第三方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

本身就是三方机制；中国与中亚国家、欧亚地区相关国家、上合组织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可以通过铁路、公路、港口、数字平台和物流园区形成网络外溢。欧亚大陆不是封闭的中俄双边空间，而是多主体、多通道、多规则并存的复合区域。中俄合作如果能够带动蒙古、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东盟、西亚和欧洲部分市场参与，就更能体现“一带一路”的开放性，而不是被外部叙事塑造成封闭阵营。

在应对经济霸权方面，“一带一路”的作用主要是提供物理和制度上的多元通道。现代经济霸权不只是关税或贸易禁令，还包括支付系统、海运保险、关键零部件、金融评级、技术标准和合规审查。基础设施联通虽然难以消除这些约束，却可以降低对单一路线和单一节点的依赖。如中欧班列、跨境公路桥、远东港口、北方海航道、内陆物流枢纽和数字口岸建设等，都有助于提升区域供应链冗余度。关于中欧班列开通对俄罗斯沿线城市企业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也从微观层面提示，陆路通道建设具有一定的经济外溢效应。[①]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不宜被理解为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势力范围，而应更多被理解为以基础设施和发展融资为重要内容的韧性网络。

当然，“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俄合作也面临现实约束。首先，制裁环境增加了融资、保险、设备采购和结算风险。中国金融机构在开展涉俄业务时需要面对二级制裁风险，这会导致付款周期延长、合规成本上升和中小企业参与受限。其次，俄罗斯市场规模有限、人口分布稀疏、远东基础设施薄弱，许多项目的商业回报周期较长。再次，中俄在部分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方面仍存在不对称预期：俄罗斯希望获得更多投资和技术，中国企业则更重视产权保护、政策稳定和支付安全。最后，地方合作容易受到口岸效率、检验检疫、汇率波动、劳务政策和环境标准影响，需要更细致的制度安排。

这些约束说明，“一带一路”虽然能够提供多领域合作，却不能独自解决所有制度摩擦。交通基础设施建成之后，仍需要海关、标准、支付、保险、争端解决和第三方国家参与机制来降低交易成本。也正是在这一层面，欧亚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显现出来。它不是与“一带一路”并列竞争的另一套叙事，

① 徐睿迪、余淼杰：“中欧班列开通能否提升境外沿线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俄罗斯企业层面的准自然实验”，《国际贸易》，2025 年第 5 期，第 45-58 页。

而是把项目合作进一步嵌入区域市场和制度接口之中，使中俄合作从双边通道扩展为欧亚大陆的复合网络。

四、欧亚经济合作：大陆通道、区域市场与规则接口

在本文框架中，欧亚经济合作对应的是“空间”功能。这里的“欧亚经济合作”并非单指欧亚经济联盟，而是围绕欧亚大陆形成的复合型区域经济空间。它既包括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中蒙俄经济走廊等机制安排，也包括中国同中亚、俄罗斯、蒙古国和其他欧亚国家之间的陆路通道合作、地方跨境合作、物流网络、产业园区以及海关、标准、检验检疫、电子商务和公共采购等规则接口。这样界定更符合中俄经贸合作的实际形态：许多合作项目并不发生在单一组织内部，而是在多边倡议、双边安排、地方政府和企业网络之间交叉推进。

如果说“一带一路”回答的是中俄合作“通过什么项目和通道展开”，那么欧亚经济合作进一步回答的是这些项目和通道“如何进入更广阔区域空间”。俄罗斯“转向东方 2.0”并不只面向中国市场，也包括其对欧亚大陆秩序、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金砖合作和北方航道等多重空间的再设想。中国的“一带一路”也不只服务于中俄双边贸易，而是试图通过陆海通道、规则对接和发展合作形成跨区域网络。二者的交汇点并不是某一个单一组织，而是欧亚大陆上的运输走廊、口岸体系、能源网络、产业园区和规则接口。由此，欧亚经济合作不是本文第三个孤立板块，而是“一带一路”和俄罗斯“转向东方 2.0”在区域层面的延伸。

在这一广义欧亚经济合作中，欧亚经济联盟仍然具有一定的制度意义，但它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欧亚经济联盟于 2015 年正式运行，成员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其制度目标是促进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并在海关、技术法规、竞争政策、农业、能源和交通等领域推进协调。2018 年 5 月，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成员国签署《经贸合作协定》，该协定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生效。欧亚经济委员会官方页面显示，该协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定，不直接削

减关税，但为海关合作、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贸易救济、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竞争、公共采购和部门合作建立法律框架。2023 年双方又在联合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贸易经济合作发展路线图，内容包括运输走廊数字化、外贸政策对话和深化经贸合作不同情景的联合研究；2024 年第四次会议继续讨论路线图实施、气候议程、电子商务、技术法规、海关和欧亚农业快线等议题。①

这组事实说明，中国同欧亚经济联盟的合作正在从政治宣示逐步进入具体规则议程。对中俄经贸合作而言，更现实的问题不是立即建立自由贸易区，而是逐步减少跨境交易中的制度摩擦。海关数据互换、提前申报、铁路运单电子化、检验检疫互认、技术标准协调、冷链运输规范、公共采购信息透明、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和知识产权规则，都会影响企业成本。俄罗斯受制裁后，传统欧洲市场和供应链收缩，欧亚地区内部合作和对华合作的规则效率相应变得更为重要。

广义欧亚经济合作的一个特点，是它很难由单一中心来组织。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和“大欧亚伙伴关系”设想中具有较强影响力，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和市场规模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中亚国家、蒙古国和白俄罗斯等又有各自的发展诉求。若中俄合作过度强调双边协调，容易忽视第三方国家的自主性；若过度强调多边协调，又可能因议题过多、规则差异过大而降低效率。因此，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形成“双边引领、多边嵌入、地方落实”的复合路径。中俄可以在战略层面保持沟通，在具体项目上吸收相关国家参与，在地方层面通过口岸、园区、物流和企业合作落实。这样既能保持合作效率，也能降低其他国家对中俄主导的疑虑。

俄乌冲突后，经俄罗斯通往欧洲的部分运输路线受到制裁、保险、金融和边境审查影响，中亚国家更加重视运输线路多元化。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既是为了应对俄乌冲突冲击，也是为了提升过境潜力、吸引外部资金和改善交通基础设施。②这一变化对中俄合作具有双重含义：

①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eec.eaeunion.org/en/comission/department/dotp/torgovye-soglasheniya/china.php

② 焦一强、蒋存昊：“俄乌冲突下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动因、路径与实践”，《俄罗斯研究》，2025 年第 3 期，第 85-115 页。

一方面，它显示欧亚大陆通道体系正在向多元化发展，中俄不能把欧亚经济合作简单等同于经俄通道；另一方面，多元通道并不一定削弱中俄合作，反而可以通过互补通道提升区域供应链韧性。关键在于，中俄如何接受并适应欧亚国家的多元选择，而不是把第三方通道建设理解为对自身利益的排斥。

表 3　欧亚大陆主要通道及其对中俄合作的影响

通道	主要涉及地区	对中俄合作的作用	与第三方关系	政策含义
中蒙俄经济走廊	中国东北、蒙古国、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	连接东北振兴、蒙古国过境运输和俄罗斯远东开发	蒙古国是关键过境方	需重视收益分配和地方项目落地
新亚欧大陆桥及中欧班列	中国、中亚、俄罗斯、白俄罗斯、欧洲	提供陆路贸易通道和物流冗余	受中亚、俄罗斯、欧洲政策影响	需提高通关、保险和支付稳定性
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	中国、中亚、里海、南高加索、土耳其、欧洲	增加欧亚运输线路选择	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的作用上升	需接受通道多元化并寻求互补
北方航道与“冰上丝绸之路”	北极、俄罗斯北部、东北亚	为能源运输和亚欧海运提供潜在补充	涉及北极治理和航运规则	需审慎评估环境、成本和季节性的约束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欧亚经济合作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它并非只由中俄双边关系构成。哈萨克斯坦、蒙古国、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以及中亚其他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欧亚大陆通道、市场和产业合作。近年来关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上海合作组织对接“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对“一带一路”认知的研究说明，欧亚合作始终受到第三方国家政策选择的影响，

因此，中俄合作需要处理好多边参与和第三方感受。[①]中俄合作如果能够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利益和发展议程，就有助于减少“中俄双边安排挤压小国”的疑虑，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区域经济网络。反过来，如果合作过度双边化、排他化，也可能削弱欧亚经济合作的稳定性。

欧亚经济合作也承载俄罗斯关于“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政策设想。俄罗斯希望连接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东盟、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在欧亚大陆形成更具自主性的经济合作空间。这一设想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存在差异。中国更强调开放、互联互通和发展合作，俄罗斯则更重视欧亚大陆的战略自主和制度中心地位。二者具有互补性，也存在需要协调的张力。互补在于，中国需要稳定的欧亚陆路通道和规则接口，俄罗斯需要中国市场、资金、技术和替代性经济联系；张力在于，中国经济体量明显大于俄罗斯，可能引发俄罗斯对合作不对称的担忧。

这种张力并不意味着中俄欧亚合作缺乏基础，而是说明合作需要更多规则化安排。俄罗斯担心在经济上对中国形成过多依赖，中国企业则担心俄罗斯市场的政策不确定性、支付风险和制裁外溢。两种担忧都具有现实基础。若没有透明、稳定和可预期的制度安排，政治关系的热度并不能自动转化为高质量经贸合作。李兴、陶克清关于中俄“政热经冷”问题的讨论提醒我们，中俄关系的政治基础较强，但经贸合作仍受市场结构、制度环境和企业预期的影响。[②]因此，未来合作应更多依靠可执行规则和项目绩效，而不是仅依靠宏观政治表述。

因此，中俄在欧亚经济合作中更适合采取“对接”而非“替代”的思路。“一带一路”不宜替代既有区域组织和成员国规则，欧亚相关机制也不宜把

① 焦一强、蒋存昊：“俄乌冲突下中亚国家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动因、路径与实践”，《俄罗斯研究》，2025 年第 3 期，第 85–115 页；孙壮志、王晓泉、邓浩、张家栋、佘纲正、刘雨薇：“‘上海精神’与上海合作组织再出发”，《俄罗斯研究》，2025 年第 4 期，第 3–41 页；陈小鼎、刘洋：“上海合作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主要挑战与路径优化——基于国际共生理论的视角”，《国际观察》，2025 年第 4 期，第 99–125 页；张建、杨瑞颐：“‘一带一盟’对接视域下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对‘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认知评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1 期，第 17–32 页。

② 李兴、陶克清：“‘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政热经冷’说论析”，《人文杂志》，2025 年第 6 期，第 129–140 页。

自身塑造成排斥中国经济影响的封闭空间。较为稳妥的路径是以问题为导向推进小步快走：先做运输走廊数字化、海关便利化、农产品检验检疫、电子商务、跨境支付合规和产业园区规则，再逐步讨论更高水平的贸易便利化或投资安排。这样的制度演进较能兼顾各方利益，也有助于降低外界关于“势力范围化”的疑虑。

欧亚经济合作也存在若干约束。第一，欧亚大陆内部市场购买力和基础设施条件差异较大，项目回报周期往往较长。第二，相关国家对俄罗斯和西方制裁的态度并不一致。哈萨克斯坦等国强调不会帮助规避制裁，以避免自身受到二级制裁，这意味着欧亚经济合作不宜被简单理解为“反制裁联盟”。第三，不同国家之间仍存在非关税壁垒、行政效率和规则执行差异。第四，俄罗斯在部分机制中的经济和政治权重较大，其他国家既希望借助俄罗斯市场，又担心被俄罗斯战略议程过度绑定。中国在推进欧亚经济合作时需要处理这些复杂性，避免把欧亚经济合作简单等同于对俄合作。

因此，欧亚经济合作的关键不在于为中俄合作制造一个封闭空间，而在于为多主体合作提供可协调的制度环境。中俄可以是重要推动者，但不宜成为排他性安排的单一中心。越是在经济霸权工具化和制裁外溢加剧的背景下，合作越需要保持开放性和可解释性。只有把第三方国家的利益、企业的合规需求和地方发展的实际收益纳入制度设计，中俄经贸合作才可能在欧亚大陆形成较稳定的社会经济基础。

五、功能分工与政策路径

将 APEC、“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合作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可以看到三者之间并非平面并列关系，而是具有不同层次的功能分工。APEC 是开放亚太的制度窗口，主要提供政策沟通、经济技术合作和低敏感议题协调；“一带一路”是项目和通道工具，主要把中俄合作落实到基础设施、能源、口岸、产业园区、物流网络和地方合作之中；欧亚经济合作则是大陆尺度的区域空间，主要处理运输走廊、区域市场、第三方国家参与和规则接口等问题。这样的区分有助于避免两种偏差：一是把不同区域合作机制简单视为同

质化平台，忽视其制度能力差异；二是把中俄经贸合作主要归因于制裁压力，低估地缘相邻、经济互补、远东开发、东北振兴和欧亚通道建设等长期因素。

（一）以通道和口岸制度对接降低交易成本

中俄经贸合作的基础不仅在贸易额增长，也在通道和口岸体系能否持续降低交易成本。中蒙俄经济走廊、东北-远东地方合作、跨境铁路和公路桥、满洲里、绥芬河、黑河、珲春等口岸，是“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合作衔接的重要空间抓手。未来合作不宜只强调基础设施项目本身，还应同步推进海关便利化、铁路和公路运输单证数字化、检验检疫互认、仓储冷链能力建设、数字口岸和地方政府协作机制。只有把物理联通转化为制度联通，通道建设才可能形成稳定货源、降低企业成本，并带动边境地区加工、物流、旅游和服务业发展。

（二）以能源和产业链合作缓解结构不平衡

能源合作仍是中俄经贸关系的重要基础。俄罗斯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应方，中国也是俄罗斯能源出口转向东方的关键市场。但如果双方合作长期停留在原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交易层面，双边贸易容易形成“俄罗斯出口资源、中国出口制成品”的结构性不平衡。未来合作应在稳定能源贸易的同时，推动能源装备、天然气化工、油气管道维护、储能、可再生能源设备、氢能和电网改造等产业链合作。汽车、工程机械、电子设备和消费品贸易也应从单纯销售向售后服务、零部件供应、维修网络、金融服务和本地合作伙伴体系延伸。这样既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在俄罗斯和欧亚市场的可持续经营能力，也可以缓解俄罗斯对单一资源出口结构的担忧。

（三）以合规金融和本币结算提升合作可持续性

支付结算和金融合规是当前中俄经贸合作中最现实的约束之一。俄乌冲突后，卢布和人民币在中俄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明显上升，但本币结算并不意味着风险消失。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仍需面对二级制裁、反洗钱、出口管制、声誉风险和跨境支付链条不稳定等问题。未来合作应建立更精细的分层合规安排，区分非制裁民生贸易、能源贸易、普通工业品贸易和高敏感技术贸易，明确不同类型交易的合规边界。政策性金融、商业银行、地方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平台应在透明、合规和可追溯的前提下提高服务能力，避免正常贸

易因支付不畅而转向灰色通道。

（四）以第三方国家参与提升欧亚合作包容性

欧亚经济合作不是中俄双边合作的简单外延，而是多主体参与的区域过程。中亚国家、蒙古国、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国家既希望利用中俄市场和通道，也重视自身外交经济自主性。中俄在推进运输走廊、能源合作、产业园区和跨境物流时，应尽可能把第三方国家的过境收益、就业机会、税收贡献、技术培训、环境治理和地方发展纳入项目设计。对于中亚和蒙古国等过境国家而言，通道建设的意义不仅是让货物通过本国领土，更在于能否带动本地物流、加工、服务和基础设施升级。合作越能提供可见收益，越容易获得区域国家支持，也越符合“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合作的包容性要求。

因此，中俄经贸合作的政策路径不应仅停留在扩大贸易规模，而应转向通道效率、产业链深度、金融合规和第三方参与等综合治理。面对地缘经济碎片化和外部经济压力，中俄需要增强支付、物流、能源和产业链的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性不应被塑造成封闭化或阵营化安排。更合适的方向，是在开放条件下提高抗冲击能力，在区域合作中增加欧亚大陆经济发展的制度空间。

六、结　语

本文从区域机制嵌入的角度，比较了 APEC、“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合作在中俄经贸合作中的功能差异。三者分别对应“窗口-工具-空间”三种功能：APEC 提供开放亚太的制度窗口，有助于中俄在低敏感经济技术议题上保持沟通；“一带一路”提供项目化和通道化工具，使中俄合作能够落实到基础设施、能源、口岸、产业园区和地方发展之中；欧亚经济合作则提供大陆尺度的区域空间，承载运输走廊、区域市场、第三方国家参与和规则接口等更复杂的制度功能。三类机制之间并非相互替代，而是根据议题属性和制度能力形成分工。

俄罗斯“转向东方”和欧亚大陆通道体系重组，使中俄经贸合作不能仅被理解为制裁背景下的短期替代。制裁压力确实加速了俄罗斯外部经济联系的调整，也推动中俄贸易规模和结构发生变化，但中俄合作的基础还包括地

缘相邻、资源与市场互补、远东开发、东北振兴、能源安全和欧亚通道建设等长期因素。因此，若只从双边贸易额或制裁套利角度理解中俄合作，容易低估其区域制度含义；若将其简单描述为封闭化、阵营化合作，又会忽视中俄合作对第三方国家参与、规则协调和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依赖。

从政策含义看，中俄经贸合作未来应在开放性、包容性和风险治理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双方需要通过通道多元化、口岸便利化、本币结算、产业链合作和标准对接，降低对单一金融、技术和市场体系的脆弱依赖；另一方面，也应避免把区域合作塑造成排他性安排。欧亚经济合作的稳定性取决于第三方国家能否获得实际收益，企业能否形成稳定预期，地方能否分享基础设施和贸易增长带来的发展机会。只有把宏观战略转化为可执行的制度安排和可评估的项目绩效，中俄经贸合作才能在国际区域合作框架中保持经济可持续性和国际可解释性。

（责任编辑　宋羽竹）

大国关系

美国国际研究学会 2026 年会侧记
——兼论国关/地区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于　滨*

【内容提要】动乱的世界走向何方？又源自何处？中西国关理论如何定位自身与解构历史和现实？笔者在美国锈区俄亥俄州召开的以“溯本开新”为主题的美国国际研究学会（ISA）2026 年会中，聚焦国关理论和区域/国别研究（中俄等）议题，也周览众多殊言别论。所见所思虽丰，亦感无解无奈，其中包括：美国“去中国化”的中国研究，国关研究多元化与异化的种族因素，华人①学者的“优势”与困境，盎格鲁-萨克逊语境中国人/华人英文期刊的崛起、操作与前景，历史是负担或原罪、还是走向未来的动力和力点等议题。美国国际研究学会虚拟世界以外，是中国学人和企业家在美国锈带的探索和深耕、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版的“乡下人的悲歌”。

【关键词】国际关系　国别研究　联俄制华　白化　话语“铁幕”　回到未来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5-0034(32)

美国国际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ISA，下文简称“ISA”）于 2026 年 3 月 22 日至 25 日在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举行第 67 届年会。一如既往，年会不仅主题宏大，且议题繁多。会期 4 天，1300 余个分会，涵盖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外交政策、军事战略、人工智能、地区/国别研究，也涉及各类人文、社科领域。各学科之间衍生出无数“交叉”议题，其中既不乏新意，开阔思路，也有各式不着边际的“奇谈怪论”。无论如何，ISA 年会为各类学派/思潮的交流、碰撞提供了一个便利和广阔的平

* 于滨，斯坦福大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① “华人”是一个广泛的文化与血统概念，指所有具有中华血统的海外人士（含中国公民与外籍华人）。而“华裔”专指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代。

台。上次参加 ISA 年会还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以前。此次受邀加入“中俄关系与全球治理”分组，近距离感受美国与西方的学术动向，有不少感触与思考。

一、“苏联学”巨星谢幕，“重俄轻华”依旧？

本届 ISA 年会没有重量级美国和西方（下文简称“美西”）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现身。相比之下，年会高调授予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莱格沃尔德（R. Legvold）“俄罗斯欧亚东欧研究杰出学者奖”，并为此举办专场分会。多年来他致力于学术和政策的客观分析，强调以历史路径研究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持久因素”（persistent factors）；在政策层面，他力主美西国家对俄实施有节制的外交，以及“通过相互理解而建构的和平”（peace through understanding）。如今他在本届 ISA 年会中被称为西方俄罗斯研究的“有良心的智者”（intellectual conscience），也是实至名归。

另一方面，年会高调赞誉莱格沃尔德在西方苏联学向俄罗斯学转型时期的学术地位，也凸显了俄苏研究在美国政治学领域的历史惯性。作为冷战期间美国“外国研究”（foreign studies）最庞大的“区域国别研究”（country/area studies）体系，莱格沃尔德深度参与的苏联学研究，[①]不仅为美西众多国关理论开辟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也有意无意地催生和塑造了主要国关理论范式：苏联的强盛促使西方奠定了以国家实力为基准的传统现实主义[②]和强调“两极稳定”的结构现实主义[③]，而苏联的败落也引发了“历史终结论”[④]、“文明冲突论”[⑤]以及建构主义[⑥]的异军崛起。

① 关于美国苏联学的兴衰和转型，参见万青松：《美国的俄罗斯学研究——一项基于学术史的批判性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年。尤其是第三、第四章，第 51-174 页。

② H.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5th edition, New York: Knopf, 1978.

③ 华尔兹认为，两极体制的稳定性远远优于单极和多极体制，充分肯定了苏联对国际体系稳定的贡献。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172.

④ F.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89, No.16, pp.3-18.

⑤ S.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 Vol.72, No.3, pp.22-49.

⑥ 建构主义建立在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评之上，认为二者均未预见苏联解体。See A.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5, 313-336, 346-369.

冷战期间，西方比较政治学的诸多理论也积极参与苏联学的建构，且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将西方苏联学“去极端化”，开始视苏联为“正常”国体。[①]塞缪尔·亨廷顿（S. P. Huntington）1968 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一反西方的反共主流，将苏联与美国并列为有能力维护秩序、进行自我管理的制度。其反面是无力管理自己、无序混乱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②]

2026 年 ISA 年会对莱格沃尔德的敬重表明，西方学界（至少部分人士）对处于历史性衰落、走下“神坛”的俄罗斯及其西方观察者（包括莱格沃尔德等一代由“苏联学”转为“俄罗斯学”的学者），至少保持了起码的尊重。相比之下，美西的中国学从未在主流国际关系和地区研究理论范式中享有如此殊荣。

对于美西学界这种“重苏/俄、轻中国”的情结（Soviet/Russia-heavy-and-China-lite complex），笔者在本届 ISA 年会一个讨论大国和平共处的分会上提问：为何冷战时期西方国关界主流事实上确认了苏联这个共产主义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合理地位，如今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却将中美之间的大国关系定义为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完全排除了国际秩序和平转型的可能？得到的回答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 J. Mearsheimer）的理论在现实主义范式中不占主流。

然而诸位参会者[③]所回避的是，美西主流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在后冷战的 35 年间（1991—2026 年），从未对中美两大实体所参与的国际秩序进行过任何理论性探讨，无论中国崛起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除了英语世界（Anglosphere）无处不在的“中国威胁/垮台论”，国关学界中即便是相对理性的所谓“防御性现实主义”，也不能接受中国的崛起。如其领军人物斯蒂

① 美国的苏联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将布热津斯基等为代表的“极权主义”论者边缘化。参见于滨：“西方苏联学的内核与外延”，《俄罗斯研究》，2013 年第 6 期，第 167-196 页。

② 作为现实主义者，亨廷顿用苏联的例子验证了一个常理，即人可以忍受有秩序而无自由的生活，但却无法在有自由而无秩序的环境中生存；权力（authority）必须确立在先，而后加以分散。See S.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7-8.

③ 八名参会者均来自北美和欧洲名校，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圣地亚哥分校、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维也纳外交学院、哥本哈根大学等。

芬·沃尔特（S. Walt）所言，中美潜在冲突的根源在于中国对地区主导权的追求，而美国必定予以反制。[①]

二、“多元”的诱惑与迷失

美西学界“重俄轻华”，政策界“联俄制华”，都或多或少与西方现实主义相关。对于 20 世纪主导欧亚大陆的中苏两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最为直白的表述，则是来自特朗普一任时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②]主任凯伦·斯金纳（K. Skinner）——美中竞争是两个“文明”之争，美国从未经历过与中国这个“非高加索人种”（即白人，笔者注）的强大对手的竞争。相比之下，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的竞争不过是“西方家族的内部之争”。[③]

从美国黑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立场来看，斯金纳“善待”苏联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因为恰恰是一个在美国看来是“邪恶帝国”的苏联，不间断地批评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④]在客观上迫使美国于 1964 年通过《民权法案》，不情愿地向更平等的社会迈出了关键一步。[⑤]如今这位非裔、女性、学霸、

① See S. Walt, “Hedging on Hegemony: The Realist Debate over How to Respond to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49, No.4, p.37; 关于美国学界进攻/防御性现实主义最新一轮对俄、对华政策的论争，可参考于滨：“关于大国竞争的博论”，《俄罗斯研究》，2026 年第 1 期，第 26–64 页。

② 乔治·凯南（G. Kennan）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首任主任（1947—1949 年）。

③ 斯金纳说，她所主持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正在制定一项类似冷战期间由乔治·凯南提出的对付苏联的“遏制”战略。See J. Gehrke, “State Department Preparing for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Examiner*, April 30, 2019,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policy/foreign-policy/2727423/state-department-preparing-for-clash-of-civilizations-with-china

④ 这印证了亨廷顿的一个论点，即美国为了自身的团结，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需要一个外在的敌人。See S.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7, p.32.

⑤ 关于冷战与美国种族主义政策变化的讨论，参见 Yu Bin, “Americas War against Racism”, *Asia Times Online*, June 26, 2003. 两个月后，美国广播公司（NBC）主播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在纪念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发表 40 周年的一期特别节目中，也得出相同结论，即冷战迫使美国政治精英直面美国国内的种族隔离政策。See “Peter Jennings Reporting: ‘I Have a Dream’” August 26, 2003, https://abcnews.com/WNT/story?id=129482&utm_source=chatgpt.com. 美国国防大学现任高级研究员、俄罗斯问题专家曼考夫（Jeffrey Mankoff）也认为，冷战迫使美国改变其种族隔离政策。（转下页）

反苏反共的哈佛国关博士，从白人种族观的“高度”，透过所谓“文明”棱镜，来审视中美两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如何，美国在与白人的共产主义苏联进行冷战期间，被迫弱化其国内的种族隔离政策，但与非白人的中国“竞争”反而强化了美国内外政策中的种族主义劣根性。即便在种族色彩浓厚的美国外交史上，这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①

如果说斯金纳代表了美国保守派少数族裔政治正确“简单粗暴”的标杆（即站在白人立场上抨击有色人种），那么，学界中自由派价值观的表述则相对含蓄。几十年里，为了扭转美国国关界过度“白化”的表象，自由派以各种优待方式增加少数族裔在美国国关专业的人数。②至于他们在白人至上的象牙塔中如何“修行”，就另当别论了。毕竟，美式学术的自由尺度还是相当可观的。

在本届 ISA 年会一个“白化和世界秩序”（Whitenness and World Order）的分会上，斯坦福政治系非裔博士后布斯塔曼特（K. Bustamante）的发言颇有“创意”，其内容是 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德国针对日本的种族主义，颇有为“受害者”日本打抱不平的架势。笔者在交流时发问：德日交恶的本质是争夺对中国北部的控制权，③那么在欧洲白人维系的种族等级制度中，④为何只见“木”（日本与个别西方列强的冲突）不见“林”（中国

（接上页）See J. Mankoff, “American Ideals Beat the USSR. Why Aren’t We Using Them Against Russia?” *Defense One*, January 4, 2018, https://www.defenseone.com/ideas/2018/01/american-ideals-beat-ussr-why-arent-we-using-them-against-russia/144954/

① 关于美国中俄研究和政策层面的种族和“文明”问题，可参考 2018 年 6 月 15 日于滨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北阁论衡”第 24 讲：《美国的中俄问题》，https://www.iiss.pku.edu.cn/info/1064/1964.htm；于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文明’问题”，《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 年第 2 期，第 56-74 页；于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俄温差’”，《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3-41 页。

② 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戴维·莱克（D. Lake）在《政治观点》上撰文指出，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是由白人主导、为白人服务的建构。See D. Lake, “White Man’s IR: An Intellectual Confessio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6, Vol.14, No.4, pp.1112-1122.

③ 1895 年，德皇威廉二世以“捍卫基督教文明”为由，敦促俄国承担防范“东方（日本）威胁”的使命。而其深层战略考量则是将俄国的注意力转向远东，减轻德国在欧洲面临的俄法同盟的压力。参见扬之：“赖歇率德企组团访华，难治欧盟对华政策的‘基础病’”，观察者网，2026 年 5 月 28 日，https://www.guancha.cn/yangzhi/2026_05_28_81860 5.shtml

④ 亨特（M. Hunt）认为西方的种族意识是一个等级建构，有色人种之间有高低贵贱之分。See M.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46-91.

和亚洲整体作为西方和西化的日本的殖民对象）？在 1902 年英日同盟的背景下，德国对日本的警觉和敌意是利益驱动，[①]还是种族之争？作为西方眼中的“荣誉白人”，[②]日本为何在 20 世纪上半叶成为世界大战的祸源？！[③]

布斯塔曼特对我的提问显然不快，只是强调德国对日本的种族主义也是“事实”。回头看，我对这位斯坦福非裔学者的“质问”过于苛刻了。在西方语境中，批判德国白人对犹太白人的屠杀（Holocaust）是永恒的主题，而对“白化”的有色人种（如日本）对其他非白人的暴行可以视而不见。西方理论中的“种族灭绝”（genecide）显然是有高低贵贱之分（hierarchial）。同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 2026 年 5 月访澳期间在澳军阵亡墓前跪拜，为 3 万澳洲白人（基本是军人）的亡灵“谢罪”，却无视死于日军屠刀下千倍于此的 3500 万中国军民（这 3500 万亡者中绝大部分是平民）。事实上，美国自由派自 20 世纪 90 年代就一直在漂白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罪孽，以至如今日本俨然以二战“受害者”的身份招摇过市。1945 年 8 月日本上空蘑菇云的真正“罪孽”，也许是过早终止了日本军部“一亿玉碎”的狂热。[④]

当然，这位自由派非裔学者与保守派的斯金纳一样，绝口不提（至少在本届 ISA 年会）他们祖辈共同经历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持久、至少在希特勒看来是最为成功的种族隔离制度。[⑤]如今，西方“自由-集权主义”

① 1902 年的英日同盟终止了英国的“光荣孤立”，使其得以在亚洲利用日本制衡俄国，英海军则可以更为有效地应对欧洲大陆飞速崛起的德国。

② 参见于滨：“千年易过，日本的罪孽难消”，观察者网，2025 年 9 月 18 日，https://www.guancha.cn/YuBin/2025_09_18_790517.shtml

③ 1931 年 9 月 18 日侵占整个中国东北，开启了 14 年之久的侵华战争，而二战在欧洲爆发还是在 8 年后德国入侵波兰。

④ 1995 年 8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 50 周年，笔者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拜访了 1945 年 8 月 6 日在广岛上空投掷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美军 B-29 轰炸机的上校机长、退休准将小保罗•蒂贝茨（Paul Tibbets, Jr.）。会见期间，蒂贝茨告诉笔者，他后来见到很多日本人，都感谢蒂贝茨和他的“小男孩”迫使日本提早投降，避免了更多的杀戮。参见于滨：“80 年前，他驾驶 B-29 轰炸机向广岛投下原子弹”，观察者网，2025 年 8 月 30 日，https://www.guancha. cn/YuBin/2025_08_30_788245.shtml

⑤ 1933 年纳粹上台后，对于如何处置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少数族裔缺乏经验和有效手段，却从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中深受启发，为直接获取“经验”，向美国派遣了数千名官员、学者、医生“取经”。See J. Whitman, *Hitler's American Mod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Nazi Race Law*,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论者们（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卢金对西方自由派的定义[①]），正在其意识形态的对手，即极端保守势力的强势回归中痛不欲生。人们不禁要问，在“虚伪”的自由主义（fake liberals）和特朗普式的“诚实的”种族主义（honest racists）之间，美国和西方象牙塔中是否还存有任何真正自由和公正的“净土”？

三、美国华人学者的“去中国化”

也许我过于悲观了。无论如何，自由派数十年来所致力的多元化在美国学界已修成正果。在本届 ISA 年会上，亚裔面孔随处可见，参会名单中中国背景的姓氏（按汉语拼音推测）至少有百余位，在年会的上千个分会中，亚裔/华裔学者占多数甚至完全“垄断”的分会场也不是个例。ISA 的公开信息显示，很多华人华裔学者都已“入乡随俗”，全面融入西学有形和无形的理论和修辞“框架”（framework）之中。相对于 20 世纪中国学人初次进入美西学界颇为艰难甚至痛苦“适应”的过程（至少是我本人的经历），如今中青年一代华人学者与西方学界“无缝对接”（seemless transition）的速度、深度和广度都令人印象深刻。

惊叹之余，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是，很多中国背景的学者（包括博士生），似乎在与自己的中国身份作各式各样的屏蔽或切割。[②]在网络信息犯罪日益猖獗的时代，如此隐姓埋名、保护个人隐私的做法无可非议。然而，华人华裔学者普遍、刻意屏蔽与中国有关的个人信息，至少表明中国元素在美国学界生态中被视为“负能量”的“尴尬”局面。一般而言，华人在美国时间越久，中国“痕迹”越少，无论这种变化是真心“融入”，还是不得不为。在笔者比较熟识的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国大陆来美的华人学者中不乏此类“皈依”者。如今处于学术起步阶段的华人博士生和助理教授等群体性的“去中国化”现象，还是令人唏嘘不已。特朗普一任期时启动的“中

① 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 • 卢金（А. Лукин）将西方自由主义定义为“一种新的包罗万象的极权主义理论”。See A. Lukin, “The Theory of Universal Racism as a New Version of American Cultural Dominance”,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July 29, 2020.

② 在互联网的公开信息中很难查询到他们的中文姓名以及读博前（在华）就学的信息。

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①]意在清理中国留美科技生，但对整个华人群体“白色恐怖”式的威赫，或许是华人学者“放低身段”的主要原因。

ISA 年会以外，中美学界的正常交流遇到美方种种特殊“礼遇”，令中国学者不堪其扰。[②]在美国国内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极端政治化的气氛中，绝大多数美国学界/智库人士选择少说话，不作为，以求自保。要扭转这种万马齐喑的状况，在素有麦卡锡主义传统的美国，不是中方的一厢情愿[③]就可以平复如故的。

美国智库中，华人学者主导的项目/机构受到中美“寒流”的冲击最为直接，比如位于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刘亚伟教授主持的中国研究项目。新冠疫情前该中心经办数次大型中美关系研讨会，中方由外交学会牵头，双方重量级学者和前官员参会，美国前总统卡特作主旨演讲。在步履艰辛的中美关系中，卡特中心的此类项目成为稳定双边关系少有的智库型平台。然而，即便卡特在世时，这些交流项目就备受美国官方（尤其是国会）和媒体的责难。2024 年卡特去世后，该中心中国项目的弱化已成定局。2023 年，主持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John Thornton China Center）九年之久（2014—2023 年）的华人学者李成离美赴港——美国日益极化、种族化的政治生态，应该是李成去职的原因。[④]

然而在过去十年里，“去中国化”最为彻底的应该是美国军事院校。直到新冠疫情之前，美国陆海空三大战争学院[⑤]均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学者任教，

① 齐倩：“‘中国行动计划’还在且更‘阴险’？美国海关被曝无端阻止中国学生入境”，观察者网，2024 年 6 月 4 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4_06_04_737018.shtml

② 其中包括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的遭遇。参见“王缉思教授在 CISS 午餐演讲谈中美人文交流”，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25 年 8 月 6 日，https://ciss.tsinghua.edu.cn/info/wzjx/8507

③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我们要把支持中美关系的人一个个找出来”，环球网，2023 年 6 月 8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DDlDoLCSfP

④ 李成：“我为什么辞任美国顶级智库，回到中国？”，观察者网，2023 年 12 月 18 日，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147363

⑤ 美军的各类“战争学院”（war college）主要培训中级军官，以提升其战役指挥和专业水平，大致相当于硕士研究生的水平；本科级别的院校为西点军校、美国海军学院、美国空军学院等。

著述甚多。[①]其中陆战学院的来永庆（David Lai）首创用中国围棋中“势”的概念（momentum）解释中国传统和现今的外交战略，后被基辛格在其《论中国》一书中系统引用。[②]与此同时，美军院校也保持与中方同行的正常交流。如 2013—2014 年笔者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访学期间，正赶上解放军军事学院十余人组团来访并举行大型研讨会。如今三大“战争学院”不仅完全清空了大陆背景的华裔学者，与中方的正式交往也已基本断绝。[③]

华人华裔学者在美军院校系统的沉浮各有其特殊背景，[④]但也不免使人联想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席白宫华人女记者姜伟嘉（Weijia Jiang）。这位生于厦门、两岁随父母移居美国的女士，学业事业一帆风顺，2025—2026 年成为第一个担任白宫记者协会主席的华裔女性。然而，在 2026 年 4 月 25 日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她与特朗普侃侃而谈时发生枪击事件后，却只能在总统特勤人员身后爬行。华人在美国社会中荣光、卑微、尴尬交织的多重“身份”，在美国政治生态日益极化的当下相当敏感。

① See D. Lai, *Learning from the Stones: A Go Approach to Mastering China's Strategic Concept, Shi*,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4; R. Kamphausen, D. Lai, A. Scobell, eds., *The PLA at Home and Abroad: Assessing the Operational Capabilities of China's Military*,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10; Nan Li,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Post-Deng China: From Symbiosis Quasi-Institutionalization*,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A. S. Erickson, L. J. Goldstein, Nan Li ed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21st-Century Sea Power: Defining a Maritime Security Partnership*,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Xiaoming Zhang, *Deng Xiaoping's Long War: The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1979-199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Xiaoming Zhang, *Red Wings over the Yalu: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ir War in Korea*, College Station, TX: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pp.23-25.

③ 美国军校仍允许甚至鼓励其教研人员以个人身份赴华短期访学。本届 ISA 年会期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中国军事战略史专家安德鲁·威尔逊（A. Wilson）教授证实了此事，他本人经常以学者身份赴华。

④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来永庆应该是因退休而离职，但他的继任者均无中国大陆背景。2021 年美国空军战争学院的“Xiaoming Zhang”则因与中国大陆的“联系”而被判罪。See “Former Air War College Professor Pleads Guilty to Making False Statements About Relationship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 in China”, October 25, 2021, www.justice.gov/archives/opa/pr/former-air-war-college-professor-pleads-guilty-making-false-statements-about-relationship

四、两本期刊，两条道路

美国国关界华人群体“去中国化”现象及其后果仍需进一步观察。本届 ISA 年会中至少有一个反例：举行了纪念清华大学的英文《中国国际政治季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创刊 20 周年活动。这个由清华大学牵头、完全由海内外华人组成的分会场，在千余个分会中并未得到过多关注。然而，《中国国际政治季刊》这一完全中国化的交流平台，却是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走出国门又回归故里的一代学人艰难求索的成果——既致力于西式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同时推进中式理念/理论的国际化。[①]与美西国关学界华人群体“弱化”的态势相反，他们中很多人都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领军人士。[②]

与“海归派”的《中国国际政治季刊》相对应的是留美学人主办的《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前者致力于中外国关理论交流，后者则聚焦中国本身。20 世纪 90 年代初，这本由华人学者发起的主流国别研究平台，在西学竞争激烈的期刊领域从零开始，迅速崛起，以致当时主导西方中国学的伦敦《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CQ）的主编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也对此表示惊叹。[③]

其实，在冷战高峰期间（1960 年）问世的《中国季刊》和冷战刚结束后（1992 年）由旅美华人创立的《当代中国》，背后的金主都是美国政府（中情局和民主基金会），[④]这在二战后美国政府强力支持具有“敌人研究”

① 阎学通于 2011 年提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以有别于西式以实力为主体的现实主义理论。See Xuetong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② 《中国国际政治季刊》创办人、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是伯克利博士。“海归派”知名学者还包括：南开大学的张睿壮（伯克利博士），北京大学的潘维（伯克利博士），外交学院的秦亚青（密苏里大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黄靖（哈佛大学博士），澳门大学的王建伟（密歇根大学博士），香港大学的胡伟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厦门大学的张苾芜（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暨南大学的陈定定（芝加哥大学博士）等。当然，“本土派”学者对中国特色国关理论建设的导向和地区/国别研究的贡献更为重要。参见于滨：“老一辈国际关系学者与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确立”，澎湃新闻，2020 年 7 月 9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80450

③ 沈大伟是在 2003 年一次研讨会上对笔者做上述表示。

④ 关于中情局资助《中国季刊》的问题，See Roderick L. MacFarquhar, “The（转下页）

（enemy studies）特色的美国“外国研究”（foreign studies）中实属正常。但是美国官方对中国问题研究资助对象和地点的选择，至少有四点考量：第一，这两份期刊的创立都与苏联息息相关。前者是在中苏关系公开破裂之时，美西方对中苏关系破裂的程度、波及范围以及各自对美关系拿捏不准，甚至完全茫然。[①]后者是在苏联刚刚解体之后，西方普遍认为中国会步苏联后尘迅速垮台，但又对进入深度转型阶段的中国政体和社会的了解严重匮乏。第二，《中国季刊》选择在伦敦出版，目的是避开由于麦卡锡主义“谁丢失了中国”的追责而严重分裂的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而美国对东南亚/越南的深度卷入也使美国的亚洲研究成为“是非之地”。相比之下，大西洋彼岸的伦敦则是中情局影响和塑造西方学界的“世外桃源”。[②]第三，冷战后美国外交决策主流实行对华“接触”战略，需要把握、影响以致改变中国国内政治走向，也寄希望这一中国留美学者群体发挥作用。[③]最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季刊》首任主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L. MacFarquhar）的智识结构（中国文革史）迅速过时，而麦氏一代“汉学家”盲人摸象式的研究方法（间接的“资料”研究，与脱离中国大陆的人士的访谈等）既无必要，与 20 世纪 90 年代受过西方完整学术训导、且经历了 20 世纪新中国全部政治历史的一代中国留美/西学者也完全不可类比。在美华人主办的《当代中国》

（接上页）Founding of the China Quarterly”, *The China Quarterly*, 1995, No.143, pp.692-696. 《当代中国》项目的初始资金（1992—1995 年）由美国国会的民主基金会提供，See “1994 NED annual report”, https://a2-west.americancloud.com/objects3243%3Asorostaxreturns/NED_1994.pdf, p.47; “1995 NED annual report”, p.32, https://www.ned.org/docs/annual/1995%20NED%20Annual%20Report.pdf,.

① 据首任《中国季刊》主编麦克法夸尔回忆，提出 CQ 作为一个独立期刊的建议来自中情局在巴黎资助的《苏联概览》期刊（Soviet Survey），而 CQ 直接参与出版的该刊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是 Richard Lowenthal 的 *The Sino-Soviet Dispute*,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1. See MacFarquhar,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a Quarterly”, *The China Quarterly*, 1995, No.143, p.692。而该书的出版商普拉格（Praeger）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接受中情局资助，尤其是对其大学课本的出版与发行的财务支持。参见 2004 年 10 月 13 日解密的 *Publisher's Weekly*, March 6, 1967,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IA-RDP88-01350R000200320012-6.pdf

② See MacFarquhar,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a Quarterly”, *The China Quarterly*, 1995, No.143, pp.695-696.

③ 尽管如此，中美建交和后来接触战略的重要推手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也主张美国大学的中国研究项目“慎用”或不用中国留美政治学者，以防止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研究者受中方影响。

脱颖而出，不仅有天时地利之便（政府资助、需求强烈），更在于留美/西一代学人融贯中西的素质和在华的特殊经历。

回头看，回归故土的《中国国际政治季刊》和立足西学的《当代中国》的创办者当时都起步于同一个“西升东降”的时代：“单极瞬间”的美国对其冷战时期的对手（中俄等），不仅具有碾压式的硬实力，而且在范式建构、价值取向和智识传导方面的垄断是全方位的。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国际政治季刊》逆流而上，在创刊 20 年间，除了致力于中外交流、尽力表述中式理念之外，几乎每期都刊有美西学者的作品，包括一直强调中美必有一战的米尔斯海默的文章。[①]相比之下，类似的美国国关旗舰期刊——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则鲜有华人学者的文章；即便有，也多为以西式视角、概念与修辞，针对特定的“问题”对象（如苏联、中国等），推导出西式结论。

笔者在此并非要求中西交流严格“对等”，意在指出中西学术交流中巨大的非对称现象：一方面是西学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固有的“他者化”或“敌人化”[②]的叙事方式，将东方或非西方国家构建为“落后的、野蛮的、非理性的”“他者”，以此确立自身“先进、文明、理性”的主体地位。[③]而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高度意识形态化，主流媒体和建制派在谈及美国外交时最常用的词组便是二元分立、拒绝任何中间层次的“盟友和/或敌人”（allies and/or adversaries）的对仗；与此同时，在美式英语中，CCP（Chinese Comuunist Party）已被极度妖魔化，几乎成了“中国”（China）的代名词。

此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对华认知，在本届 ISA 年会中也随处可见。笔者旁听了若干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发现中国正常的对外经济活动，常常被贴上“殖民”、“债务陷阱”、“依附论”、“资源掠夺”、“过剩产能输出”等负面标签，而论者中多有亚裔/华人学者。他们对原始中文文献和

① J.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0, Vol.3, No.4, pp.381-396.

② 美国冷战期间迅速崛起的“外国研究”的别称是“敌人研究”，致力于此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更容易获得美国政府和军方/情报界的资助。See D.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在有关中国的文章中，使用较多的词汇包括：autocracy、regime control、dictatorship、authoritarianism、totalitarianism、axis（axis of authoritarianism、axis of upheaval）等。

量化模型的运用能力，在美西学界中的“优势”相当明显。然而，各类量化模型对海量的中文文字进行“科学的”截取、组合和处理后所得的“产品”，大都在印证、补充或强化传统西学范式中将中国作为一个“问题”的叙事，与一个真实的中国相距甚远。这种将母语以“科学”的名义碎片化、中性化的取向，其结果是放弃自身的语言优势，成为西学中“懂中文不懂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群体。在不同文明多量、高频甚至剧烈互动的今天，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困惑、无奈却又不可忽视的现象。

五、“科学化”的诱惑与限度

笔者并非反对量化，但必须适度。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社科界量化鼎盛时期，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 Almond）就指出，社会科学不能简单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量化和可控实验等），因为人以及人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充满多种边际（residual）和偶然（accidental）因素，社会科学因此只能是一种“软科学”，不能忽视人类行为的多样性、随机性、甚至非理性。[①]然而，美国政治学会高层人士却通过控制会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Journal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和操纵顶尖大学的师资配备，独尊量化，偏重理论（general theories），同时排斥国别和地区研究，最终在 20 世纪末引发了底层学者广泛抗议，[②]但这种抗议也难有回天之力，不了了之。

美国政治学界对量化和普世理论痴迷的结果之一，是向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情报系统年复一年地输送精通理论和善用各种量化模型的“高材生”。冷战结束后，美国传统“敌人”要么消失（苏联），要么弱化（中国），美

① Gabriel Almond, Stephen Genco, “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1977, Vol.29, No.4, pp.489-522.

② 众多美国政治学者在互联网上以戈尔巴乔夫“重建运动”（Mr. Perestroika）的名义，发起联名抗议，《纽约时报》对此有长篇报道，See Emily Eakin, “Political Scientits Are in a Revolution Instead of Watching”,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00. https://www.scribd.com/document/144796582/The-Perestroika-Movement. 这一“重建运动”的 39 篇论文后来由耶鲁大学出版社 2005 年汇编成集。See K. R. Monroe ed., *Perestroika!: The Raucous Rebell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国政府对学界的地区/国别研究的投入也断崖式减少。[①]与此同时，美国的情报系统也加速以技术监测设备和各类数学模型，取代经验丰富的国别/地区事务分析员。这导致美国情报界在“9・11”前截获了基地组织海量的电子信息，却无法对其内容进行有效梳理和精准分析。[②]在此后 20 年的“反恐”战争中，美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③]

2012—2013 年，笔者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战略研究所（SSI）访学，发现该院 200 余名教研人员中，居然没有一名阿富汗/中亚问题专家。而驻阿富汗 10 万余名美军的各级指挥官所关切和致力的不是如何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减少美军和平民伤亡，而是如何精心绘制各类光鲜亮丽的幻灯片，其中一张《阿富汗反恐图》令人啼笑皆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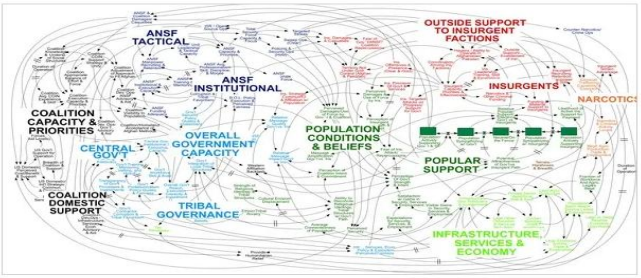


图 1　《阿富汗反恐图》幻灯片（Afghan COIN Operation）

图片来源：Elisabeth Bumiller, “We Have Met the Enemy and He Is PowerPoint”,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2010, www.nytimes.com/2010/04/27/world/27powerpoint.html

注：COIN 为美军“counter insurgency”的缩写。

对此，《纽约时报》称之为“一大盘意大利面”。2009 年走马上任的美军驻阿总司令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 A. McChrystal）则说，“弄懂这张

① 笔者曾任教的俄亥俄州威腾堡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该校的苏联和东亚研究专业在冷战期间完全由联邦政府资助，冷战结束后政府资助停顿，私人资助时有时无，两个专业逐渐萎缩，至 2025 年全部关闭。

② Erik Dahl, *Intelligence and Surprise Attack: Failure and Success from Pearl Harbor to 9/11 and Beyond*,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③ 美军在阿富汗 20 年的“反恐”战争中共投入了 2.1 万亿美元。See “Afghanistan before and after 20 years of war (2001-2021)” August 26, 2022, https://costsofwar.watson.brown.edu/paper/afghanistan-and-after-20-years-war-2001-2021; 2010—2011 年度美军在阿富汗驻军达 10 万，21 年间，超过 80 万美军先后在阿富汗参战，See Mohammed Hussein, Mohammed Haddad, “Infographic: US military presence around the world”, *Al Jazeera*, September 10, 2021.

幻灯片，黄花菜都凉了。”[①]如此细节“翔实”、面面俱到的纸上谈兵，除了获得意识和感官的快感之外，其真正的作用就是文过饰非，欺上瞒下，使这场极不对称的战争久拖不决，最终惨痛收场。美国政界、军方和情报界的上述问题，大都可在美式国关理论的范式中找到其根源，即以理论套现实，求共性弃个性，重表象欠内涵。

然而以二元论为底色的西方国关范式，也极易滑向其对立面，即以个例取代整体，见木不见林。比如西学“现实主义”的“修昔底德陷阱论”，[②]以西方狭隘的历史个例，套用于非西方、非基督教、非白人、非西式民主的中国。同理，美国国关现实主义范式中最亮眼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也将美国自身对外扩张经历，即在西半球的地区霸权，视为大国行为的必由之路，进而得出中国“国强必霸-霸则必战-战之必衰”的结论。[③]

六、盎格鲁-撒克逊语境的“小院高墙”与中俄“轴心论”

然而西式国关范式，无论是高高在上的“普世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还是一叶障目的“陷阱论”，均倚仗一个以西方叙事为主导的政治文化生态，其合法性与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西方“软实力”的强力输出，[④]也在于“调节”以至限制外部讯息对美国“正统”叙事的反衬和冲击。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公众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和了解至少经历了两次断崖式减少。第一次是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主流媒体对国际事务的报道大为缩水，原因是美国读者和观众认为来自外部尤其是核大国的威胁大为减少，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也陡然下降，[⑤]美国公众对“敌人”的兴趣远高于任何其他形式的

① 其原话为：When we understand that slide, we'll have won the war.
② G.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4.
③ J. Mearsheimer, “W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5, Vol.49, No.4, pp.7-36.
④ 约瑟夫·奈于 1990 年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主要内容包括文化感召力、政治价值观、外交合法性（即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等。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⑤ Garrick Utley, “The Shrinking of Foreign News: From Broadcast to Narrowcast”, *Foreign Affairs*, 1997, Vol.76, No.2, pp.2-10.

国际关系。

如果说冷战后美国媒体的国际报道弱化是供求关系变化的渐进过程，其影响面是一般媒体受众，那么，2013 年年底美国政府停止向美国大学提供“敌对国家”报刊的即时译稿，[①]则直接影响美国未来从事外国研究的学者的智识构成和研判能力。这项由中情局运作的项目，从冷战早期就一直是从事“外国研究”的美国大学师生不可或缺的、未经美国官方、媒体和智库“过滤”的“第一手资料”（primary source，或“原始资料”），尤其是对于外语水平普遍低劣的美国学生来说。

对于如此釜底抽薪式的“断供”，美国官方并未作出任何解释。但笔者猜测，2013 年 5 月前情报人员斯诺登“出逃”，将美国对世界和本土庞大的监听系统公布于世，海内外“恶评”如潮，严重损害美国形象。取消面向美国最具独立思考的群体（大学生）的即时译稿，至少短期内便于维持美国政府和政策在美国国内的合法性。在互联网时代，如果难以在美国以外的世界一手遮天，“家丑”不可“内扬”应该是美国断供即时译稿的考量之一。[②]类似的信息“管控”现象在美国十分普遍，比如主流媒体对中国电动汽车和六代机信息几乎全面封杀，杜撰中国“资助”美国反数据中心运动，[③]对美国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离职前公布的“深层政府”在世界各地开设的 120 余个生物研究室保持集体沉默，[④]等等。

斯诺登事件发生之时，正值奥巴马对华政策由一任初期的拉拢合作，转

① 美国军方于 1941 年 2 月开始监听、收集和分析轴心国对美进行的广播“宣传战”，战后将此监听系统命名为“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FBIS），并于 1947 年将其编入刚刚成立的中情局。20 世纪 50–60 年代，该监听系统仅对极少数美国知名高校的研究机构开放，1974 年开始对全美所有院校提供装订成册的译文，并于 1996 年通过“World News Connection”平台上网。该项免费服务于 2013 年年底终止，但相关政府部门仍继续使用。

② 即便美国官方、智库和民间近年来大力推进翻译中国政府、科研单位、军方、媒体各类文件、论文和讯息，如《2024 年开放翻译中心法案》，其发送对象仍是政府决策部门、智库等“小众”单位，以弥补 2010 年以来美国在华人力情报网逐渐缩小的缺失。与此同时，FBIS 对美国大学的“断供”是永久性的。

③ 狄薇薇：“‘中国资助美国人反数据中心’？美国为何开始流传这一谣言”，观察者网，2026 年 6 月 17 日，https://www.guancha.cn/diweiwei/2026_06_17_820763_s.shtml

④ “DNI Gabbard Reveals Evidence of U.S. Taxpayer-Funded Global Biolab Program”, *ODNI*, June 12, 2026, https://www.odni.gov/13629/pr-10-26/

向强硬与战略竞争之际。[①]美国国内各种怀疑、指责、攻击和惩罚中国的言论和行动甚嚣尘上，形成了“十年来最大的反华浪潮”。[②]而在此前美国大选中，争取连任的奥巴马与共和党竞选人罗姆尼都竞相指责中国是“骗子”，罪名是窃取美国高科技、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机密。[③]到了特朗普一任的贸易战和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境中（AngloSphere）已成为世间万恶之源。[④]而处于这个日益闭环的“小院高墙”内的西方精英对外部世界的傲慢与偏见，令新加坡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震惊不已：

> 美国无疑拥有全球最自由的媒体环境，汇聚了世界上财力最为雄厚的报纸和电视媒体；但每当我踏足美国，走进酒店的客房并打开电视时，我却感到自己仿佛与世界其他地方彻底隔绝了。美国舆论界那种极度的封闭与狭隘，简直到了令人惊恐的地步。……无论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是《华尔街日报》，这些媒体圈内的记者和评论员，都陶醉于一种近乎“近亲繁殖”般的封闭式话语体系中；他们彼此强化对方的既定视角，最终导致对外部世界产生严重误读。……然而西方主导世界历史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学会去理解和接纳非西方的世界观与视角。令人震惊的是，在许多方面，美国的知识分子甚至落后于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后者对于全球局势的动态有着更为敏锐且全面的认知。[⑤]

置身于如此扭曲的政治文化氛围之中，西方学界尤其是笔者所关注的中

① H.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美国国防部 2012 年 1 月发布的《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 世纪国防重点》将“亚太再平衡”作为美国国家防务政策的要点。Se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2012, p.2.

② 参见“美国掀十年来最大反华浪潮 中国威胁论出新变种”，2012 年 10 月 25 日，https://news.sina.com.cn/c/sd/2012-10-25/122625437463.shtml

③ Bin Yu, “China-bashing ads distract from real issues”, *Global Times*, October 10, 201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④ Joey S. Kim, “Orientalism in the Age of COVID-19”, *LA Review of Books*, March 24, 2020, https://lareviewofbooks.org/short-takes/orientalism-age-covid-19; Tung-Yi Kho, Chi Zhang, “Anti-Chinese Racism, Geopolitics, and COVID-19: A Decolonial Inquiry into Institutionalized Racism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Politics and Security Governance*, 2025, Vol.1, No.1, pp.31-40.

⑤ Kishore Mahbubani, “The western domination of history is coming to an end”, *Youtube*, October 26, 2023, www.youtube.com/watch?v=B3gx12tn9QM&t=45s

俄关系研究圈内，除了在认知层面难以理解和认同中俄间“正常”双边关系以外，[①]近年来多用政治性、侮辱性极强的“axis”（轴心）一词来形容中俄关系，这在美国外交研究圈内几乎泛滥成灾。而引领这一“轴心”潮流的，是笔者熟识的两位主流派学者：澳大利亚旅欧学者波波·罗（Bobo Lo）[②]和美国乔治城大学的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前者的著作《一个轴心，各取所需》（*Axis of Convenience*）可读性极强，其现实主义的视角和作者对中俄关系历史的把握在西论中堪称佼佼者。此书出版前作者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次闭门会议上[③]对笔者说，“轴心”书名是布鲁金斯出版社的建议，因为会“增加销量”。

如果说引领“轴心”潮流的波波·罗是不得不为或半推半就，那么十年后萨特与理查德·埃林斯（R. J. Ellings）抛出的“专制轴心”标签，[④]则是美国学界和智库为期数年、兴师动众的“联俄制华”研究项目的“点睛”之作。这一大型研究项目有数十名学者参与，于特朗普一任前启动，其宗旨是评估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力度、弱点和可切割之处，在政策层面直接呼应特朗普“联俄制华”的意向。[⑤]然而研究结果之一却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内生性”和不结盟属性，不完全取决于中俄各自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⑥]这对“联俄制华”论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缺憾；无奈之余，对中俄关系冠以“轴心”的污名，至少是一种宣泄。2018 年《专制轴心》（*Axis of Authoritarians: Implications*

① 根据笔者观察，西方研究中俄关系领域大概可以分为中俄关系“改善有限论”和“中俄威胁论”两大分支。一方面，现实主义强调国与国之间由于国力沉浮和利益差异而产生的近乎永恒的冲突，中俄关系的任何改善都只能是有限的和暂时的。另一方面，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取向的自由主义认为，只有民主国家之间才能实现永久和平，对非西方的中俄体制具有某种天然的戒备和敌视。参见于滨：“中俄正常关系的再思考：理论、历史与未来”，《俄罗斯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24-30 页。

② Bobo Lo, *Axis of Convenienc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③ “Russia in 2020”, 11th session for the “Working Group on Challenges for Europe, Russia and the Other Former Soviet States”, Chatham House, London, UK, December 10, 2007.

④ Richard J. Ellings, Robert Sutter, eds., *Axis of Authoritarians: Implications of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Seattl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8.

⑤ 参见于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俄温差’”，《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3-41 页；于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文明’问题”，《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 年第 2 期，第 56-74 页。

⑥ See Bin Yu,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ia Policy*, 2018, Vol.25, No.1, pp.12-18.

of China-Russia Cooperation）出版后，“轴心”论在美西国关界和媒体一发不可收。[①]

《专制轴心》一书成为萨特“联俄制华”项目之大成，却完全排除了参与该项目的中俄学者对中俄关系的定位。[②]作为一个美国学界发起的项目，这无可非议，尤其涉及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但也从另一方面凸显了美国学

① See Stuard Reid, “The China-Russia Axi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2026, https://www.cfr.org/articles/the-china-russia-axis; CSIS, “Unpacking the CRINK Axis”, October 28,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npacking-crink-axis; Hoover Institution, “Axis, Rivalry, or Chaos? The US-China-Russia Equation with Michael McFaul”, June 12, 2025, 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axis-rivalry-or-chaos-us-china-russia-equation-michael-mcfaul; “Hal Brands on the Axis of Autocracies”, March 11, 2025, https://chinabooksreview.com/2025/03/11/hal-brands; Hoover Institution, “The Axis Of Chaos, With Matt Pottinger”, May 31, 2024, 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axis-chaos-matt-pottinger; Andrea Kendall-Taylor, Richard Fontaine, “The Axis of Upheaval: How America’s Adversaries Are Uniting to Overturn the Glob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24; Benjamin Kurylo, “Redefining alliances: Explor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China-Russia military axis”, *Comparative Strategy*, 2024, Vol.43, No.6; Merrill Matthews, “20 years later, the ‘Axis of Evil’ is bigger, bolder – and more evil”, *The Hill*, November 29, 2022, https://thehill.com/opinion/national-security/3754480-20-years-later-the-axis-of-evil-is-bigger-bolder-and-more-evil; Miguel Garrido, “Toward a China-Russia axis?” *Modern Diplomacy*, July 30, 2022,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2/07/30/toward-a-china-russia-axis; Lindsay Maizland, “China and Russia: Exploring Ties Between Two Authoritarian Power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14, 2022,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s/china-russia-relationship-xi-putin-taiwan-ukraine; Pavel Baev, Elizabeth Buchanan, and Graeme Herd, “Russia-China Axis: Polar Power-Plays?” The George Marshall European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March 15, 2022, https://www.marshallcenter.org/en/publications/clock-tower-security-series/strategic-competition-seminar-series/russia-china-axis-polar-power-plays; Nicole Grajewski (Harvard Belfer Center), “An Illusory Entente: The Myth of a Russia-China-Iran ‘Axis’” *Asian Affairs*, 2022, Vol.53, No.1, pp.164-183,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illusory-entente-myth-russia-china-iran-axis; Harley Balzer, *Axis of collusion: The fragile Putin-Xi partnership*, The Atlantic Council, December 2021,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s/2021/12/Axis-of-collusion_The-fragile-Putin-Xi-partnership-PDF.pdf; Angela Stent, “Russia and China: Axis of revisionists?” Brookings, February 2020, www.brookings.edu/articles/russia-and-china-axis-of-revisionists; Mark Beeson, “The Axis of Authoritarianism: China, Russia and the New Geopolitics”,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ne 27, 2019,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the-axis-of-authoritarianism-china-russia-and-the-new-geopolitics; Dimitri K. Simes, “Dangerous Liaison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159 (January/February 2019), pp.10-15; Dina Esfandiary, Ariane Tabatabai, *Triple Axis: Iran’s Relations with Russia and China*, London: I.B. Tauris & Co Ltd, 2018; Douglas Schoen, Melik Kaylan, *The Russia-China Axis: The New Cold War and America’s Crisis of Leadership*,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14; William Martel, “An Authoritarian Axis Rising?” *The Diplomat*, June 29, 2012, https://thediplomat.com/2012/ 06/an-authoritarian-axis-rising

② 俄罗斯学者瓦西里·卡申（Vasily Kashin）和笔者均参加该项目，但我们提供的论文却被排除在萨特主编的文集之外。

界对外部参与成分的筛选方式、力度和结果。加上媒体的“自律”（self-censorship），官方的限制（FBIS 对大学断供）——如此“三位一体”的信息阻滞“阀门”，或话语“铁幕”，导致美国公众和精英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相当匮乏，这不是抖音国际版（TikTok）、小红书或单方免签证就可以轻易反转的。在中国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全面赶超西方的当下，美西方会更加倚重“软实力”，强化信息调控，以维护其“精神家园”。

七、学术底线

西方强大话语体系内的华人国关学人具有双向沟通能力，也最能感受“话语铁幕”造成的巨大信息差距。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华人学者/学生来说，所谓“双向”的前提是适应、接受、融入美西学界范式；在几乎“自动”融入的同时，多数华人学者的“反向”行为，往往是以西学范式从事与中国有关的种种研究，不管是为了学业，源自理念，出于兴趣，发挥特长，还是迫于生计。不排除一些华人学者在“帮助”西方研究中国的同时，做出纠正西方偏见的努力。在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甚至种族化的西学之中，华人学子中“懂中文不懂中国”的现象也并非“反常”。

然而笔者所关注的中俄关系研究领域，却有中英俱劣、两语皆疏者在畅行无阻。比如由西方顶级学术出版社（Brill）推出的华裔学者李劼（Jie Li）的《后毛时代中国的苏联学》（*Sovietology in Post-Mao China*），文中舛错百出，实为罕见；不仅完全曲解了引述的 7 本英文文献的原意，这位以中文为母语的作者居然误读并错引中国多位知名的苏联与俄罗斯研究学者（如李静杰、关贵海等），甚至连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被解读为邓担心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①]如此肆意歪曲中英文著作原意、罔顾事实的劣品，包括作者十余年来发表的多篇讨论同一领域问题的学术和媒体文章，居然在若干学术平台通行无阻，令人瞠目。

① See Bin Yu, “Sovietology in Post-Mao China: Aspects of Foreign Relations, Politics, and Nationality, 1980-1999”, *The China Quarterly*, 2024, Vol.258, pp.596-597.

如果说该作者论文[①]的两位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洋博导”对其华人弟子引述的 400 余篇中文资料无从下手的话，他们至少应该对论文使用的英文文献（literature review）有所作为。作为剑桥中国经济史学博士，该论文的第一博导[②]对论文歪曲邓小平南巡讲话毫无察觉，令人难以置信。该书属 Brill“现代中国思想史”（Ideas, History, and Modern China）系列，[③]由两位来自世界顶尖大学的华人学者主持，然而他们指定的至少两名匿名同行评审员（peer reviewers），均未察觉书稿中海量的错误。

至于这位华人学者如何在西学评审制度的繁文缛节中过关斩将，也许只有其本人知晓。一个并非过度的猜测是，此书从博士论文通过（2017 年）到成书上市（2023 年），正值“联俄制华”风靡美国政界、智库和学界之时。经历了新冠、贸易战、科技战和俄乌冲突的中俄关系，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境中已经成为罪恶之源，被冠以各种“轴心”已成常态。作者对中苏/中俄关系的叙事风格和“颠覆性”解读，[④]符合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美西话语氛围；在污名化中俄关系的同时，顺便贬损中国的苏联学，以此突出中国作为西方以外的“他者”的非正当性。如此下来，西学中各类评审关卡或高抬贵手，或形同虚设，或乐见其成，都是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潜规则。

然而此种闭门造车、指鹿为马的文风最终会反噬自身，因为它突破了学术研究的底线，即叙事的基本真实——如何解读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对于中国崛起这一事实，中国的支持者或反对者均基本认同；至于这一崛起是祸是福，便是见仁见智了。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美西情报界内部也不会允许如此歪曲、编造事实的荒唐行为。作为当今国关和地区研究的两份国人与华人

① 李劼论文参见：Jie Li, “Sovietology in Post-Mao China, 1980-1999”, PhD in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017, https://era.ed.ac.uk/server/api/core/bitstreams/26578648-3ca7-45a4-befe-1c1d821e1e35/content

② 该学者曾在中国进修中文，并学习中美关系。

③ See Brill, “Ideas, History, and Modern China”, https://brill.com/display/serial/IHMC

④ 该书以“重新评估”（re-evaluate）当年苏东剧变前后中国的苏联学为由，强调其作为“中共政权”（The CCP regime）的工具，对苏联内部的剧变视而不见的种种“弊端”。其实，此书“批判”的 7 本英文著述对中国苏联学的作用的评估还是相当到位和客观的，全无李书中所云“全盘接受中国的苏联学论点”的蛛丝马迹。See Bin Yu, “Sovietology in Post-Mao China: Aspects of Foreign Relations, Politics, and Nationality, 1980-1999”, *The China Quarterly*, 2024, Vol.258, pp.596-597.

主办的《中国国际政治季刊》和《当代中国》英文学术期刊，必须具有“底线思维”——即遵守叙事的真实度和客观性。[①]在一定意义上，华人学者的所谓“语言优势”可能就是个伪命题。

八、“回到未来”？

2026 ISA 年会有一个题为“跨越时空追梦，奔向未来寻路”（Time, Vision Holders and Way Finders of Viable futures）的分会。这个颇为玄秘又不乏理想主义分会的三个主讲人之一是原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石之瑜（Chih-yu Shih）、现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长聘特聘教授、同济大学全球南方研究中心主任。在为期四天的 ISA 年会上，他主持并参与了九个分会，涵盖多元世界、西方霸权/去殖民化、政治创新与全球南方、国际秩序前瞻、国关研究的“翻译问题”、多元化期刊运作、中国改革开放等理论和现实议题。

数十年间，石之瑜学贯中西，笔耕不辍，发表了百余本中英文著述和百余篇论文。20 世纪 90 年代初，笔者在给普林斯顿大学《世界政治》季刊撰写一篇西方研究中国外交的“领域综述”（review of the field）时，[②]精选了 6 本英文专著，其中就包括石之瑜的始笔之作《中国外交本原论：心理文化视域》，[③]而其他 5 本均出自名家之手：鲍大可（A. Doak Barnett）、罗德明

① 1999—2025 年，笔者为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办的《比较双边关系》季刊（*Comparative Connections*）撰写中俄、中亚问题专栏，每年 3—4 期，每期数千字，直到该刊 2025 年停刊。见：https://cc.pacforum.org/relations/china-russia。文中及时、详细地描述、解析中俄关系、中亚问题、中美俄三边互动的政治、战略和历史背景，大量介绍、分析中俄两国学者的论点，为这一以亚太地区研究为主的政策性杂志，提供了一个具有全球性的非西方视角。为该刊长期撰稿的美方学者包括葛莱仪（Bonnie Glaser，中美关系）、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中国-东南亚关系），康灿雄（David Kang，日-韩朝关系）。《比较双边关系》创办于 1999 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后、美国太平洋论坛与复旦大学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美二轨对话上，笔者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所有对话（1999—2010 年）。地处军事重地夏威夷的太平洋论坛有军方背景，发起人是退役海军少将罗伊德·瓦西（Lloyd Vasey），1989—2018 年，该论坛是 CSIS（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亚洲部，后独立运行。

② Bin Yu,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and Prospect”, *World Politics*, 1994, Vol.46, No.2, pp.235-261.

③ Chih-yu Shi, *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Psycho-cultur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1990.

（Lowell Dittmer）、何汉理（Harry Harding）、沈大伟、艾伦·惠廷（Allen Whiting）等。在当时由“意识形态派”、“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ism）和“认知/误解学派”（perceptoins-misperceptionalism）主导的“中国学”中，刚刚入行的石之瑜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外交中的惯性和力度，在笔者看来具有相当的“开创性”（“pioneering”）。

2026 ISA 年会期间再次见到石之瑜时，花甲之年的他已经在引领与西方主流国关理论对应的“多元国际关系理论”（Pluriversal IR Theory），意在后霸权时代，将中华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的“关系主义”）与全球南方的反殖民视角深度结合，重构国际关系的智识体系。石之瑜的多元国关理论并非要简单地对冲西方线性的、零和式的、固化的“进化”史观（即国际关系会朝着某种普世价值前行），而是以“回归未来”[①]的方式，重拾被殖民史所遮蔽/压抑的传统联系纽带，即共生互利、即兴（improvised）灵活的互动与实践过程。在这一拒绝“公式化”、非纯粹“实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的动态互动中，强者为了维系“关系均衡”（balance of relationships），反而常常主动让步。国际关系的主体需要在持续互动中，不断定义自身角色的存在，而不是成为西方国关理论中追求绝对利益、无情无义无感的独立个体。国际关系不仅是硬碰硬的实力游戏，更是以人为本、有温度、需要经营与维护的国家间关系网络。[②]

① 《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是 1985 年在美国上映的科幻喜剧片。

② 石之瑜有关主要著作：Chih-yu Shih, *Chiung-Chiu Huang, and Yih-Jye Hwang, Decoloniz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6; Chih-yu Shih, “Practicing Plurivers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utheast Asian Subaltern Sites”, *China Review*, 2025, Vol.25, No.2, pp.15-41; Chih-yu Shih, “Practicing Plurivers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outheast Asian Subaltern Sites”, *China Review*, 2025, Vol.25, No.2, pp.15-41; Chih-yu Shih, *Confucian Governmentality and Socialist Autocr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UK.: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2024; Chih-yu Shih, *Relations and Roles in China's Internationalism: Rediscovering Confucianism in the Pluriversal Worl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24; Chih-yu Shih, *Post-Chineseness: Cultur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22; Chih-yu Shih, *Ero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Feminizing and the Claiming of Postcolonial Chinesenes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2; Chih-yu Shih, *Sinic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 Civilization and Intellectual Politics of Subaltern East Asia*, London: Palgrave, 2013; 石之瑜：《国际政治学的关系理论与中国》，台北：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2021 年；石之瑜：“国际关系中的‘关系’理论与‘后华性’实践”，《东南亚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1-17 页。

石之瑜对中华及非西方史的执着，至少有三个意义。一是质疑、驳斥西学远离历史、追求理论纯洁度、科学化和普适性的极端属性。其中既有自由派“终结论”对历史抽刀断水式的幼稚，也有现实派对文明冲突而非互动/共存的偏执；建构主义创始人亚历山大 •温特甚至公开宣称：“我是理论家，不谙历史”。[①]二是在中国国关学界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寻求和建构自主体系的同时，将非西方的“关系均衡论”提升至与西学的“实力均衡论”并列的理论高度。[②]三是石之瑜的多元国关论不仅再现了国际关系中以人为本的正常态势，也揭示了西学背后的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去”，即西方历史中缺乏一个与中华传统相对应的、持久的“关系均衡”机制。欧洲天主教千年的“黑暗时代”（公元 5—15 世纪）之后，宗教改革（Reformation）所引发的持续的教派之争在“三十年战争”期间（Thirty Years War，1618-48）达到顶峰，欧洲中部德意志地区人口几乎腰斩，百年后才勉强恢复到战前水平。[③]取而代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虽然结束了基督教内部教派间的杀戮，却开启了长达数百年战乱频仍的“西方内战”，包括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④]1500 年欧洲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多达 500 余个，到 1900 年仅剩 20 个，永久淘汰率为 95%。相比之下，东亚传统的区域体制从 14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下半叶的 500 年间，实力绝对强大的中国鲜有对邻国长期占领的记录，中国周边的主要政治实体基本得以存续。[⑤]

其实亨廷顿“西方内战”之说的内涵和外延都相当成问题，它完全回避

① 温特 2004 年到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后，在莫尚中心（Mershon Center）的一次冷战史的研讨会上说：“I am a theorist. I do not know history.”

② 关于中国国关界对“传统-现代/西式”路径的争议与探索，见赵汀阳：《天下体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1 年第 1 期，第 29-58 页；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7 期，第 4-22 页。

③ P. Geoffrey, “Crisis and Catastrophe: The glob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econsidere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8, Vol.113, No.4, pp.1053-1079.

④ 亨廷顿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 年）至冷战结束（1991 年）定义为西方内战（Western Civil War）。See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 Vol.72, No.3, p.23.

⑤ David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 82-106.

了西方上升时期[①]对外殖民、扩张和贩奴的历史，而亨廷顿在后冷战时期推出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在认可对非西方弱小国家的单向屠杀。“9•11”后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在大中东地区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近 500 万人死亡和数千万难民，[②]这还不包括 2023—2025 年巴以战争中死亡的近 6 万巴勒斯坦人和死于美国、以色列对伊朗战争中的 7000 余人。[③]2026 ISA 年会期间，笔者对参会的其他美国学者谈起死于美军空袭的 165 名伊朗女孩时，哥伦比亚大学的伊丽莎白 •维什尼克（E. Wishnick）直接用“旧地图”（old map）搪塞过去。美国政军学界对“旧地图”的“依赖”，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④]

其实美国和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一直在遵循自身“去历史化-再历史化”[⑤]的逻辑“回到未来”。格雷厄姆 • 艾利森（G. Allison）“修昔底德陷阱论”的历史坐标基本源自西方，[⑥]米尔斯海默则认定美国百余年前对西半球实行的地区霸权主义是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⑦]二人均无法超越西方自身的历史轨迹来审视非西方世界。在政策层面，则有特朗普二任宣布将美国的全球霸权收缩至西半球的“唐罗主义”。[⑧]当年西奥多 • 罗斯福（T. Roosevelt）“微言在口，大棒在手”（“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如今特朗普则是恶语加大棒，不加任何掩饰地在西半球敛财圈地，甚至不惜摒弃、打烂自由主义与建制派经营了 80 余年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① 即 14—17 世纪的文艺复兴，15—17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及 18—19 世纪的工业化。
② “Cost of War Project”, *Brown University*, June 2026, https://costsofwar.watson.brown.edu/costs/human
③ H. Duggal, A. Chughtai, “By the numbers: 100 days of the US-Israel war on Iran”, *Aljazeera*, June 7, 2026.
④ 37 年前的 1999 年，美方也用“旧地图”，“误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⑤ 参见任晓：“国际关系学的‘去历史化’和‘再历史化’——兼疑‘修昔底德陷阱’”，《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 年第 7 期，第 142-154 页。
⑥ 艾利森讨论的 16 个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例子中，日本作为崛起势力挑战中俄美，这里日本的崛起应该是彻底西化（脱亚入欧）的日本，但艾利森并未指出或意识到，历史上弱小的日本曾多次入侵中国和中国的藩属国朝鲜。See G.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4, pp.268-270, 279.
⑦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401.
⑧ B. Stelter, “How right-wing media inspired Trump’s ‘Donroe Doctrine’” *CNN*, January 5, 2026, https://www.cnn.com/2026/01/05/media/trump-donroe-doctrine-ny-post-fox-news

International Order），大有“一夜回到解放前”之势。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期间，笔者在一篇分析中俄关系的文中提出“西方内战 2.0”的概念，而到 2026 ISA 年会期间，这个定义显然已经过时。[①]西方主体（欧洲）和主要“分支”（美国、以色列）都在与西方核心以外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犹太复国主义用 2400 年前的《旧约》使其领土扩张合法化，特朗普及其白人福音教派的基本盘则认为美国有神圣使命去支持这一进程，以确保自身得到上帝的祝福。[②]伊朗战争开打后，美军高官为鼓舞士气则大谈对伊朗的战争是秉承上帝的旨意。[③]

即便是在尚无大规模战事的亚太，日本右翼也在快速“回归”那个久违的、诱人的、81 年前被迫放弃的“正常”的日本。这个地处亚洲大陆边陲的岛国，1868 年开始以“复古”名义实现其西式现代化（即明治维新），在以后的 75 年间释放出惊人和疯狂的战争潜力（1945 年与中美苏三个大陆国家同时处于交战状态），如今正在以与百余年前极为相似的方式（“满洲/台湾有事”）修宪强军、“回归未来”。而日本一旦做出这一零和式的抉择，便很难改弦更张。

国际社会“回归”暴力的丛林时代，西方建制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后冷战期间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based order”）的另一面，则是对非西方世界的所谓“无限战争”（forever wars）。[④]21 世纪头 20 年，美西方在世界各地投掷了 33.7 万枚航空炸弹和火箭/导弹，日均 46 枚。[⑤]如此的暴力输出也给西方带来沉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负担，最终反噬西方本身。如今西方政治极化，宗教政治化，精英失能，底层民粹，极右崛起，西方各种极端势力，都在以使各自族群和理念“再伟大”的方式，将世界拖回“史

① Bin Yu, “‘Western Civil War’ Déjà Vu?”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2014, Vol.16, No.1.
② 以色列认为《旧约》中说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是其“应许之地”，从而为其定居点政策和领土主张披上神圣合法性外衣。B. Evansky, “Israel’s U.N. Ambassador gives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 history lesson on the Bible”, *Fox News*, April 30, 2019.
③ N. Mena, “U.S. troops told Iran war is ‘part of God’s divine plan’, alleges religious watchdog”, March 5, 2026, https://premierchristian.news/en/news/article/us-troops-told-war-on-iran-is-part-of-god-s-divine-plan-alleges-religious-watchdog
④ 2026 年 6 月 7 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谈中仍在否认与“无限战争”的关系。
⑤ M. Benjamin, N. Davies, “The U.S. drops an average of 46 bombs a day: Why should the world see us as a force for peace?” *Salon*, January 22, 2022.

前”时代，“历史终结论”真正终结的，也许是亿万人伤亡换来的战后秩序。而西方和“西化”的日本的这一“过去式”的未来，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也许不会再有输赢（者）之分。

在这个意义上，石之瑜的多元国关论和关系均衡论，除了在国关理论层面的创新以外，其实是在用东方文明中人性化的“情理”智慧[①]去解构西方线性的、机械的、而且往往是暴力的“物理”逻辑。然而，相对于中国在政策层面对冲上述西式“回归”态势的努力和建树——“一带一路”以及一系列全球倡议的实践[②]——非西方国关范式的发展与确立仍步履艰难，荆棘满途。2026 ISA 年会上，石之瑜超负荷运行（9 场分会），但面对固化的西论极其众多信徒，仍显势单力薄。

然而，探求非西方国关理论的过程已经启动，更不会停顿。国关界中石之瑜的同路人已多有建树，他们当中既有以西人熟悉的思维结构和表述方式，把（西方）读者引入一个自认为是理性、科学、道德制高点但实际却是非理性非科学欠道德的“混沌”之地的潘成鑫，[③]也有“中学固本、西向叩真”的赵汀阳、阎学通、秦亚青等，[④]更有海内外众多深耕西学、兼顾中西者，[⑤]以

① 石之瑜关于东方人性化的“关系均衡论”，与冯时近期提出的“8000 年中华文明论”中天文与人文密切相关的“三要素”相当契合，即“道德立人之本，知识立身之本，礼仪治世之本”。参见冯时：《文明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 年。

② 即 2021 年 9 月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2022 年 4 月的全球安全倡议，2023 年 3 月的全球文明倡议，以及 2025 年 9 月的全球治理倡议。参见白乐：《四大全球倡议共创人类美好未来》，中国社会科学网，2025 年 10 月 17 日。

③ See Chengxin Pan, *Knowledge, 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 UK: Edward Elgar, 2012. 中文版：[澳]潘成鑫著：《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序言见于滨：“西方‘中国叙事’的迷失”，https://mt.sohu.com/20161107/n472548151.shtml

④ 赵汀阳：《天下体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T. Zhao, *All-under-heaven: The Tianxia System for a Possible World Order*,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1；阎学通、张旗：《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X.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秦亚青等：《关系主义：理论发展与实践检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 年；Y. Qin,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⑤ 如美利坚大学的赵全胜，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的孙太一，美国巴克内尔大学的朱志群等。

及仍在美式“白色恐怖”中“放低身段”或隐姓埋名的新一代旅美学人。[①] 他们的共同目标不仅在于讲好“中国故事”[②]——无论是为了争夺话语权，还是为了影响/塑造西式的“中国学”——还在于必须也应该最终扭转数百年来西学东渐的不对称态势，建立一个中华文明与世界互动和交流的智识体系，包括中式高水平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它既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着眼于全球治理的实践和文明交融的理想。[③]

九、结束语：中美交流——从锈带的热络到“乡下人的悲歌”

会间遇到的美国学者，一个共同的感受是“过去的回不来了！”学者间相对“正常”的交往时代已一去不返，如今人是而物非，需要重新“发现”对方。如此恍若隔世之感，主要原因是中美关系全面退化以至敌对。就在这场年会前夕，兰普顿（D. Lampton）和王缉思两位学者在美国《外交事务》季刊上发文，警告中美关系已“濒临深渊，必须悬崖勒马”。[④]

即便在十年前，中美学术交流还算“正常”，包括地处美国中西部“锈带”哥伦布市的俄亥俄州立大学。该校除了橄榄球队出类拔萃以外，也是国关界建构主义的大本营，[⑤]更是中国学生学者聚集之地，在美国高校中名列前茅。[⑥]为了扩大来自中国的生源，俄亥俄州立大学在北京、上海、广州、

① 如获微微（笔名），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author/diweiwei；高天滚滚（笔名），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author/youziyi

② “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求是网，2024 年 11 月 11 日，https://www.qstheory.cn/qshyjx/2024-11/11/c_1130218037.htm

③ “文明交融论——基于突出特性与价值立场的中华文明新主张”，新华网，2024 年 10 月 9 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41009/ac2e121c3d3d4e428f72660c1fa508ad/c.html

④ D. Lampton, J. Wang, “America and China at the Edge of Ruin: A Last Chance to Step Back from the Brink”, *Foreign Affairs*, 2026, Vol.105, No.2.

⑤ 其领军人亚历山大·温特自 2004 年起就在此执教。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2017 年的全美“教学、科研、国际政策”评选将温特评为“2007 年以来最有影响的国关学者”。See *TRIP 2017 U.S. Faculty Survey Report*, 2017, https://trip.wm.edu/dashboard/faculty-surveys/fs017/TRIP_2017_U_S__Faculty_Survey__Topline_Results_Final.pdf

⑥ 2017 年，俄亥俄州立大学有 4366 名中国留学生，超过该校国际学生总数的一半，占在校学生总数的 13.68%。

深圳、香港、台北设有“中国门户办公室”（China Gateway office）。[①]2010 年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上海浦东办公室开张时，笔者问时任俄亥俄州立大学校长戈登·吉（E. Gordon Gee）打算招收多少中国学生，他不假思索地答道：“上不封顶”（“as many as possible”）。

在过往“岁月静好”的年代，位于锈带中心的俄亥俄州与中国国关学界的交往相当热络，到访者包括北大的朱峰，复旦的吴心伯、任晓，上海美国学会会长丁幸豪，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等。[②]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莫尚中心（Mershon Center）专注于安全、外交和军事史研究，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曾与复旦大学共同发起中美两国青年国际安全问题学者论坛，参加者包括王义桅、牛军等知名学者，中方领队唐世平教授还与莫尚数位学者一道，深度参与美西国关界对战争、联盟、世界秩序等历史和理论问题的探讨，成果甚多，在中外国关界独树一帜。[③]如今中美关系寒风阵阵，莫尚中心对华交流也戛然而止，其关注点也顺势转为“中国军事威胁”、台海等问题。

中国学者“深入”美国腹地，近距离体察尚未“过度”多元化、或一个更真实的美国，其实也符合美国学界一些人的意愿。20 世纪 90 年代台海危机后不久，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数次呼吁，美方应尽可能安排来访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上山下乡”，前往超级爱国的美国乡村小镇，一睹随处可见的美国国旗和阵亡者墓地，以期改变中方认为美国公众“无所事事”、“贪图享乐”（“apathetic and indifferent... interested in only money and comfort”）的刻板印象，防止中方对美国参战“意

① 参见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中国门户”网页（https://oia.osu.edu/gateways/china-gateway/about-china-gateway）。

② 潘光教授除了参加俄亥俄州立大学安排的专场研讨会外，还走访犹太社区、会堂，直接向普通美国犹太人讲述二战期间中国社会救助犹太难民的历史。

③ 唐世平提出的“内源性”（endogenous）、“国关进化论”（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完美解决了”（neatly resolve）西方进攻-防守现实主义之间多年的论争，认为国际政治不会倒退回进攻性现实主义所描绘的那种“肮脏、野蛮且短暂”的世界，也不会陷入某种（漫长的）周期性循环。See Ship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0, Vol.16, No.1, pp.31-55;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志和持久力”（resolve and staying power）产生误判。[①]

象牙塔内的柯庆生也许没有意识到，早在中美建交之初的 70 年代，州府哥伦布市以西 50 英里的代顿市（Dayton）[②]就开创了中美学术交流的先河。该市的凯特琳基金会（Kettering Foundation）规模不大，但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和北大等院校建立了定期访学制度，历届美国所领导（在吴白乙以前）都曾到此访学、交流。该基金会的中国项目停止后，[③]代顿市的“中国痕迹”由中国企业家曹德旺投资的“福耀玻璃”传承下去。这不仅为当地提供了数千全职制造业职位，以福耀为主题的影片《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得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高度认可，并获得 2020 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

然而福耀在当地一直跌跌撞撞，命途多舛。各种劳工诉求和法律诉讼没完没了，甚至国土安全部还数次插手调查福耀的“不法行为”，令中方不胜其烦。[④]就在 2026 年 3 月 22 日 ISA 年会开会的当天，福耀发生了一场大火，足足烧了三天，严重破坏了这座世界最大的汽车玻璃工厂的厂房和设备。迄今为止，失火原因仍未确定。就在福耀火灾 10 天前，一把大火烧毁了正在波斯湾附近执勤的美国福特号核动力航母的洗衣房和部分睡卧区，此前该舰厕所系统多次大面积堵塞，人为痕迹明显。[⑤]毕竟，美国破坏性的劳资关系

① 2006—2008 年柯庆生任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此前笔者两次听到他本人谈及此事，文字表述见 Thomas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4 (Spring 2001), p.40.

② 位于代顿市的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Wright-Patterson Airforce Base）拥有美国空军最大的研发基地和情报中心。1995 年，波黑战争的交战各方在此签署和平协议，即《代顿协议》。

③ 2006 年到访的北大国关院的唐士其教授（后任该院院长）是该基金会资助的最后一位中国的访学者。

④ “Fuyao: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Dayton Chinese manufacturer”, *Dayton Daily News*, July 27, 2024, www.daytondailynews.com/local/fuyao-everything-you-need-to-know-about-dayton-chinese-manufacturer/article_9c848d00-df6e-5b13-bc58-127ae4e5e16a.html

⑤ 超长时间的海上作业导致舰上人员的身心问题，显然是这些破坏行为的重要因素。M. Saunokonoko, “Fire damage, clogged toilets, and sinking morale: USS Gerald R Ford to set sail for repairs in Crete”, *Guardian*, February 21, 2026, 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6/mar/18/onboard-fire-uss-gerald-ford-aircraft-carrier?utm_source=chatgpt.com

举世闻名。[①]福耀火灾后一个月，曹德旺表示：“如果遇到不讲道理的情况，大不了我就把（美国）工厂关掉。”[②]

没有迹象表明福耀会在短期内关闭其在代顿市的工厂，恰恰相反，这条产销业绩良好的生产线正在进行为期数年的扩建工程（大火烧毁的是扩建部分）。然而也没有迹象表明福耀的存在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个位于锈带中心地区的衰败之相。福耀投产一年后（2017 年），代顿市所在的蒙哥马利县（Montgomery）因阿片致死 566 人，平均 10 万人中达 100 余人，而全美平均值仅为 10 万分之 15。高峰时期，代顿市的停尸房爆满，不得已启用冷藏货箱车临时存储尸体，《纽约时报》还为此发了专文。[③]这是否是后冷战时期美国的第一道“斩杀线”，还有待考察，美国下一次大范围征用冷藏货车用于藏尸还是三年后的新冠时期，[④]美国死亡 110 万人，为世界之最。[⑤]

从代顿市驱车沿 75 号公路南行 25 分钟，便是现任副总统万斯的家乡米德尔敦（Middletown）。他在自传《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中，细致描述锈带白人劳动阶层的艰难和绝望，由此一炮走红。然而 ISA 年会结束后数天，万斯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居然用带有明显贬损意味的词汇“乡巴佬”（peasants）来形容全体中国人，[⑥]这其中当然包括早年在中国农村种田放牛、如今在代顿市投资数亿美元的曹德旺老先生。美国政治精英的无知无畏无礼，令人瞠目。然而这位共和党的明日之星，除了把小镇的悲歌唱遍美国外，对

① K. Thelen, “Where are the employers?American labor rela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October 1, 2021, https://www.epi.org/unequalpower/publications/american-labor-relations-comparative-international/

② “曹德旺：绝不做赔本买卖，大不了关掉美国工厂”，新浪财经，2026 年 4 月 23 日，https://finance.sina.com.cn/wm/2026-04-23/doc-inhvkyvy4244682.shtml

③ Kimiko de Freytas-Tamura, “Amid Opioid Overdoses, Ohio Coroner’s Office Runs Out of Room for Bodie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02/us/ohio-overdose-deaths-coroners-office.html

④ “Refrigerated Trucks as Morgues: A Chilling Look at Emergency Solutions”, *American Mortuary Equipment*, June 26, 2025, https://www.mymortuarycooler.com/blogs/news/refrigerated-trucks-as-morgues-a-chilling-look-at-emergency-solutions

⑤ Christopher Troeger, “Just How Do Deaths Due to COVID-19 Stack Up?” *Think Global Health*, February 15, 2023, https://www.thinkglobalhealth.org/article/just-how-do-deaths-due-covid-19-stack

⑥ M. Nied, “JD Vance Blasted ‘Chinese Peasants’ in a Fox News Interview. Now China’s Hitting Him with Brutal Comebacks”, April 8, 2026, https://people.com/jd-vance-blasts-chinese-peasants-china-hits-back-11711219

自己位于锈带中心地区的家乡的脱贫、振兴毫无建树，其僵化的反环保理念甚至在阻碍小城破旧的制造业的转型，[①]当然也无法理解更无力应对经历了百余年苦难与辉煌之后的东方工业强国。

ISA 年会以外，美国锈带正在以其特有的方式和节奏，为中美两国精英和大众审视过往、管控现状、规划未来，提供一个算不上公平但却可以听言观行的现实场景。

（责任编辑　童　珊）

① M. Muir, A. White, “How JD Vance’s hometown fell foul of Trump’s clean energy cuts”,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 2025, https://www.ft.com/content/d11fab1f-cd00-4e5f-9474-d5d6e9a7dc77; S. Starr, “JD Vance did nothing as Trump cuts cost his Ohio home town millions. Will it reshape the city council?” *Guardian*, October 29,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5/oct/29/jd-vance-middletown-ohio-city-council-race

非洲政治格局中全球大国、地区大国与关键国家的互动逻辑研究*

赵雅婷**

【内容提要】近年来，全球大国竞争持续向非洲延伸，但非洲政治格局的演变已难以用单一的大国竞争逻辑解释。其中，俄罗斯依托军事安全合作、主权叙事和灵活的政治伙伴关系等，在部分地区形成了与其总体经济实力并不完全对称的影响。进入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以来，非洲政治格局主要呈现自主性上升、碎片化加深、安全秩序重组和资源通道政治凸显四重图景。本文在梳理大国竞争、地区秩序、非洲自主性和网络权力等研究基础上，将政治格局主导权拆解为议题设定能力、资源动员能力、区域传导能力和格局触发能力四项判断指标，构建“四重图景-三类主体-四项能力”的分析框架，并结合非盟加入 G20、萨赫勒危机、红海-东非安全复合体和洛比托走廊四个案例，对不同政治图景中的主导力量及其互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非洲政治格局变迁并不存在单一、固定的主导者，而是全球大国和域外力量、地区大国和区域组织以及关键国家和节点国家在不同能力维度上差异化发挥作用的结果。其中，全球力量主要体现为议题设定和资源动员，地区力量承担区域传导和秩序协调，关键国家则通过控制安全、资源、通道和制度节点发挥格局触发作用。不同政治图景对应着不同的能力组合与主导方式，差异化主导与复合互动构成当前非洲政治格局变迁的基本逻辑。

【关键词】非洲政治格局　差异化主导　大国竞争　地区秩序　关键国家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5-0066(28)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学术研究项目“非洲自主发展新环境下中非合作机制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25SGC116）的阶段性成果。
** 赵雅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副教授，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南非研究中心秘书长。

近年来，非洲政治格局正经历新一轮结构性调整。一方面，全球大国和域外力量持续加大对非投入，中美俄欧以及日本、印度、土耳其和海湾国家围绕安全合作、基础设施、关键矿产、供应链、数字技术、港口航道和全球治理代表性展开多层次竞争；另一方面，非洲大陆内部的政治力量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非盟和非洲国家的全球代表性有所提升，地区大国的区域领导能力出现分化，一些并非传统意义上“大国”的关键国家则凭借安全、资源、通道和制度节点，对区域政治走向产生了超出其综合实力的影响。由此产生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非洲政治格局变迁中，究竟是谁在发挥主导作用？是全球大国，还是地区大国，抑或是地区关键国家？

这一问题不能简单用“谁实力最强”来回答。全球大国虽然拥有较强的议题设定和资源动员能力，但其影响并不会自动转化为非洲地区的政治结果，而必须经过区域组织、地区大国和关键国家的吸收、传导与重组。地区大国和区域组织虽然具备一定的秩序协调能力，但其现实作用受到成员国分化、机制约束和资源能力等因素影响。与此同时，一些关键国家和节点国家凭借制度退出、资源控制、港口通道、安全危机和调停地位，正在获得更为突出的格局触发能力。由此可见，非洲政治格局的变迁并不是单一层级力量单向塑造的结果，而是全球大国、地区大国和关键国家在不同议题、不同区域和不同机制中互动的产物。

因此，本文首先试图概括当前非洲政治格局变迁的四重图景，通过梳理既有文献推导出塑造非洲政治格局变迁的主导性判断指标，并在该指标下考察全球大国、非洲地区大国和地区关键国家的力量差异与现实表现，进而构建非洲政治格局发展趋势的分析框架，随后以四个案例检验不同图景中的主导力量，以论证各种力量在非洲政治格局变迁中的互动逻辑。

一、非洲政治格局的四重变化图景

进入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以来，非洲政治格局受到内外因素的多重影响，正进入快速变动期，具体体现为主体地位、空间结构、安全秩序和政治经济节点等四个层面的多重调整。在主体地位层面，非洲国家和非盟正在由外部竞争的被动承受者，逐步转向更具议价能力和议程塑造能力的行为体；在空

间结构层面，非洲大陆内部的区域差异、机制分化和议题分散日益突出，整体性政治空间呈现出更加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在安全秩序层面，传统安全伙伴关系和区域安全机制正在受到新兴外部力量、跨区域风险和本地安全诉求的共同冲击；在政治经济节点层面，关键矿产、港口、铁路和经济走廊日益成为大国竞争与非洲国家战略选择相互交汇的重要载体。上述变化彼此关联，但又各有侧重，共同勾勒出当前非洲政治格局变迁的基本面貌。

（一）自主性上升：非洲不再只是大国竞争的被动场域

非洲大陆与区域国家的自主性上升是当前非洲政治格局调整中最显著的变化。在新冠疫情冲击下，2020 年百位非洲学者发表致非洲领导人的公开信，提及“第二次非洲政治独立”，即非洲应结合本土的社会语境重新思考国家治理、司法公正、权力平衡和泛非合作。[①]随后，非洲自主性上升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学者们指出，面对加速演变的国际体系转型态势，非洲国家在进入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迎来“再次觉醒”。[②]其核心是全面提升战略自主性。[③]主要表现为，非洲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由被动接受外部议程，逐步转向主动争取代表性、选择合作伙伴并塑造合作条件。其根本性变化不是外部介入的消失，而是非洲行为体利用大国竞争、制度调整和自身战略价值上升，扩大了政策选择和利益表达的空间。

第一，非洲集体代表性的提升，强化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代表地位。长期以来，非洲在主要全球治理平台中的制度性代表较为有限。南非曾长期是 G20 中唯一的非洲国家，在 2024 年金砖扩员前也是该机制唯一的非洲成员。非洲大陆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代表席位，与其人口规模和发展诉求长期不相匹配。2023 年 9 月，G20 新德里峰会正式接纳非盟为永久成员，使非洲首次以大陆组织身份进入全球主要经济治理平台。[④]这一历史性

① “Open Letter from African Intellectuals to Leaders over COVID-19”, April 17, 2020, https://www.aljazeera.com/features/2020/4/17/open-letter-from-african-intellectuals-to-leaders-over-covid-19

② 叶海林、吴传华、沈晓雷：“非洲：在觉醒和变革中探寻联合自强之路”，《光明日报》，2024 年 12 月 25 日第 12 版。

③ 张春、刘扬：“非洲‘再次觉醒’与自主现代化道路探索”，《西亚非洲》，2026 年第 1 期，第 29 页。

④ “G20 New Delhi Leaders’ Declaration”, September 2023, https://www.mea.gov.in/images/CPV/G20-New-Delhi-Leaders-Declaration.pdf

事件促使非洲共同立场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制度性表达渠道。2025 年 11 月，南非顶住美国压力主办 G20 峰会，实现了 G20 首次在非洲大陆的成功举办。南非将峰会主题设定为“团结、平等、可持续发展”，非盟围绕债务可持续性、气候融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能源转型和非洲工业化等议题协调成员国立场，把非洲发展优先事项纳入核心议程。峰会通过了反映非洲及全球南方国家诉求的《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这表明，非洲的全球治理参与正由个别国家的分散表达，逐步转向以非盟为载体的集体议程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洲已从全球治理的“边缘地带”走向“中心舞台”。

第二，非洲奉行“多向结盟”策略扩大自主选择空间。该策略可以理解为，非洲国家主动推动以伙伴关系多元化、避免单向依赖、拓展战略空间并最大化获取发展资源与政治支持为目标的外交策略。在实践中，一是促使传统合作伙伴实现对非战略调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虽继续奉行“美国优先”，但仍围绕关键矿产、贸易和安全合作，选择性加强对非布局；与此同时，法国、日本和欧盟也相继调整对非政策，推动对非关系由传统援助、主导和依附模式，转向更加平等、战略化和供应链导向的伙伴关系。二是巩固与金砖国家的合作关系。2023 年，印度积极助力非盟加入 G20。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2025 年，第二届俄罗斯-非洲伙伴关系论坛部长级会议召开，双方合作在保持军事安全合作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覆盖粮食安全、能源、教育和多边协调等领域。[①]俄罗斯作为区别于传统西方国家的重要合作对象，为部分非洲国家实施多元伙伴外交、扩大对外选择空间提供了新的政策选项。三是努力拓展新的伙伴关系网络，以阿联酋和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以主权财富基金为杠杆，在非洲港口、物流、可再生能源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土耳其则是经济和安全投入并重，其与非洲的安全合作涵盖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利比亚等国。[②]

第三，非洲国家越来越强调以自身发展优先事项引导外部合作，对外政

① “Joint Statement by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Second Ministerial Conference”, December 20, 2025, https://cdn.summitafrica.ru/en/archive/2025/ministerial-conference/declaration-2025

② Sefa Ikpa, “Africa in the Age of Many Powers”, November 3, 2025, https://www.ips-journal.eu/topics/foreign-and-security-policy/africa-in-the-age-of-many-powers-8652

策呈现出更强的务实性和条件性。在政策层面，非洲以《2063 年议程》、绿色矿产战略、气候战略和债务共同立场界定自身优先事项。其中，《2063 年议程》将包容性增长、工业化、区域一体化和自主发展置于大陆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并强调非洲应从主要依赖初级产品出口转向价值增值和产业多元化。[①]在实践层面，非洲国家追求资源主权，以强化集体议价、控制关键矿产、延伸本土产业链等方式，试图重构规则，以掌握发展主动权。同时，非洲国家致力于改革全球金融体系。2025 年南非 G20 峰会的非洲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呼吁扩大优惠融资，改善信用评级机构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并进行改革以消除对非洲风险的偏见认知。[②]联合国气候大会上，非洲主张推进公正能源转型，强调能源可及性优先，并要求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基础上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以上充分说明，非洲开始更主动地界定合作内容，设置合作条件，并争取符合自身发展目标的合作结果。

（二）碎片化加深：区域差异、机制分化与议题叠加更加突出

非洲政治格局的碎片化主要表现在统一的大陆议程与差异化的地区现实同时增强。尽管非盟《2063 年议程》将建设一体化、繁荣与和平的非洲确立为长期目标，八个区域经济共同体也被视为非洲经济共同体的基本支柱，但在现实运行中，不同区域的问题结构、机制效能和议题组合日益分化，非洲政治越来越难以由单一的“大陆整体”加以概括。

第一，区域碎片化表现为非洲不同地区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问题结构。北非政治深受地中海安全、欧洲移民政策和中东局势影响；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军事政变回潮、恐怖主义威胁政权安全以及区域组织合法性下降；东非及非洲之角则同时受到红海航道、出海口、水资源、国家间冲突和海湾国家介入的牵动；中非大湖地区的政治不稳定更多与跨境武装、族群关系和关键矿产利益相互交织；南部非洲的政治经济议程则日益围绕关键矿产、能源转型、基础设施走廊和区域产业链展开。不同区域不仅面对不同威胁，其对外合作对象、政策优先次序和秩序安排也不相同。由此，域外

① “Agenda 2063: The Africa We Want”, September 2015,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36204-doc-agenda2063_popular_version_en.pdf

② 王雷、王晓梅：“二十国集团呼吁关注非洲债务可持续性问题”，新华网，2025 年 11 月 19 日，http://www.news.cn/world/20251119/f7aaf8c8458f46d2b0bf479302b42797/c.html

大国对非洲的影响并不是均匀扩散，而是受到各地区既有政治关系和安全结构的影响，进而产生差异化结果。

第二，机制碎片化体现为大陆、区域和次区域制度的权威与效能出现分化。首先，非盟在大陆安全与治理事务中的统筹权威有所下降。近年来，非盟决议对成员国约束力不足、非盟在重大冲突中主导能力有限等问题凸显。学界普遍认为，非盟因内部问题自顾不暇，地区影响力和建设性作用日渐消退，地区领导真空的危机被放大。[①]其次，区域与次区域机制的嵌套增加了沟通成本。据统计，非洲 54 个国家共具有 132 个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平均一个非洲国家至少是 2.44 个区域组织的成员。[②]不同机制在安全、贸易、人员流动和基础设施等领域职能交叉，容易造成权责不清、资源重复和效率损耗。非盟长期强调理顺其与区域经济共同体及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正说明制度重叠已成为制约治理效能的重要因素。最后，部分成员国退出既有机制并另建组织，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秩序重组。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于 2024 年将萨赫勒国家联盟提升为萨赫勒国家邦联，并于 2025 年 1 月正式退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简称“西共体”，ECOWAS）；2026 年 6 月，三国又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程序。三国同时强调维护国家主权、推进内生发展和加强外交协调，显示其正通过制度退出与机制重组寻求更大的战略自主。[③]此举削弱了原有区域机制的代表性和整合能力，使非洲区域秩序由相对稳定的制度分工转向多机制并存、相互竞争和重新组合。

第三，议题碎片化表现在多类议题交叉嵌套，不同区域的议题差异更加突出。首先，非洲政治议程已由传统安全问题向安全、发展与全球治理议题并存扩展。除传统的政权稳定、武装冲突和反恐等议题外，关键矿产、债务压力、气候变化、移民治理、港口通道、数字安全和能源转型等问题日益进入政治议程。非洲政治格局因而不再围绕少数传统安全议题展开，而是受到

① Lidet Tadesse Shiferaw, Ueli Staeger, “Beyond ‘Seized of the Matter’: The New AU Leadership’s Continental and Global Challenges”, *ECDPM*, February 19, 2025, https://ecdpm.org/work/beyond-seized-matter-new-au-leaderships-continental-global-challenges

② 朱伟东、王婷：“非洲区域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重叠现象与消解路径”，《西亚非洲》，2020 年第 1 期，第 99 页。

③ Angana Guha Roy, “Burkina Faso’s Move Towards Strategic Autonomy Under Ibrahim Traoré’s Leadership”, *Modern Diplomacy*, October 14, 2025,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5/10/14/burkina-fasos-move-towards-strategic-autonomy-under-ibrahim-traores-leadership

多类话题共同塑造。其次，不同议题之间的边界趋于模糊，相互交织放大了风险。比如气候变化可能经由土地退化、水资源短缺和粮食不安全传导至社会层面，加剧了资源争夺与地方冲突。再如关键矿产和基础设施合作既关系经济发展，也涉及供应链安全、国家主权和外部竞争。议题之间的交叉嵌套，使单一领域的问题更容易向其他领域扩散。最后，现有治理框架越来越难以按照单一议题进行回应。安全、发展、气候、债务和移民问题往往分别由不同部门、机制和外部伙伴处理，但这些问题在现实中已高度联动。政策工具的分散与问题结构的复合化之间出现错位，既增加了跨部门协调成本，也削弱了治理措施的整体效能。①

（三）安全秩序重组：传统安全伙伴和区域安全机制正在被重新检验与调整

非洲安全秩序重组表现为安全治理主体、合作机制和空间范围同时发生变化：参与主体由传统西方伙伴主导转向多方并存，既有地区机制和外部安全模式均受到效能与合法性检验，安全问题则突破国界和区域边界，形成更加复杂的跨境安全联系。

首先，安全治理主体日益多元。近年来，俄罗斯、土耳其以及海湾国家等新兴安全参与者的影响明显扩大。俄罗斯通过瓦格纳集团及此后组建的“非洲军团”，在马里、中非共和国等国参与政权保护、军事训练和反恐合作。2026 年 7 月 8 日，俄罗斯同“萨赫勒国家邦联（AES）”发表联合声明，称将进一步加强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以应对地区内持续扩张的极端主义武装威胁。②土耳其则以无人机、军售、军事训练和安全协议为抓手，将安全合作转化为拓展对非政治影响的重要工具。③俄罗斯等新参与者的进入，并未形成覆盖非洲大陆的替代性安全体系；但是，在部分政权安全和反恐需求突出的国家，俄罗斯相对集中的安全资源投入明显改变了当地的安全伙伴结

① “Africa Governance Report 2025: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in Africa”, September 2025, https://aprm.au.int/sites/default/files/files/2025-09/consolidatedagr2 5-digital-22-sept-25.pdf
② “Russia and Sahel States Deepen Military Ties as Insurgent Attacks Persist”, *Reuters*, July 9, 202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frica/russia-sahel-states-deepen-military-ties-insurgent-attacks-persist-2026-07-09
③ Federico Donelli, “UAVs and Beyond: Security and Defence Sector at The Core of Turkey’s Strategy in Africa”, Megatrends Policy Brief 02, March 31, 2022, https://www.swp-berlin.org/assets/afrika/publications/policybrief/MTA_PB02_2022_Donelli_UAVs_and_beyond.pdf

构。非洲国家在不同安全供给者之间进行选择、组合与议价的空间也有一定程度的扩大。

其次，既有地区安全机制和传统外部安全合作模式均承压明显。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APSA）、西共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简称“南共体”，SADC）、政府间发展组织（简称“伊加特”，IGAD）等区域安全治理机制处理重大地区安全危机时，受到成员国分歧、资源不足和外部机制竞争的制约。苏丹冲突爆发后，非盟和伊加特虽然先后提出政治解决路线图、组织对话并协调国际伙伴，却未能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停火安排。非盟此后仍强调加强非洲治理架构和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之间的协调及财政、技术能力，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既有机制的效能不足。[①]同时，西方传统对非安全合作机制也遭遇明显困境。法国大幅缩减并重组其在西非和中非的军事存在，[②]其先后从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撤军，并于 2025 年结束在乍得和塞内加尔的永久军事存在；在科特迪瓦和加蓬，法国则通过移交基地、缩减常驻兵力和设立联合联络分遣队等方式调整部署，合作重点转向军事培训和联合演训。美国在尼日尔政变后也被迫调整安全部署。长期以外国驻军、反恐行动和军事援助为核心的合作模式，因治理成效有限、主权争议和当地社会反感而难以为继。非洲安全治理由此进入地区机制能力不足、传统伙伴收缩和新安全供给者进入并行的过渡状态。

最后，非洲安全空间正在由以国家边界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转向跨境和跨区域治理。当前，非洲多数安全挑战具有明显的跨境性质，其根源不仅在于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也在于跨境地区特殊的政治社会联系、发展-安全关联以及相邻国家之间复杂的安全互动关系。因此，跨境安全治理在非洲已成为“战略必须”，而非一般性的政策选择。[③]恐怖主义、跨境武装、难民流动、非法贸易、气候风险和海上通道安全往往跨越多个国家，并把原本分属不同

① African Union, “The Sudan War Calls for Our Relentless Collective Action: High Level Dialogue on Sudan Concludes”, February 11, 2025,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pressreleases/44430-pr-HIGH_LEVEL_DIALOGUE_ON_SUDAN_AGA-APSA.pdf

② Le Monde, “France Begins Handover of Military Bases to Senegal”, March 7, 2025, https://www.lemonde.fr/en/le-monde-africa/article/2025/03/07/france-begins-handover-of-military-bases-to-senegal_6738927_124.html

③ 张春：“化边缘为中心：非洲的跨境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12 页。

地区的安全问题连接起来。萨赫勒危机向西非沿海国家扩散，苏丹战争牵动红海和非洲之角安全，红海航运又将东非与中东、海湾和印度洋安全连为一体。安全空间的跨区域化意味着，单一的国家、区域组织或外部伙伴已难以独立应对复合风险，非洲安全秩序成为多层行为体、多种机制和跨境安全网络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资源通道政治凸显：非洲政治竞争的空间正在向矿产、港口和走廊延伸

伴随全球科技竞争与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资源政治在非洲政治格局中重要性凸显，大国竞争重心开始超出矿产资源本身，进一步延伸至矿区、铁路、港口和经济走廊组成的运输网络。关键矿产决定非洲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战略价值，基础设施通道决定资源流向和市场连接方式，二者结合推动资源开发由经济合作议题转化为影响供应链安全和地区秩序的政治问题。

第一，关键矿产需求上升使非洲由传统原料产地转变为全球能源转型和产业竞争中的战略资源空间。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指出，非洲拥有全球 40%以上的钴、锰和铂族金属储量，并已是钴、锰、铝土矿和铂族金属的重要供应地。[①]电动汽车、储能、电网和绿色氢能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显著推高了全球对铜、钴、锂、石墨和稀土等矿产的需求，使其成为各国发展新能源产业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除储量丰富外，非洲的战略价值还体现在其有助于为域外大国拓展全球矿产供应来源，降低供应过度集中的风险。[②]非盟 2025 年发布《非洲绿色矿产战略》，明确提出以关键矿产推动本地增值、区域产业链和工业化，表明非洲也试图将资源占有转化为产业和规则议价能力。[③]由此，关键矿产正在重新塑造刚果（金）、赞比亚、南非、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资源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

第二，资源竞争正在由矿权争夺扩展为对港口、铁路和经济走廊等连接

① “Africa Energy Outlook 2022”, *World Energy Outlook Special Report*, June 2022,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220b2862-33a6-47bd-81e9-00e586f4d384/AfricaEnergyOutlook2022.pdf

② 参见周玉渊：“非洲关键矿产的大国竞争：动因、特征与影响”，《西亚非洲》，2024 年第 2 期，第 24–49 页。

③ AMDC, “Africa’s Green Minerals Strategy”, *African Union*, February 2025,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44539-doc-AGMS_Final_doc.pdf

节点的布局。矿产能否进入全球市场，不仅取决于资源所有权，也取决于谁掌握运输路线、出海口和融资安排。当前具有代表性的节点包括安哥拉洛比托港及本格拉铁路、连接刚果（金）和赞比亚铜矿带的洛比托走廊、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和坦赞铁路、肯尼亚蒙巴萨港及北部走廊、莫桑比克纳卡拉港和纳卡拉走廊、几内亚西芒杜铁矿配套铁路与港口，以及埃及苏伊士运河和吉布提港等。欧盟“全球门户”计划已确定多条非洲战略走廊，[①]美国及七国集团则将洛比托走廊作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的重要项目，充分表明大国竞争已从取得资源转向控制资源与市场之间的连接条件，港口、铁路和走廊由运输设施上升为重新配置经济空间和战略关系的节点。

第三，资源通道政治的兴起推动非洲地缘政治转向，港口、铁路、经济走廊等连接性基础设施，已成为塑造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战略节点。域外大国对非洲关键铁路和港口的关注，包含着分散关键矿产来源、调整出口方向和降低供应链风险的战略考虑；[②]非洲国家则试图借助多方竞争争取基础设施投资、出海通道、本地加工和区域互联互通。因此，资源通道并非外部力量可以单向控制的空间，而是全球大国与资源国、通道国和港口国相互博弈的平台。全球大国能够通过融资、技术和规则设置塑造通道建设的外部条件，但资源国和通道国可以通过矿产政策、港口准入和路线选择影响项目落地。资源通道政治由此把全球产业竞争、非洲地区发展和国家战略选择连接起来，成为观察非洲政治格局变迁的新维度。

二、文献梳理、判断指标与分析框架

当前非洲政治图景呈现出自主性上升、碎片化加深、安全秩序重组和资源政治凸显等四项显著特征，这是域外大国、非洲区域大国和关键国家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要回答“谁主导非洲政治格局变迁”这一根本性议题，需判断上述三种力量主体是如何主导政治格局发展的。现有研究分别从大国竞争、地区秩序、非洲自主性以及网络权力等视角，对不同层级行为体的作用进行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EU-Africa Strategic Corridors”, 2022, https://international-partnerships.ec.europa.eu/policies/global-gateway/transport/eu-africa-strategic-corridors_en

② See M. A. Carrai,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Emerging US-China Rivalries in Africa: The Case of the Lobito Corridor”, *Global Policy*, 2025, Vol.16, No.4, pp.739-750.

了较丰富的讨论，为理解非洲政治格局演变提供了重要启发。然而既有研究更多关注某一类行为体或某一维度力量，缺乏统一的分析标准来比较不同主体在非洲政治格局塑造中的作用差异，也难以解释为何不同政治图景呈现出不同的主导力量。基于此，本部分首先梳理相关研究，提炼影响政治格局变迁的关键能力要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主导权判断指标，并进一步比较三类行为体的能力优势及其现实发挥，最终形成分析非洲政治格局变迁的基本框架。

（一）既有研究与主导权判断指标的提出

围绕“谁主导非洲政治格局变迁”这一问题，既有研究大体提供了四条解释路径。第一，大国竞争研究关注全球大国和域外力量对非洲政治格局的结构性塑造。既有研究普遍认为，非洲政治议程长期受到外部力量影响，但关注重点有所不同。有学者从发展援助和治理改革出发，指出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通过民主、善治、结构调整等话语和制度安排，参与塑造非洲国家的政策议程和治理方向。[①]“9 • 11”事件后，研究进一步发现，反恐、安全和国家脆弱性逐渐成为对非政策的重要议题，安全化重塑了非洲政治发展的外部环境。[②]近年来，随着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力量扩大对非参与，域外力量对非施加影响的议题和工具进一步多元化。[③]相关研究指出，俄罗斯近年来重新强化对非战略布局，其政策资源更多集中于军事安全、能源、外交协调以及反西方和多极化叙事等领域，在总体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形成了具有较强地区差异性的影响。[④]可见，域外力量对非洲政治格局的影响主要

① Rita Abrahamsen, *Disciplining Democracy: Development Discourse and Good Governance in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2000; Graham Harrison, *The World Bank and Africa: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States*, London: Routledge, 2004; R. A. Blair, R. Marty, P. Roessler, “Foreign Aid and Soft Powe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Africa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2, Vol.52, No.3, pp.1355-1376.

② J. Fisher, D. M. Anderson,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Securitization of Development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5, Vol.91, No.1, pp.131-151.

③ C. Alden, D. Large, “On Becoming a Norms Make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Norms Evolu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Security in Africa”, *The China Quarterly*, 2015, No.221, pp.123-142; S. Bamidele, “Russia’s Strategic Engagement in Africa: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Sovereignty, and the Politics of Multipolarity”, *Jadavpu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5, Vol.29, No.2, pp.195-213.

④ 参见郭锐、赵俊杰：“‘全球南方’视野下的俄非‘特殊关系模式’分析”，《俄罗斯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118–146 页；张建、李昕龙：“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与非洲关系发展新动向”，《和平与发展》，2024 年第 3 期，第 55–79 页。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界定问题性质和政策优先顺序塑造政治议程，二是通过开发金融、安全合作、市场准入和制度平台配置资源推动议题落实。不过，大国竞争研究更多关注外部力量如何塑造非洲，[①]而较少解释外部议题为何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政治结果。

第二，地区秩序研究揭示了地区大国和区域组织对外部影响的传导与内化作用。既有研究表明，安全互动具有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全球力量只有进入既有地区安全关系，才能转化为具体的秩序后果。[②]在非洲区域主义研究中，非洲区域秩序并非由正式制度单独塑造，而是同时受到国家间关系、跨国网络和非正式政治的影响。[③]有学者对尼日利亚与西共体、南非与南共体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地区大国能否推动区域制度建设，取决于国内利益、功能需求、国际合法性及非正式政治网络等多重因素。[④]近期研究则更加关注区域干预的本地接受度。非盟和西共体的干预虽具有区域合法性基础，但其实际效果仍取决于当地社会对干预目标、程序与结果的认同。[⑤]因此，全球大国的议题和资源进入非洲后，需要经过地区大国、区域组织及既有安全结构的传导和内化，才能形成具体的政治结果。不过，现有研究有时高估了地区大国和区域组织的协调能力，对区域机制失灵、成员退出和关键国家触发秩序裂变的解释仍显不足。

第三，非洲自主性研究纠正了长期以来将非洲视为大国竞争被动对象的解释偏差。近年来，国际关系和非洲研究越来越强调，非洲国家、非盟及区

① 参见张宏明等：《大国经略非洲研究（上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② B. Buzan, O.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40-82.

③ D. C. Bach, *Regionalism in Africa: Genealogies, Institutions and Trans-State Network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1-18; 李因才：“锁定脆弱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安全供给与能力建设困境”，《国际展望》，2024 年第 1 期，第 115–135 页。

④ Merran Hulse, “Regional Powers and Leadership in Regional Institutions: Nigeria in ECOWAS and South Africa in SADC”, *KFG Working Paper Series*, November 2016, https://www.ssoar.info/ssoar/bitstream/handle/document/48897/ssoar-2016-hulse-Regional_powers_and_leadership_in.pdf

⑤ A. Witt, O. M. Bah, S. Birchinger, S. M. Jaw, S. Schnabel, “How African Regional Interventions are Perceived on the Ground: Contestation and Multiplexity”,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2024, Vol.31, No.1, pp.58-86; 孟瑾：“试析西非地区军事政变回潮原因及影响”，《非洲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23–40 页。

域组织不仅是外部力量竞争的接受者，也是国际规则和地区秩序的重要塑造者，应突破“非洲缺位”的研究范式，将非洲国家视为国际政治中的主动行为体，而非国际体系的边缘对象。[①]非洲国家能够通过外交协调、制度参与和集体行动影响国际规范和全球治理议程。[②]近年来，非洲自主性更多体现为战略选择能力，即通过伙伴关系多元化、议题重构和制度参与，在大国竞争中扩大政策空间和国际影响力。[③]由此可见，非洲政治格局并非完全由外部力量塑造，非洲行为体能够利用外部竞争改善自身制度地位，提升国际议价能力，并通过非盟、区域组织及集体外交影响全球治理议程。据此，判断政治格局主导权不能仅考察行为体拥有多少物质资源，还应关注其能否将外部机会转化为制度优势和政治影响，即自主塑造外部关系的能力。不过，现有自主性研究更多将“非洲”作为整体进行分析，对不同层级行为体之间的能力差异关注不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将非洲自主性分解到不同层级和不同能力之中，以更准确地解释非洲政治格局变迁中的主导力量。

第四，网络权力与节点政治研究揭示了关键国家对非洲政治格局产生的强劲影响机制。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不仅来自物质实力，也来自行为体在网络中的接入、桥接和退出位置；处于关键连接点的行为体，能够通过控制关系流动，获得额外影响力。[④]“节点治理”研究进一步强调，治理并非完全由国家层级自上而下地展开，而是由掌握知识、资源、组织能力和制度接口的多个节点共同构成。[⑤]新研究将该思路用于解释中等国家和次级国家如何利用“桥梁”或“枢纽”位置扩大外交杠杆，即综合实力有限的国家可以通过连接原本分离的网络，充当中介或者枢纽，以获得超过其物质能力的议价空

① W. Brown, “A Question of Agency: Afric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2, Vol.33, No.10, pp.1889-1908.
② W. Brown, Sophie Harman, eds., *African Agenc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3; 赵雅婷：“外交自主之路，从‘被动参与’到‘非洲方案’”，《世界知识》，2024 年第 3 期，第 21–24 页。
③ F. Mabera,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Africa Is Embracing Its Agency”, October 21, 2025, https://theglobalobservatory.org/2025/10/in-a-changing-global-order-africa-is-embracing-its-agency
④ E. M. Hafner-Burton, M. Kahler, A. H. Montgomery, “Network Analysi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9, Vol.63, No.3, pp.559-592.
⑤ S. Burris, P. Drahos, C. Shearing, “Nodal Governa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Legal Philosophy*, 2005, Vol.30, pp.30-58.

间。[①]非洲基础设施与流通政治研究为上述理论提供了更具地域性的经验支持。港口和运输通道不仅承担商品流通功能，也参与政治秩序、财政权力和国家建构的形成；不同主体围绕物流流动和收益攫取展开竞争，由此产生“流通政治”。[②]由此可见，控制港口、铁路、矿区或制度接口的节点国家，可以通过中介、阻断、退出或重新连接，改变既有资源流向和行为体关系。不过，节点性影响通常具有较强的议题性和阶段性，其实际能力仍需置于全球大国的结构性塑造和地区力量的区域性传导中加以考察。

上述四类研究分别揭示了非洲政治格局变迁中的不同动力，但也各有解释边界。因此，在综合上述文献关于议题塑造、权力资源、地区秩序和网络权力等问题的理论讨论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政治格局主导权拆解为以下四项能力指标。

一是议题设定能力。该指标回答“谁能够定义非洲政治格局变化中的核心问题”。谁能够将某一问题上升为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航道安全、全球治理改革、反恐安全或发展融资等议题，谁就能够影响后续政策的优先级和资源流向。

二是资源动员能力。该指标回答“谁能够为政治格局变化提供现实资源”。这里的资源不仅包括资金、援助、投资和市场准入，也包括军事支持、安全培训、技术标准、外交平台、制度资源和舆论叙事等。资源动员能力决定了某一行为体能否将议题转化为具体行动。

三是区域传导能力。该指标回答“谁能够把外部压力和全球议题转化为地区政治结果”。外部力量在进入非洲之后，并不会自动产生统一结果，而是要经过地区大国、区域组织和本地政治结构的内化、吸收、抵制和重组。因此，区域传导能力体现为地区行为体对外部议题的再解释、再组织以及本土化。

四是格局触发能力。该指标回答“谁能够直接改变既有关系结构”。某

① A. F. Cooper, Carsten-Andreas Schulz, “How Secondary States Can Take Advantage of Networks in World Politics: The Case of Bridges and Hubs”, *Globalizations*, 2023, Vol.20, No.7, pp.1083-1101.

② F. Stepputat, T. Hagmann, “Politics of Circulation: The Makings of the Berbera Corridor in Somali East Afric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19, Vol.37, No.5, pp.794-813.

些处于关键节点位置的国家，可以通过制度退出、联盟转换、港口控制、资源政策调整、安全危机、主权争端或外交调停等，直接触发区域秩序变化。

（二）三类力量主体的能力差异及现实发挥

从上述四项指标看，全球大国、地区大国与区域组织、关键国家与节点国家在非洲政治格局中的能力结构并不相同，其优势能力在不同议题和情境中的实际发挥也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既源于各类行为体拥有的资源禀赋不同，也与其所处的政治层级和作用机制密切相关。表 1 展示了三类力量主体具体能力的差异及其现实发挥情况。

表 1　三类力量主体的能力优势及其现实发挥

主体类型	主要优势能力	现实发挥	主要局限	作用判断
全球大国/域外力量	议题设定能力、资源动员能力	通过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航道安全、反恐、发展合作、全球治理改革等议题塑造外部环境，并提供资金、安全、技术、市场和外交资源	不同外部力量的能力结构差异明显，其影响均需经过非洲本地结构转化，并受到当地需求、接受程度和地区环境制约	结构性塑造能力较强，但不是直接决定者
地区大国/区域组织	区域传导能力	非盟在全球代表性议题上作用上升，区域经济共同体在安全和治理议题中发挥作用，地区大国维持区域稳定	成员国分化、执行能力不足、资源有限、外部力量绕开机制、地区大国领导力受限	具备区域传导功能，但稳定主导能力不足
关键国家/节点国家	格局触发能力	通过制度退出、安全伙伴重组、港口基地、资源通道、主权争端和危机节点影响具体区域格局	作用具有议题性、节点性和阶段性，难以形成全面秩序领导	节点性触发能力上升，成为具体格局变化的重要推动者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由表 1 可知，首先，全球大国和域外力量总体上具有较强的议题设定和资源动员能力，但不同力量的能力结构和政策工具存在明显差异。美国、欧

盟和中国主要依托开发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制度平台，影响非洲政治经济议程；俄罗斯的优势则更多集中于军事技术合作、安全供给、外交支持以及主权和多极化叙事。相关研究表明，俄罗斯能够根据不同国家的政治需求调整政策工具，在尼日利亚侧重经贸与军售，在南非强化金砖框架下的政治协调，在中非共和国则突出安全合作，以相对有限的资源获得了显著的政治收益。[①]这说明，全球力量对非洲政治格局的塑造并不取决于单一的综合实力，而与其优势能力同当地政治需求的匹配程度密切相关，其战略意图仍需经过非洲国家、区域组织和地方政治结构的吸收、调适与再配置，才能形成具体的政治结果。

其次，地区大国和区域组织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区域传导能力，即将全球层面的竞争议题转化为符合地区实际的治理议程。非盟在规范建构、集体立场协调和全球治理代表性方面发挥着大陆层面的平台作用，西共体、南共体与伊加特组织等次区域机制，则承担着冲突调停、安全协调和区域合作的重要职能。同时，南非、尼日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地区大国也在不同区域承担着重要的议程协调和公共产品供给功能。但这种能力具有较强的情境依赖性，其发挥往往受到成员国利益分化、财政资源约束、机制执行能力以及地区领导力变化等因素影响，因此并不必然转化为稳定的区域主导地位。

再次，关键国家和节点国家的突出优势体现在格局触发能力。与全球大国和地区大国相比，这类国家通常不具备广泛的资源动员能力，也缺乏制度领导地位，但由于掌握资源节点、交通节点、安全节点或制度节点，其局部决策往往能够产生超出自身实力的区域影响。例如，资源国能够影响关键矿产供应链布局，通道国能够决定港口和经济走廊的连接方向，安全节点国家则可能通过联盟调整、制度退出或冲突升级改变区域安全格局。因此，关键国家的影响更多体现为节点控制基础上的格局触发，其作用具有较强的议题针对性和区域外溢性。

（三）四重政治图景中的差异化主导逻辑

在对三重主导力量能力差异与现实发挥进行分析后，将其置于当前非洲

① A. P. Tsygankov, A. Muhwezi, “Engaging the Global South with Ideology and Pragmatism: Russia’s Re-Emerge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Global Studies Quarterly*, 2025, Vol.5, No.2, pp.7-8.

政治图景中进行实际考察，会发现四重政治图景的产生与变化有明显不同的主导力量与互动逻辑（见表 2）。不同政治图景对应着不同的主导力量组合，三类行为体在四项能力上的优势并不会同时发挥作用，而是随着议题性质和区域环境的变化呈现差异化配置。

表 2　不同力量主体在四重政治图景中的作用机制

四重图景	主导力量判断	最突出的能力指标	作用机制
自主性上升	非洲大国与区域组织主导，全球大国竞争助推	议题设定能力、区域传导能力	非盟和非洲国家将多极竞争转化为制度代表性、伙伴多元化和议价能力提升
碎片化加深	地区结构与区域机制分化主导，关键国家制度退出触发，外部力量进入调整期	资源动员能力、区域传导能力、格局触发能力	外部安全资源和政治叙事进入后，既有区域机制承压，关键国家制度退出推动机制裂变
安全秩序重组	全球大国、域外地区力量、非洲地区大国和关键节点国家共同塑造	议题设定能力、区域传导能力、格局触发能力	域外力量设定议题，地区大国传导，节点国家放大，推动安全秩序转向
资源通道政治凸显	全球大国与关键资源/通道国家共同主导	议题设定能力、资源动员能力、格局触发能力	全球大国设定议题、提供资源，关键节点国家定向落地，共同重塑资源流向、通道格局和区域政治经济联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首先，自主性上升主要体现为非洲行为体的主动塑造。近年来，非盟及非洲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多元伙伴外交和发展议程设置等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制度代表性和国际议价能力明显提升。全球大国竞争为非洲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合作选择和外部战略空间，但能否将这种机会转化为集体代表性提升和自主发展能力，主要取决于非盟及非洲国家自身的战略选择和制度行动。因此，在这一图景中，非洲行为体是自主性提升的主要推动者，全球大国更多发挥机会结构和外部条件塑造作用。

其次，碎片化加深主要是地区结构分化与区域机制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地区面临的安全环境、政治结构和外部联系存在显著差异，使外部压力在进入非洲后呈现出不同的传导路径。与此同时，区域组织在治理能力、成员凝聚力和制度权威方面的差异不断扩大，进一步强化了区域政治发展的不均衡性。法国等传统安全伙伴收缩与俄罗斯等新安全供给者进入，则进一步扩大了部分国家调整外部伙伴关系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关键国家通过制度退出、联盟调整和安全伙伴重组，对区域秩序演变产生了明显的触发效应，加速了区域机制重构和政治空间分化。

再次，安全秩序重组表现出多层行为体共同塑造的特征。全球大国和域外地区力量持续围绕航道安全、军事存在、海上通道和地区热点投入资源，构成非洲安全秩序调整的重要外部动力；非洲地区大国则围绕流域治理、边界安全、区域合作和领导权竞争推动相关议题区域化；港口国、沿岸国和冲突国家等关键节点国家，则通过港口、基地、通道、主权争议和国内冲突等具体节点影响安全格局的发展方向。不同层级力量分别作用于安全秩序形成的不同环节，共同推动非洲安全空间由区域内部治理向跨区域、多主体互动演变。

最后，资源通道政治凸显体现出全球力量与节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全球大国及其主导的国际开发金融机构凭借议题设定、资本投入和规则塑造能力，将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纳入全球战略布局；资源国、港口国和通道国则依托矿产储量、交通节点和区位优势，对资源流向、运输路径和区域经济联系产生重要影响。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供应链重组由此形成相互嵌合的政治经济网络，使资源通道逐渐成为全球地缘经济竞争与非洲国家战略选择交汇的重要空间。

综上所述，四重政治图景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能力组合和主导方式：自主性上升主要体现为非洲行为体对外部机会的主动利用，碎片化加深反映地区结构分化、区域机制承压与关键国家触发相互叠加，安全秩序重组呈现多层行为体共同塑造的特征，资源通道政治则突出全球议题设定、资源动员与非洲节点控制之间的结合。由此，非洲政治格局变迁很难归结为某一类力量的持续支配，而应根据不同主体在不同环节中的实际作用加以判断。

三、四重图景中的案例研究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四重图景中各类力量的作用机制，本文分别选择非盟加入 G20、萨赫勒危机、红海-东非安全复合体和洛比托走廊四个案例，考察全球大国和域外力量、地区大国和区域组织、关键国家和节点国家如何在其中发挥差异化作用，并进一步检验结构性塑造、区域性传导与节点性触发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自主性上升案例：非盟加入 G20

2023 年 9 月，在印度举行的 G20 峰会上，非盟正式加入 G20，成为近年来非洲集体代表性提升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此举为非洲作为整体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全球经济治理参与渠道，也为其将大陆诉求转化为国际议程提供了新的制度平台。

在这一过程中，三重主体力量发挥了不同的作用。首先，全球大国主要凭借议题设定和制度资源，为非盟加入 G20 提供了外部机会。近年来，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成为主要大国争取制度合法性和国际支持的重要议题。印度将“全球南方之声”作为其 G20 主席国任期内的重要政治主张。莫迪在 G20 峰会开幕时明确表示，接纳非盟有助于增强 G20 及全球南方的声音。[①] 中国也在 2023 年新德里峰会前第一个明确公开表态支持非盟加入 G20。[②]不同大国对非盟 G20 成员资格的支持，既包含了提高全球治理代表性的考虑，也反映了其争取非洲国家和全球南方支持的战略诉求。全球大国由此主要发挥了制度开放和机会供给作用，为非洲代表性提升提供了外部推动力。

其次，非盟等区域组织及南非等地区大国通过立场协调和制度衔接，将外部机会转化为稳定且具引领性的代表机制。2024 年，非盟通过参与 G20 的具体办法，明确由非盟轮值主席在非盟委员会主席协助下代表非盟参加峰会，并对部长会议、议题协调和代表遴选等作出安排；非盟还任命了 G20 协

① Narendra Modi, “PM’s opening statement at the G20 Summit”, September 9, 2023, http://www.pmindia.gov.in/en/news_updates/pms-opening-statement-at-the-g20-summit

② “毛宁：中方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3 年 9 月 7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sp_683685/wjbfyrlxjzh_683691/202309/t20230907_11139726.shtml

调人和副协调人，建立代表名录并筹措参与资金。[①]这些制度建设旨在减少成员国立场分散，将大陆发展议程转化为可以进入 G20 谈判的共同立场。此外，非盟在此后的 G20 峰会中逐步加强了代表权的合理运用。例如，非盟大会确定了未来数年参与 G20 的重点方向，并围绕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粮食安全、金融体系改革、气候与能源转型等议题进行组织协调。[②]南非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地区大国和制度桥梁的双重作用，将非洲大陆诉求同 G20 议程和工作机制连接起来，推动非洲代表性从“获得席位”向“参与规则和议程制定”转变。据此，非盟相关决定明确提出，由南非向非盟分享参与 G20 的经验。[③]2025 年南非担任 G20 主席国时，与非盟围绕全球金融架构改革、气候适应、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加强协调。[④]

最后，塞内加尔等关键国家利用非盟轮值主席国等制度节点，在倡议发起和政治动员阶段推动进程。2022 年，时任非盟轮值主席、塞内加尔总统马基·萨勒为推动非盟获得 G20 正式席位作出持续贡献。2023 年 2 月，非盟首脑会议专门通过相关决定，肯定萨勒提出并推动非盟加入 G20 的倡议，将一国领导人的外交推动转化为非盟成员国的共同立场。[⑤]这一过程表明，非洲关键国家凭借非盟轮值主席国身份和外交倡议能力，在制度变革的关键阶段发挥了议题发起和政治动员作用，其影响来自对制度接口和政治时机的有效利用。

该案例所反映的自主性上升，具有鲜明的“非洲主体推动、外部竞争助

① African Union, “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AU in the G20”, *Executive Council Forty-Fifth Ordinary Session*, 2024, https://archives.au.int/bitstream/handle/123456789/10610/EXCL201530XLV_E.pdf?sequence=1&isAllowed=y

② African Union, “African Union Joins Third G20 Sherpa Meeting to Advance Africa’s Priorities Ahead of the G20 2025 Leaders’ Summit”, July 24, 2025, https://au.int/pt/node/45203

③ African Union, “Draft Executive Council Decisions on Modalities for Participation of the African Union in the G20 and Preliminary Priorities to be Pursued”, 2024, https://archives.au.int/bitstream/handle/123456789/10506/EX%20CL%201468%20%28XLIV%29%20DEC%20_E.pdf?sequence=1&isAllowed=y

④ African Union, “Fridays of the Commission: African Union and South Africa in the G20-Advancing Africa’s Priorities”, March 28, 2025, https://au.int/en/newsevents/20250328/fridays-commission-african-union-and-south-africa-g20-advancing-africas

⑤ African Union, “Decision on the Report on Granting a Seat to African Union Within G20 by H. E. Macky Sall,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Senegal”, February 2023, https://africanlii.org/fr/akn/aa-au/doc/decision/2023-02-19/decision-on-the-report-on-granting-a-seat-to-african-union-within-g20-by-he-macky-sall-president-of-the-republic-of-senegal/eng@2023-02-19

推”特征。全球大国竞争扩大了制度改革的机会窗口，非盟和非洲国家则通过倡议发起、集体协调和制度建设，把这一机会转化为正式成员资格和议程参与能力。非洲自主性由此体现为一种关系性能力，即非洲行为体未必能够独立改变全球制度，却能够利用多极竞争和自身战略价值上升，争取制度代表性、重构外部关系并扩大政策空间。①

（二）碎片化加深案例：萨赫勒危机

进入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以来，非洲军人涉政事件特别是军事政变频发，被称为新一轮政变潮。这一现象在非洲多地出现，其中西非特别是萨赫勒地区最为集中。马里、几内亚、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先后发生军事政变，苏丹、乍得和加蓬等其他地区国家也出现军事接管或非宪制权力更迭。当前，西非政治格局呈现出区域机制权威弱化、成员国政治取向分化、安全伙伴体系重组与次区域集团化并行推进的碎片化特征。

与以往不同的是，部分非洲国家民众对军方接管政权的条件性容忍度有所上升。非洲晴雨表 2024 年报告显示，受访者总体上仍倾向民主制度，但反对军人统治的比例在过去十年明显下降。在 39 个国家中，53%的受访者表示，当民选领导人滥用权力时，可以接受军方接管政权。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反对军人统治的比例分别下降约 40 个和 36 个百分点。②这一变化反映出民众对选举腐败、政府失能和安全恶化的不满正在改变其对民主合法性的判断。当民主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治理绩效而非选举程序本身时，西共体关于维护宪政秩序的规范也面临着更强的社会质疑。

域外力量在碎片化加深过程中发挥了资源供给和伙伴替代作用。美国和西方国家长期主导萨赫勒反恐合作，但持续军事介入未能阻止极端组织扩散，反而日益受到主权和反殖民话语质疑。法国先后从多个西非国家撤军，美国也于 2024 年完成从尼日尔撤军，传统西方安全网络由此明显收缩。③俄罗斯

① See Faith Mabera, “Africa and the G20: A Relational View of African Agency in Global Governanc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Vol.26, No.4, pp.583-599.
② Afrobarometer, “African insights 2024: Democracy at risk – the People’s Perspective”, July 2024,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wp-content/uploads/2024/05/Afrobarometer_FlagshipReport2024_English.pdf
③ Nina Wilén, “Stepping up Engagement in the Sahel: Russia, China, Turkey and the Gulf States”, *Egmont Policy Brief*, No.375, April 2025, p.2.

则利用这一空当扩大安全存在，成为外部资源供给和伙伴替代的重要力量。马里引入瓦格纳人员后，俄罗斯通过军事训练、装备供给和政权保护强化与军政府的关系；瓦格纳体系调整后，俄罗斯国防部主导的“非洲军团”继续在马里活动，并向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扩展。俄罗斯提供的快速安全支持与“不附加民主条件”的主权叙事，更能契合军政府巩固政权和摆脱法国影响的需求。[①]不过，俄罗斯主要改变了安全伙伴结构，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地区暴力上升趋势。其作用更多是放大西方退出后的安全分化，并为萨赫勒三国脱离既有区域秩序提供外部支撑。

地区组织和区域大国则试图以民主规范和制度制裁维护西非既有秩序。西共体长期将反对非宪制更迭作为区域治理的重要原则。尼日尔政变后，西共体实施经济和金融制裁，并一度保留军事干预选项；尼日利亚作为西共体主席国和西非地区大国，在相关行动中发挥了主要推动作用。但制裁并未迫使军政府恢复原有政权，反而加深了萨赫勒三国对西共体的抵触。地区民众对民主绩效的不满，也削弱了西共体制裁措施的社会正当性。非盟《2023 年非洲治理报告》已经承认，治理赤字、选举操纵和宪法权威下降，是非宪制更迭反复出现的重要根源。[②]这说明，区域组织以程序合法性约束成员国的能力，正受到安全绩效、国内政治和主权诉求的共同挑战。

关键国家在碎片化进程中发挥了直接的格局触发作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于 2023 年建立萨赫勒国家联盟，随后将其提升为邦联，并于 2025 年 1 月 29 日正式退出西共体。三国并非西非传统地区大国，却通过共同的政权属性、安全诉求和外部伙伴选择，形成了新的次区域政治安全板块。制度退出使西共体的成员结构、自由流动体系和安全治理框架受到冲击，也把原本的国内政变问题转化为区域政治格局变迁问题。

可见，萨赫勒危机是区域机制权威下降、成员国政治取向分化与关键国家制度退出相互叠加的结果。法国和美国的收缩、俄罗斯的进入，主要改变了安全资源供给和政治叙事结构；西共体与尼日利亚则试图借助制裁、外交

① Christopher M. Faulkner, Raphael Parens, “Russia in Africa: Private Military Proxies in the Sahel”,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rch 24, 2025, https://gjia.georgetown.edu/global-governance/russia-in-africa-private-military-proxies-in-the-sahel

② “Africa Governance Report 2023: Unconstitutional Change of Government in Africa”, July 2023, https://aprm.au.int/sites/default/files/files/2023-07/eng-agr-23-1.pdf

压力和宪政规范维持既有秩序，但其协调和约束能力受到明显限制。真正推动区域格局发生断裂的，是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通过安全伙伴重组、另建萨赫勒国家联盟并退出西共体所形成的节点性行动。由此，萨赫勒案例体现出鲜明的“关键国家触发、外部力量放大、地区机制承压”特征，也说明当前西非碎片化已由一般性的政策分歧演变为制度归属、安全伙伴和区域认同的同步重组。

（三）地区安全秩序重组案例：红海–东非安全复合体

近年来，红海–东非地区逐渐成为非洲安全秩序重组最具代表性的区域。随着全球供应链重组、红海航运战略价值上升以及海湾国家持续介入，红海安全、海上通道、港口控制、水资源竞争和地区冲突相互交织，东北非与中东之间的安全联系不断强化，地区安全互动已突破传统非洲区域政治边界。红海–东非正体现出由区域内部安全向跨区域、多主体共同参与安全治理演变的趋势。

域外大国和域外地区力量主要通过安全议题塑造、军事存在和战略资源投入重构红海–东非地区的安全环境。自 2023 年以来，受巴以冲突外溢和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商船影响，红海航运安全迅速成为全球战略议题。美国联合多国启动“繁荣卫士行动”，欧盟于 2024 年设立“阿斯皮德斯行动”，在既有“阿塔兰塔军事行动”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红海护航；中国继续依托吉布提保障基地开展护航和海外利益保护行动。[①]与此同时，阿联酋、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等中东国家积极在非洲之角扩展势力范围。[②]俄罗斯也长期谋求扩大在红海沿岸的战略存在，通过同苏丹等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寻求获得更稳定的海上支点。[③]近年来，美国围绕“索马里兰”、柏培拉港和红海通道战略价值等议题的政策讨论明显升温，红海安全已由传统海上安全议题演变为航运安全、供应链稳定、港口控制和地区政治相互交织的综合性

① R. Marangio,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in the Horn of Africa and the Red Sea”, July 2024, https://www.is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ISSFiles/Brief_2024-12_Horn-of-Africa.pdf
②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Senior Study Group on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Red Sea Arena: Final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Washington, D.C.: USIP, 2020, p.6.
③ “Russian Red Sea Base Deal Still on the Table, Sudanese FM says”, *Reuters*, February 13,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russia-sudan-agree-red-sea-naval-base-sudanese-foreign-minister-says-2025-02-12

战略空间。

地区大国和区域机制将外部竞争转化为地区政治议题并开展区域协调。埃及始终将苏伊士运河安全和尼罗河流域利益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围绕复兴大坝、红海航道和阿拉伯-非洲联系积极塑造地区议程；埃塞俄比亚则将出海口问题提升为国家战略议题，希望通过改善港口通道突破内陆国家的发展约束；肯尼亚继续依托东非共同体和地区反恐合作参与地区协调。与此同时，伊加特和非盟持续介入苏丹和平进程、索马里稳定和地区对话，但受成员国利益差异、苏丹内战持续以及资源能力有限等因素影响，其区域协调能力受到一定制约。地区大国和区域机制虽然难以决定地区安全秩序的发展方向，却能够将外部竞争重新转化为出海口、水资源、边界治理和地区领导权等区域性议题，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地区秩序的演变。

关键节点国家则通过控制港口、海峡和战略通道，对地区安全格局产生直接影响。吉布提凭借曼德海峡入口区位优势和多国军事基地集聚，成为连接红海与印度洋的重要战略节点；苏丹内战不仅改变了红海西岸的安全环境，也直接影响港口运营和区域物流体系；索马里长期控制非洲东部重要海岸线，其国内安全局势持续影响国际航运安全。尤其是 2024 年年初，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兰”签署了关于港口和海上通道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引发了索马里政府的强烈反对，这一度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①]此后，在土耳其斡旋下，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于 2024 年 12 月达成《安卡拉宣言》，同意搁置分歧，并通过对话和和平方式解决有关争议。[②]由此可见，关键节点国家虽然未必拥有地区大国的综合实力，但却能够依托港口、海岸线、海峡和出海口等关键节点，直接影响地区安全互动方式，并成为地区秩序调整的重要触发因素。

总体来看，红海-东非安全复合体的发展是全球大国、域外地区力量、非洲地区大国和关键节点国家共同作用的产物。该地区的安全秩序正逐步由

① “The Stakes in the Ethiopia-Somaliland Deal”, March 2024, https://www.crisisgroup.org/qna/africa/ethiopia/stakes-ethiopia-somaliland-deal

② “Ankara Declaration by 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and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Somalia Facilitated by the Republic of Türkiye”, *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11, 2024, https://www.mfa.gov.tr/etiyopya-federal-demokratik-cumhuriyeti-ve-somali-federal-cumhuriyeti-nin-ankara-bildirisi.en.mfa

传统陆地冲突和区域反恐治理转向海陆联动、跨区域牵引和多层行为体共同塑造的复合安全格局。

（四）资源通道政治凸显案例：洛比托走廊建设

洛比托走廊以安哥拉洛比托港和本格拉铁路为基础，经刚果（金）铜矿带向赞比亚延伸，将中南部非洲内陆资源区同大西洋市场连接起来。2023 年 10 月，美国、欧盟、安哥拉、刚果（金）、赞比亚、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金融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决定共同推进洛比托走廊及赞比亚-洛比托新铁路建设。[①]这一安排使洛比托走廊不再只是区域运输和互联互通项目，而被纳入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能源转型和对非基础设施竞争框架。由于直接连接刚果（金）和赞比亚铜钴资源区，并提供一条面向大西洋的出口线路，洛比托走廊的战略意义已经超出运输效率本身，成为关键矿产、基础设施投资和全球供应链重组相互交汇的重要空间，也带有较为明显的对华竞争意涵。

全球大国首先通过议题设定，将洛比托走廊由区域互联互通项目提升为关键矿产供应链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美国将洛比托走廊纳入七国集团“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强调其在扩大关键矿产供应渠道、推动清洁能源转型和降低供应链集中风险方面的作用；欧盟则将其列为“全球门户”非洲战略走廊，并于 2023 年同刚果（金）、赞比亚分别建立关键原材料价值链战略伙伴关系。[②]面对洛比托走廊项目的快速推进，近年来中国推动坦赞铁路升级，一方面旨在改善既有铁路运输能力，提升中南部非洲互联互通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巩固连接赞比亚等资源腹地与印度洋港口的传统运输网络，维护长期形成的中非基础设施合作优势。由此可见，美国、欧盟和中国虽然具体路径有所不同，但都将港口、铁路和经济走廊视为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和提升区域连接能力的重要抓手，资源通道竞争也由传统矿权竞争进一步延伸至运输网络和连接条件的竞争。

① “Signing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bito Corridor and the Zambia – Lobito Rail Lin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6, 2023, https://2021-2025.state.gov/signing-of-the-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on-the-development-of-the-lobito-corridor-and-the-zambia-lobito-rail-line/?safe=1

② “EU Signs Strategic Partnerships on Critical Raw Materials Value Chains with DRC and Zambia and Advances Cooperation with US and Other Key Partners to Develop the ‘Lobito Corridor’” *European Commission*, October 26,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 r/detail/en/ip_23_5303

与议题设定相配套的，是外部力量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2024 年批准并承诺向洛比托大西洋铁路提供最高 5.53 亿美元贷款，用于修复和运营安哥拉境内约 1300 公里铁路及洛比托矿产码头；[①]非洲开发银行则宣布参与动员总额约 16 亿美元的多国运输走廊融资，并计划为走廊建设提供 5 亿美元支持。[②]欧盟及成员国也通过“全球门户”投入交通、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和技能培训等配套资源。多边融资使走廊得以从铁路修复扩展为涵盖物流、能源、农业和产业发展的综合经济空间，同时也使其更加深入地嵌入美国和欧盟的关键矿产与供应链战略。

不过，项目的实际走向仍取决于安哥拉、刚果（金）和赞比亚掌握的关键节点。安哥拉控制洛比托港和通往刚果（金）边境的铁路，是整个走廊的出海口和物流枢纽；刚果（金）拥有世界重要的铜钴资源区，赞比亚则掌握铜带和走廊向东、向南延伸的路线选择。洛比托走廊旨在把刚果（金）南部和赞比亚西北部资源区同安哥拉大西洋港口连接起来。三国通过港口特许经营、铁路准入、矿产政策和跨境协议，决定货物流向、项目建设节奏以及走廊能否从矿产运输通道转化为区域产业走廊。资源国和通道国因而成为项目落地和空间定向的关键决定者。

洛比托走廊案例显示，资源通道政治具有“全球设题与供资、节点国家定向落地”的复合主导特征。美国、欧盟及开发金融机构凭借议题设定和资源动员能力，将走廊塑造为关键矿产供应链和基础设施竞争项目；中国重启坦赞铁路，进一步推动中南部非洲形成东西并行的通道格局，也表明外部竞争的重点正由资源占有转向对运输网络和连接条件的布局。安哥拉、刚果（金）和赞比亚则依靠港口、铁路和矿产节点影响项目实施及其区域后果。全球力量能够塑造通道建设的外部条件，却难以绕过节点国家直接控制资源流向。资源通道政治由此展现出结构性塑造与节点性触发相互结合的特征。

① “DFC Announces Investments Supporting Development along the Lobito Corridor”, *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December 4, 2024, https://www.dfc.gov/media/press-releases/dfc-announces-investments-supporting-development-along-lobito-corridor

②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Joins Global Partners to Raise Financing for $1.6 Billion Multinational Lobito Transportation Corridor Programme”, October 27, 2023,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https://www.afdb.org/en/news-and-events/press-releases/african-development-bank-joins-global-partners-raise-financing-16-bn-multinational-lobito-transportation-corridor-programme-65357

四、结　语

本文围绕“谁主导非洲政治格局变迁”这一问题，将主导权拆解为议题设定能力、资源动员能力、区域传导能力和格局触发能力四项指标，并据此比较全球大国和域外力量、地区大国和区域组织、关键国家与节点国家在不同政治图景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当前非洲政治格局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且持续发挥作用的单一主导者，而是在不同议题和区域中呈现出差异化主导。全球大国凭借议题设定和资源动员能力持续塑造非洲发展的外部战略环境，但其能力结构和作用方式并不完全相同。美欧更多依托开发金融、市场和制度规则发挥影响，中国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和发展合作等领域具有较强资源动员能力，俄罗斯则主要借助军事安全资源、外交支持以及主权和多极化叙事，在萨赫勒、中非等地区形成较为突出的局部影响。这表明，域外力量的实际影响并不简单取决于综合实力，也受到其优势能力与具体地区政治需求匹配程度的影响。地区大国和区域组织则承担着将全球竞争、外部资源和国际议题转化为区域政治过程的重要功能，其作用更多体现为区域层面的传导、协调和制度化；关键国家和节点国家虽然总体实力有限，却依托资源、港口、铁路、海峡、安全伙伴关系以及制度接口等关键节点，在特定议题和关键时刻发挥着超出其综合实力的格局触发作用。三类主体分别作用于不同层级和不同环节，其能力优势既具有互补性，也存在明显的错位特征，共同构成当前非洲政治格局演变的基本动力。

这意味着，对于非洲政治格局的理解，需要从过去关注“谁拥有更强实力”，转向关注“谁能够影响政治格局演变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无论是大国竞争研究还是地区秩序研究，都倾向于将主导权与综合实力、制度地位或领导能力联系起来。然而，非洲近年来的发展表明，实力优势并不必然转化为政治结果。全球大国能够提出议题、投入资源，却未必能够决定政治格局的发展方向；地区大国和区域组织承担着重要的协调和传导功能，但其影响也受到地区政治现实的约束；一些综合实力并不突出的关键国家，则可能因为控制重要资源、战略通道或制度节点，在特定议题中改变地区政治的发展进程。

从这一意义上看，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既有助于解释不同政治图景何以呈现出差异化主导，也有助于突破“大国决定论”或“非洲自主论”等单一分析路径，为理解全球南方地区政治格局演变提供了一种多层次、多主体和过程性的分析视角。未来一段时期，非洲政治格局仍将处于持续调整的过程中。一方面，围绕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数字基础设施、绿色能源、海上通道和全球治理改革的竞争将进一步深化，全球大国和域外力量仍将保持较强的议题塑造和资源供给能力；另一方面，非洲国家战略自主意识持续增强，地区组织和地区大国虽然面临能力分化和机制重组压力，但仍将在区域秩序协调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一些控制关键矿产、港口、铁路、能源通道、安全节点和制度接口的关键国家，其战略价值有望进一步上升，成为影响地区政治走向的重要支点。未来非洲政治格局的演变，既取决于全球力量竞争的方向，也取决于地区机制的调适能力，更取决于关键节点国家如何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和制度空间重塑区域关系。可以预见，差异化主导与复合互动将依然是非洲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特征，而围绕关键节点、资源通道和区域秩序展开的新一轮竞争，也将成为未来非洲国际政治研究值得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

（**责任编辑**　宋羽竹）

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法国与俄罗斯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的博弈*

张　建　杨　润**

【内容提要】当前，全球供应链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议题，非洲因锂、钴、铀等关键矿产资源储量优势，被视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场。在非洲，法国拥有传统影响力，俄罗斯属于既继承苏联遗产、又拥有新兴影响力的大国。在地缘竞争加剧与非洲资源战略价值凸显的背景下，法国与俄罗斯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的博弈呈现出“法降俄升”的战略态势。这一态势在企业、政府、区域多边机制层面表现明显，具体体现在采矿权、物流运输、优惠政策、高层往来以及区域机制发展等方面，法国的传统优势与影响力正在逐步削弱，而俄罗斯的合作优势与影响力正在持续增强。法国与俄罗斯争夺非洲关键矿产的核心动因与战略考量，主要包括殖民历史的代际创伤效应、俄乌冲突的地缘外溢效应与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资源权力效应。法国与俄罗斯在非洲的博弈不仅加快了关键矿产供应链格局重组，也提升了非洲国家的自主性与议价能力，同时也使俄欧地缘竞争加剧，增加了欧盟能源转型的难度。关键矿产全球供应链格局加快重塑，为多极化世界秩序演进注入了新变量，也为非洲国家借助大国竞争实现发展转型提供了机遇。梳理、探析法国与俄罗斯在非洲的博弈，对中国制定更为合理的对非政策具有启发性。

【关键词】全球供应链重构　关键矿产　全球南方　法国与俄罗斯战略竞争　俄非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5-0094(28)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危机、秩序与全球大转型：俄乌冲突后的世界秩序演进”（项目批准号：25JJD810002）的阶段性成果。

** 张建，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外交学院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杨润，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际社会“泛安全化”思潮泛滥，全球供应链安全已成为影响国际体系稳定与国家发展利益的关键变量之一。新冠疫情削弱了经济增长势能，俄乌冲突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了能源与粮食危机，全球能源转型加速，供应链各环节正在调整重构。在全球经济秩序变动、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第四次科技革命兴起的背景下，大国博弈已延伸至关键矿产领域，相关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与可控性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①]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要素，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深刻影响着大国竞合的态势与走向。尽管中国、俄罗斯、美国和欧盟的关键或战略矿产清单之间存在着高度重叠，但由于国情以及经济诉求的不同，各国对关键矿产的定义仍存在一定的差异。[②]法国更为强调“关键金属”，其主要特征有两点：一是由于价格不稳定、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等原因，存在供应不稳定的风险；二是对经济至关重要。[③]俄罗斯则采用“战略性矿产”概念，其中有一类被称为“稀缺性矿产资源”（Дефицитное Минеральное Сырье）。[④]本文认为，关键矿产是指包括铝、钴、石墨、锂、镍、钨、稀土元素等在内的、供应面临风险、却是现代技术不可或缺的矿产，其范围与内涵随技术、地缘格局动态调整。

根据《2026 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在能源、食品供应、关键矿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供应链安全竞争日益激烈。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撒

① 参见郎昆、赵可金：“供应链安全的定义、测算和国际比较”，《国际政治科学》，2024 年第 4 期，第 108-134 页；B. Gokkaya, E. Karafili, L. Aniello, B. Halak, “Global Supply Chains Secu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merging Threats and Traceability Solutions”, *Benchmark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25, Vol.32, No.3, pp.917-942; O. Tazmaite, A. Dafir, I. E. Akrany, W. C. Wijdane, “L’Apport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à la Gestion de la Chaîne d’Approvisionnement: Applications, Enjeux et Perspectives”, *Revue Française d’Economie et de Gestion*, 2025, Vol.6, No.7, pp.371-389; Ноздрев С. В. Глобальные цепочки создания стоимости в Азии на новом этап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25. №2. С.44-60.

② Jiayi Zhou, André månberger, *Critical mineral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ctober 2024, p.5.

③ “Les métaux face aux besoins de la transition énergétique”, le 23 septembre 2025, https://www.notre-environnement.gouv.fr/themes/economie/l-utilisation-des-ressources-naturelles-ressources/article/les-metaux-face-aux-besoins-de-la-transition-energetique

④ Сенаторы обсудили тему добычи дефицитных видо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минерального сырья. 14 марта 2023 г. http://council.gov.r u/events/news/143697/

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拥有约占全球 30%的已探明关键矿产储量。[①]这种资源禀赋使非洲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场，而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均是非洲关键矿产竞争的重要参与方。为保障供应链安全，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博弈手段。中国注重开源、节流、增储、扩容及定价等；欧盟侧重国际联盟、标准制定和研发投入等；[②]美印则积极吸引“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其“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谋求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中实现“去中国化”。[③]法国面对各国争夺非洲关键矿产的态势倍感焦虑，但受限于其综合实力的衰弱，已将注意力投向新兴力量及在安全领域与其竞争激烈的俄罗斯。此外，近年来，俄罗斯在非洲的贸易额呈现波动上涨的趋势。2023 年，俄罗斯与非洲贸易额较上一年增长近 37%，达到 245 亿美元。[④]2024 年，俄非贸易额增长 13%，达到 280 亿美元。[⑤]2025 年，俄非贸易额为 277 亿美元。[⑥]而在主要向法国供应关键矿产的撒哈拉以南地区，法非贸易额却呈现下降趋势。2023 年，法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额为 243 亿欧元。2024 年略有下降，贸易额为 241 亿欧元。[⑦]除此以外，法国对非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而俄罗斯则在不断扩大顺差规模。法非贸易与俄非贸易的走势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非洲地缘政治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重组态势。

① Fonds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 “Afrique Subsaharienne: Tirer Parti de l’Abondance des Minerais Essentiels”, le 29 avril 2024, https://www.imf.org/fr/news/articles/2024/04/29/cf-harnessing-sub-saharan-africas-critical-mineral-wealth

② 杜力普、刘立涛、代涛等：“气候与地缘政治变化背景下中欧战略性矿产资源政策演变研究”，《中国矿业》，2025 年第 2 期，第 57–69 页；宋黎磊、汪平平：“地缘经济视阈下欧盟关键矿产战略的‘再域化’实践及其影响”，《战略决策研究》，2025 年第 5 期，第 46–66 页；赵宁宁、张杨晗：“欧盟对非关键矿产合作的政策实践、动因与挑战”，《德国研究》，2025 年第 3 期，第 33–55 页。

③ 张杰、郝宁科：“美印关键矿产合作的动力与局限”，《现代国际关系》，2025 年第 6 期，第 122–141 页。

④ Дмитрий Вольвач: за 8 месяцев 2024 года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Африкой вырос на 18,5%. 9 ноября 2024 г. https://www.economy.gov.ru/material/news/dmitriy_volvach_za_8_mesyacev_2024_goda_tovarooborot_mezhdu_rossiey_i_afrikoy_vyros_na_185.html

⑤ Лавров: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России и стран Африки вырос на 13% в 2024 году. 20 декабря 2025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8313042

⑥ В РАН отметили успехи России в 2025 году 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 Африкой. 6 января 2026 г. https://ria.ru/20260106/afrika-2066552130.html

⑦ *Objectif Afrique Lettre d’information économique*, September 2025, p.4, https://www.tresor.economie.gouv.fr/Articles/2025/09/22/a-la-une-d-objectif-afrique-legere-baisolde-commercial-s-ameliore

冷战时期，苏联曾在非洲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以新兴参与者身份切入非洲的资源竞争之中，凭借其突出的安全能力，使得法国在非洲地区长期形成的资源控制格局更为复杂，引发了法俄在采矿权、物流运输、优惠政策等方面的博弈。法俄对非洲关键矿产的争夺，不仅展现了当前西方国家尚未调整的霸权心态与非西方国家谋求发展的战略诉求之间的矛盾，还深刻地影响着大国关键矿产的竞合走向，塑造着非洲关键矿产博弈格局。总体来看，法国与俄罗斯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呈现“法降俄升”的战略态势，即法国在非洲法语国家的传统优势持续萎缩，俄罗斯的非对称优势突破成效显著；法俄在非洲力量的消长轨迹，为研究传统大国势力范围衰落的演化机制以及新兴大国崛起的竞合路径提供了现实案例。法俄之间的竞争是传统西方大国与非西方大国争夺关键矿产及供应链主导权的缩影。法俄博弈范围覆盖西非、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等关键矿产核心产区，涉及全球供应链安全的多方主体，对理解大国在非洲资源领域的竞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学界对大国在非洲的竞合给予高度关注，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从战略政策角度分析大国在非洲的博弈动态，[①]二是从关键矿产视角研究大国博弈的特点及影响，[②]三是结合供应链安全与地缘政治变化研究大国

① 参见张春、张紫彤：“法国对非洲安全援助的演变及特点”，《西亚非洲》，2023 年第 2 期，第 97–117 页；张建、郭晓婷：“‘全球南方’视野下俄罗斯对非洲的战略调整及其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4 年第 5 期，第 91–108 页；徐国庆：“近年来俄罗斯与西方在非洲的博弈：世界秩序的视角”，《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 年第 2 期，第 149–158 页；K. Mohamedou, *The Wagner Group, Russia's Foreign Policy and Sub-Saharan Africa*, Geneva: Geneva Centre for Security Policy, 2024; M. Audinet, “En Quête de «Désoccidentalisation»: la Stratégie d'Influence de la Russie en Afrique Subsaharienne”, *Les Études du CERI*, 2025, No.277-278, pp.62-69; Халилова М. Ш.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мягкая сила и политика содействия развитию в Африке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х Ф. Олланда и Э. Макрона –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2012-2021 гг.)//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24. №3. С.44-56.

② 参见孙海泳：“地缘政治回归、关键矿产国际竞争与供应链重构”，《外交评论》，2025 年第 2 期，第 30–60 页；周玉渊：“非洲关键矿产的大国竞争：动因、特征与影响”，《西亚非洲》，2024 年第 2 期，第 24–49 页；M. Müller, “Between Global Geopolitic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BRICS Cooperation in the Mineral Sector”,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5, pp.1-27; Мокина П. Д. Понятие критически важных минерал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контексте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перехода и роль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стран в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ключевых КВММ// Российское конкурентное право и экономика. 2025. №2. С.48-57.

泛安全化问题。[①]总体而言，当前国内外学界围绕大国竞争与博弈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在追踪全球供应链最新动态、对比分析以及提供启示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且法俄在非竞争更多是从安全角度出发，较少从关键矿产及供应链角度出发，这增加了本文研究的必要性。系统考察全球供应链重构视域下法俄在非洲关键矿产政策的现状、深层动因与多维影响，具有启发意义，因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聚焦于：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法国与俄罗斯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的博弈路径与战略逻辑。基于此，本文将以全球供应链重构为分析视角，聚焦法俄的非洲关键矿产政策，解析其现状、驱动因素与多方面影响，试图对法俄在非洲这一领域的竞争进行有效对比分析，进而为大国对非政策、关键矿产政策贡献思考。

二、法国与俄罗斯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博弈的现状

全球供应链重构是多要素协同驱动的系统性变革。企业促进了市场运行，双边关系及相关政策决定着产业部署与推进，区域机制发展为全球供应链重构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非洲关键矿产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中，法国与俄罗斯均在加强布局。目前，法国与俄罗斯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呈现出“法降俄升”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企业的优势、政府和区域机制中优劣势的对比变化三个方面。

（一）企业层面：法俄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的优势变化

在采矿权、物流运输方面，法国企业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的传统优势正在流失，而俄罗斯企业对非关键矿产合作的发展势头良好。

在采矿权方面，法企在非洲国家对采矿权实施国有化进程中逐步退出。一些非洲国家开始收回法国对关键矿产的控制权，如 2024 年 12 月，法国铀矿巨头欧安诺（Orano）宣布失去在尼日尔的三家矿业子公司的运营控制权。

① 参见张明：“论全球供应链中的国家安全泛化趋势与中国因应”，《国际法研究》，2025 年第 2 期，第 130-148 页；B. Gokkaya, E. Karafili, L. Aniello, B. Halak, “Global Supply Chains Secu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merging Threats and Traceability Solutions”, *Benchmark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25, Vol.32, No.3, pp.917-942; M. Forest, “Géopolitique de la Logistique et Rôle du Numérique”, *Annales des Mines-Enjeux numériques*, 2024, Vol.4, No.28, pp.48-51.

2025 年 6 月，尼日尔政府将欧安诺在本国开采铀矿的子公司索迈尔（Somaïr）公司收归国有。2026 年 5 月 18 日，尼日尔政府取消了欧安诺持有的长达五十七年的阿尔利特采矿特许经营权。

相比之下，俄企不仅获得了当地政府授予的矿业开发许可，还替代了不断撤退的法国企业。2025 年 4 月的报告指出，布基纳法索宣布授予俄罗斯矿业公司诺德（Nordgold）对其境内金矿的开发许可证。该许可证覆盖面积为 52.8 平方公里，预计 8 年内黄金总产量将超过 20.2 吨。[①]俄罗斯不仅能借此拓展采矿渠道，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也能缓解来自西方国家的制裁压力。同时，俄企正替代法企与非洲国家开展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Ростех）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Газпром）积极参与非洲能源、矿产开采和基础设施项目。自 2023 年 9 月起，俄罗斯与当时的萨赫勒国家联盟[②]签署了多项协议，涉及领域包括矿产开采，合作主体既有私营又有国有企业。[③]2025 年 12 月，尼日尔国家铀业公司（Timersoi National Uranium Company）与俄罗斯铀一集团（Uranium One Group）签署了关于铀矿开采的合作备忘录。[④]非洲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合作方的选择变化，反映了法俄企业在非合作地位的变化。

在围绕关键矿产的博弈中，物流运输通道地位特殊，传统大国都较为重视物流通道的作用，对全球供应链调整有着深远影响。法企面临的困难与挑战逐步增加。法国跨国企业博洛雷集团（Bolloré）在非洲构建了涵盖港口码头、铁路特许经营权和货运走廊的产业链，还管理着连接港口的铁路线以及相关物流平台。2022 年，该集团以 57 亿欧元的价格将其在非洲的所有物流业务出售给总部位于瑞士的地中海航运公司（Mediterranean Shipping

① “Le Burkina Faso octroie un nouveau permis d’exploitation d’or à la société russe Nordgold”, le 26 avril 2025, https://www.jeuneafrique.com/1683287/economie-entreprises/le-burkina-faso-octroie-un-nouveau-permis-dexploitation-dor-a-la-societe-russe-nordgold

② 萨赫勒国家联盟于 2024 年升级成萨赫勒国家邦联。参与国家有：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

③ Конфедерац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ахеля и дезинтеграция ЭКОВАС. 9 сентября 2024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konfederatsiya-gosudarstv-sakhelya-i-dezintegratsiya-ekovas/

④ “Niger builds relationships with overseas uranium partners”, December 16, 2025, 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niger-builds-relationships-with-overseas-uranium partners

Company S. A.）。[①]2026 年 5 月 26 日，追查跨国腐败案件的非政府组织“非洲集体赔偿”（Collectif Restitution pour l’Afrique）向法国法院提起对博洛雷集团的诉讼。[②]该组织指责这个集团洗钱和欺诈，认为其通过贿赂和不正当手段获得在多哥、几内亚、加纳、科特迪瓦和喀麦隆的港口特许权。[③]这一指控不仅表明法企在非洲物流运输业面临诸多问题，还对法国企业在非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俄企正在加强与非洲的互联互通。俄罗斯直接参与保障与非洲国家间的稳定多式联运通道，将货物运送到非洲。俄罗斯铁路公司（Российские железные дороги）第一副总经理谢尔盖·巴甫洛夫（С. Павлов）曾表示：“我们正探索在布基纳法索、加纳和南非实施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项目的机会。”[④]在俄罗斯举办的国际交通与物流论坛上，坦桑尼亚交通部长姆巴拉瓦（Mbarawa）表示：“我们邀请俄罗斯国有或私营企业参与物流项目和港口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⑤]关键矿产供应链的稳定与物流运输通道是否通畅息息相关，法俄企业在非洲物流运输行业发展情况的好坏，深刻影响着非洲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布局走势。

法国在非洲传统优势持续下降的同时，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竞争力也因此受到冲击。经济学家、法国前驻非外交官皮埃尔·雅克莫（Pierre Jacquemot）认为，法国企业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如今与其他企业处于同等竞争地位。[⑥]目前，已有多家法国企业收缩在非业务，其中包括法国兴业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等法国的大型银行。根据法国非政府组织“生存”

① “Ports and Power: Bolloré’s Exit from West Africa”, April 19, 2026, https://www.rosalux.de/en/news/id/54690/ports-and-power-bollores-exit-from-west-africa
② “French Inquiry Puts Banks’ Role in Bolloré Africa Sale Under the Spotlight”, June 3, 2026, https://www.ecofinagency.com/news/0306-56105-french-inquiry-puts-banks-role-in-bollore-africa-sale-under-the-spotlight
③ “Vincent Bolloré Sold His African Ports Empire for €5.7 billion. African Communities Are Now Going After Every Bank That Helped Him Do It”, June 3, 2026, https://www.billionaires.africa/2026/06/03/vincent-bollore-sold-his-african-ports-empire-for-eur5-7-billion-african-communities-are-now-going-after-every-bank-that-helped-him-do-it/
④ В «РЖД» заявили о намерении осваивать Африку. 22 мая 2025 г. https://trans.ru/news/v-rzhd-zayavili-o-namerenii-osvaivat-afriku
⑤ Россия укрепляет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связи с Африкой. 3 апреля 2026 г. https://mintrans.gov.ru/press-center/news/12583
⑥ “En Afrique, la France reste résolue à défendre s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le 13 mai 2026, https://www.alternatives-economiques.fr/en-afrique-la-france-reste-resolue-a-defendre-ses-interets-economiques?

（Survie）2026 年 1 月发布的报告，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法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市场份额从 15%下降至约 3%，[①]而俄企却逐步深度参与非洲的矿产、能源开发项目。俄罗斯企业埃罗莎集团（АЛРОСА）在安哥拉和津巴布韦进行钻石勘探和开采，俄罗斯铝业公司（РУСАЛ）在几内亚开采铝土矿，卢克石油（Лукойл）在埃及、喀麦隆、加纳、尼日利亚和刚果共和国开发石油项目。[②]电信基础设施也成为俄罗斯关注的新领域。俄罗斯公司通过提供 5G 网络和卫星通信系统，加速建设采矿基础设施，支持资源开采作业的扩展。在关键矿产领域，俄罗斯商业实体参与了非洲的 36 个大型项目，包括集中在中南部非洲的 14 座矿山以及 9 个大多位于北非的烃类项目。[③]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法国企业撤退后非洲关键矿产领域的“真空地带”。

（二）政府层面：法俄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的结构调整

在优惠政策、高层往来方面，非洲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逐渐调整合作布局，总体来看，非洲国家对法国的合作意愿相对下降，对俄罗斯的合作意愿有所提升。

在优惠政策方面，法国在非洲先前享有的政策优势与红利逐渐消减。法国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已与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的税收协定。[④]这些协定旨在协调两国间的税收管辖权，避免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所得重复征税，并防止偷漏税。2023 年 12 月 5 日，马里和尼日尔两国共同宣布，终止与法国政府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的税收协定，理由是“法国的持续敌对态度”和“税收协定”对马里和尼日尔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法

① Olivier Blamangin, *Q ue reste-t-il d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 de la france en afrique?* janvier 2026, p.9.

② Интервью директора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партнерства с Африкой МИД России Т. Е. Довгаленко интернет-изданию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Новое восто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 мая 2025 г.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2018588

③ Ron Matthews, Vlado Vivoda, “In the Crosshairs: Twenty-first-century Superpower Rivalry for Africa’s Critical Mineral”,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6,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security/article/in-the-crosshairs-twentyfirstcentury-superpower-rivalry-for-africas-critical-minerals/C96115CD1B4E0DE771665E9C14D723E6

④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ouble Taxation Treaties, DTTs）是两个主权国家（或地区）之间签订的双边国际条约，目的是协调税收管辖权，防止同一笔跨国所得，被同时征税，造成双重税负，同时一般附带防止跨国偷漏税的条款。

国在非企业曾凭借该政府间协定获得了许多税收优惠，相关业务涵盖了矿产、运输、大型零售等领域，而非洲在法企业在体量与数量上远不如法国在非企业，非洲在税收收入方面有所损失。这些优惠政策终止后，法企在关键矿产领域不得不重新面对双重征税、政策审查趋严等压力。在非洲国家逐步摆脱法非不平等的贸易模式之际，俄罗斯正通过推行对非免债等优惠政策加速俄非合作。2024 年 11 月，俄罗斯原外交部副部长、总统中东和非洲国家问题特使米哈伊尔·博格丹诺夫（М. Богданов）在俄非伙伴关系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结束时接受采访表示，俄罗斯已免除非洲国家总计达 200 亿美元的债务。[①]债务和技术是制约非洲从初级产品出口国向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国升级的重要因素。俄罗斯针对非洲国家的转型痛点，率先单方面提升对非合作的优惠条件，承诺不附加政治条件，逐步融合俄非政府间合作，与法国形成鲜明对比。

法国在非洲法语国家影响力下降，在指责俄罗斯的同时，试图转向非洲英语国家。2026 年 5 月 7 日，马克龙在接受一家名为《非洲报告》的杂志采访时表示，法国绝不是 21 世纪的掠夺者，而俄罗斯对关键矿产则存在掠夺行为。[②]2026 年 5 月 11 日至 12 日，法国与肯尼亚共同主办了法国–非洲峰会。会议宣言呼吁各国尊重自然资源主权，推动非洲关键矿产资源的本地选矿、增值及可持续加工，以支持工业化、经济多元化以及具有韧性的区域价值链。[③]法国首次在非洲英语国家举办高层次、高规格会议，反映了法国与西非前殖民地关系恶化后，向英语经济体倾斜的战略转变。与此同时，俄罗斯正以机制化高层往来的方式与非洲进行良性互动。俄罗斯已经于 2019 年和 2023 年两次举办俄非峰会，2026 年将举行第三次俄非峰会。2025 年 7 月 28 日，俄罗斯原子能公司（Rosatom）和尼日尔能源部签署了一项关于民用核能的合作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通过加强双边合作，提升尼日尔在矿产资源勘探和开采方面的能力。俄罗斯能源部长谢尔盖·齐维廖夫（С. Цивилёв）

① Замглавы МИД РФ Богданов: Африка станет передовым континентом. 13 ноября 2024 г. https://tass.ru/interviews/22380415

② “Macron to Africa: ‘We are not the predators of the 21st century’” May 11, 2026, https://www.theafricareport.com/418100/macron-to-africa-we-are-not-the-predators-of-the-21stcentury

③ The Africa forward 2026 summit declaration, p.5, https://africaforwardsummit.go.ke/static/docs/africa-forward-2026-nairobi-declaration.pdf

强调：“我们的任务不仅是参与铀矿开采，还要在尼日尔建立一个完整的民用核能发展体系。”[①]在俄罗斯举办的国际交通与物流论坛上，多哥宣布与俄罗斯签署备忘录，并明确表达了多哥欲成为西非卓越商业枢纽的愿望，旨在通过与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促进货物流通，提高运输效率。[②]非洲领导人对俄罗斯的选择偏好引发了法国的焦虑。2026 年 4 月底，法国时隔二十四年首次派遣外交部长访问多哥。在俄罗斯致力于将多哥打造成新的战略据点之际，法国的这一行为被解读为争夺该地区的影响力。多哥政治学家马迪·贾巴卡特（Madi Djabakate）认为，“对法国而言，关键不在于‘重返’多哥，而在于扭转其地区影响力的持续下滑态势”[③]。这一判断证实了法国在非洲的整体影响力下行明显。

非洲国家的合作意愿与法俄在非影响力的消长相互联系。非洲国家合作意愿越强烈，合作对象国在非影响力就越突出。尽管法国努力在国际社会扭转殖民者形象，以合作伙伴的身份重新定义法非关系，甚至转向非洲英语国家，但非洲国家对俄合作意愿仍持续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在非洲影响力的增强。

（三）区域机制发展层面：法俄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的能力交替

非洲萨赫勒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多重危机。萨赫勒地区区域治理呈现机制化趋势是地区内各国应对复合型安全、发展矛盾、推进区域一体化、重塑主权自主的制度建设过程。在这一区域发展进程中，安全议题与经济议题对地区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法国对非洲国家的军事、经济影响力正在逐步下降，俄罗斯的影响力则在逐步上升。

在安全议题方面，法国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存在不断减少。近年来，法国驻军出现了遭非洲国家驱逐的现象。2023 年 8 月，尼日尔军政府宣布废除尼法两国一切军事合作协定，要求法国驻尼日尔军队最晚于 2023 年 9 月

① «Росатом» и Минэнерго Нигера подписали меморандум о мирном атоме. 28 июля 2025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7923953

② “Togo: Port de Lomé, partenariat stratégique avec la Russie, percée d’une stratégie de Moscou”, le 22 avril 2026, https://www.koaci.com/article/2026/04/22/togo/societe/togo-port-de-lome-partenariat-strategique-avec-la-russie-percee-dune-strategie-de-moscou_196041.html

③ “La France à l’offensive dans un Togo courtisé par la Russie”, le 20 mai 2026, https://www.jeuneafrique.com/1797243/politique/la-france-a-loffensive-dans-un-togo-courtise-par-larussie

3 日撤离，并驱逐法国驻尼大使。[①]2024 年 11 月 28 日，乍得中断与法国的军事协议，两国 60 年的军事合作结束。这些行为反映了非洲国家浓烈的反法情绪。这种情绪与非洲国家独立自主意识深度绑定，并逐步从军事领域外溢到经济领域。同时，法国在非驻军规模与军事基地覆盖范围均呈现显著的结构性收缩，导致其保障关键矿产跨境运输通道安全的行动能力下滑。法国曾被称为“非洲宪兵”。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的驻非总兵力超过 2 万人，但截至 2024 年 5 月，法国仅在吉布提、加蓬等非洲少数国家保留驻军，其中加蓬基地驻军为 350 人，吉布提基地驻军为 1500 人。目前，法国在非洲仅剩下加蓬和吉布提这两个永久性基地。[②]法国向非洲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也会因军队的撤退而大打折扣。相比之下，俄罗斯释放的军援信号却得到了萨赫勒地区国家的积极回应。2024 年 8 月 30 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С. Лавров）表示，俄罗斯愿意向塞内加尔在加强国防能力和提高其武装部队及情报机关反恐应对水平方面提供协助。[③]俄罗斯外交部发文称：“法非体系正处于严重危机之中，非洲大陆越来越多的法语国家倾向于安全合作伙伴多元化，拒绝接受来自法国的传统军事援助，这些援助带有不平等条件，并造成了附加损害。”[④]法国智库学者塞迪克·阿巴（Seidik Abba）表示，“萨赫勒地区的公众一直强烈要求关闭法国基地，这些基地被视为殖民的象征”[⑤]。但是在法国看来，萨赫勒地区的军事撤退与俄罗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心主任阿兰·安蒂尔（Alain Antil）认为，“俄罗斯为萨赫勒地区政变提供了武装支持，并且在安全方面提供了

① Африканский союз, США и Франция поддержали военное вторжение в Нигер. 11 августа 2023 г. https://www.vedomosti.ru/politics/articles/2023/08/11/989741-voennoe-vtorzhenie-niger

② Laure Alexandre, “La France quitte la Côte d’Ivoire: quels pays conservent des bases militaires en Afrique?” le 20 février 2025, https://www.la-croix.com/international/la-france-quitte-la-cote-d-ivoire-quels-pays-conservent-des-bases-militaires-en-afrique-20250220

③ Лавров: Россия готова помогать Сенегалу в укреплении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30 августа 2024 г. https://ria.ru/20240829/rossija-1969215995.html

④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Франции в Африке. 28 июня 2024 г.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istoricheskie_materialy/1957980/

⑤ Loène Bienvenu, “Retrait des bases militaires françaises d’Afrique: Paris est-il encore maître de son destin?” le 6 janvier 2025, https://information.tv5monde.com/afrique/retrait-des-bases-militaires-francaises-dafrique-paris-est-il-encore-maitre-de-son-destin

保障”[①]。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俄罗斯通过掠夺和剥削平民的私人武装力量来破坏非洲稳定”[②]。非洲国家并未因法国的抨击而改变与俄罗斯合作的进程。2025 年 2 月 12 日，苏丹外交部长阿里·优素福（Ali Youssouf）宣布，苏丹和俄罗斯已经就建立俄罗斯红海海军基地达成了一项“最终协议”。对欧洲和亚洲来说，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是国际贸易的战略通道。该协议的签订，一方面展现了俄非之间积极的军事互动，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俄罗斯开始通过红海基地的介入，联通亚非欧三大洲的核心运输枢纽，依托军事能力的空间拓展，强化对自身相关供应链运输安全的防护能力。法国军事力量的撤退与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增加，反映了法俄两国在保障关键矿产运输领域的能力交替。

在经济议题方面，由法国主导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正在遭到萨赫勒地区国家的排斥。长期以来，法国借助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控制非洲法郎区。2025 年 1 月 29 日，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宣布正式退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这三个国家组成的萨赫勒国家邦联指责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不仅听命于法国，还对他们实施了“不人道、非法的和不正当”的制裁。[③]萨赫勒地区国家退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展现了其对法国在非多边合作框架机制的不认可与不信任。俄罗斯政治学家鲁斯兰·安德烈夫（P. Андреев）指出，“法非合作条款极其苛刻，法国要求法郎流通国必须将法郎储备至法国中央银行”[④]。目前，非洲国家正在退出“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OIF）。尼日尔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CNSP）称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为“空壳”，指控法国多次强行为该组织秘书长职位指定候选人，

① Alain Antil, “Sahel: une recomposition stratégique sans la france”, le 19 décembre 2023, https://www.ifri.org/fr/presse-contenus-repris-sur-le-site/sahel-une-recomposition-strategique-sans-la-france

② “Emmanuel Macron accuse la Russie d’être une «puissance de déstabilisation de l’Afrique»” le 23 juin 2023, https://www.lemonde.fr/afrique/article/2023/06/23/emmanuel-macron-acc use-la-russie-d-etre-une-puissance-de-destabilisation-de-l-afrique_6178885_3212.html

③ “Cedeao: le Burkina, le Mali et le Niger quittent officiellement l’institution régionale”, le 29 janvier 2025, https://www.lefigaro.fr/flash-actu/cedeao-le-burkina-le-mali-et-le-niger-quittent-officiellement-l-institution-regionale-20250129

④ Политолог указал на потерю Францией превосходства в Африке на фоне ослабления ЭКОВАС. 30 января 2025 г. https://iz.ru/1831022/2025-01-30/politolog-ukazal-na-poteriu-fra ntciei-prevoskhodstva-v-afrike-na-fone-oslableniia-ekovas

并指责该组织“屈从于法国的意志和利益”。[①]非洲很多国家逐渐更倾向于与俄罗斯、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合作。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卡罗琳·鲁西（Caroline Roussy）认为，萨赫勒地区国家更多接近俄罗斯与中国。[②]非洲国家开始通过寻求与非西方国家的合作来摆脱法国的控制。

俄罗斯通过突出的安全保障能力，以“安全换资源”，获得铀矿等关键矿产相关权益，冲击法国在西非对铀的主导权。法国试图维系其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却与非洲本土日益增长的民族自主意识形成结构性矛盾，最终导致法非关系长期陷入停滞乃至持续倒退的困境。目前，俄罗斯与多个矿产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加强了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并为这些国家提供正式与非正式的安全服务及援助，交易的支付款项以黄金、钻石等贵金属和宝石形式进行。[③]法俄在非洲区域影响力的交替变迁，进一步放大了全球关键矿产领域供应链的既有脆弱性，推动其进入高风险的重构阶段。

三、法国与俄罗斯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博弈的动因与战略考量

法国与俄罗斯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展开博弈，这与法国曾经的殖民历史、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和未来的关键矿产供应链格局密切相关。非洲国家基于自主的对外合作偏好，成为法国在非传统主导权收缩、俄罗斯在非影响力拓展的核心驱动因素，而这种合作意愿既根植于历史交往，又立足于现实利益，也取决于对未来长远的战略考量。

（一）殖民历史的代际创伤效应

殖民历史的代际创伤效应是指法国殖民非洲的历史至今仍然深刻制约着非洲国家的综合国力，影响着非洲国家的民族情感，决定着非洲与其他国

① “Après sa suspension de la Francophonie, le Niger met fin à toute coopération avec l’organisation”, le 25 décembre 2023, https://airinfoagadez.com/2023/12/25/apres-sa-suspension-de-la-francophonie-le-niger-met-fin-a-toute-cooperation-avec-lorganisation

② Caroline Roussy, “L’OIF face aux départs du Mali, du Niger et du Burkina Faso: la remise en cause d’un ordre international établi?” le 3 avril 2025, https://www.iris-france.org/loif-face-aux-departs-du-mali-du-niger-et-du-burkina-faso-la-remise-en-cause-de-lordre-international-etabli

③ Jiayi Zhou, André månberger, *Critical mineral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ctober 2024, p.34.

家的相处模式与合作规范。

殖民历史致使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冶炼和加工本土关键矿产的能力薄弱，相关产业的生产和贸易成本也极易受到地缘政治冲击和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非洲国家始终未能充分开发和利用自身在关键矿产领域的资源优势，构建完整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只能屈居全球供应链低端，获利微薄。随着时代的发展，非洲民族独立意识觉醒，非洲国家的反殖民情绪愈发浓烈，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去法国化”的趋势逐渐明显。当拥有更多的战略自主权与关键矿产合作对象的选择权时，非洲国家更倾向于选择俄罗斯等非西方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未曾给非洲带来过殖民伤痛，更能以互利合作的方式对待非洲，帮助非洲实现资源利益最大化。比利时埃格蒙特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非洲项目主任尼娜·维伦（Nina Wilén）认为，“随着西方和多边组织在萨赫勒地区的影响力日渐式微，这个新兴区域逐渐被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以及土耳其、海湾国家等中等强国所占据。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属于非西方阵营，并致力于在非洲扩大影响力”[①]。事实上，将法国完全排除在非洲发展关键矿产的进程之外并不符合非洲国家的发展利益。完全清除法国殖民势力残余，会制造大量领域的真空地带，但非洲现有的实力不足以填补这些地带的空白，因此非洲国家需要外来力量制衡法国在非势力，从而获取更多的合作利好空间，以换取自身实现独立发展的缓冲时间，俄罗斯则成为非洲在关键矿产领域制衡法国的重要选项之一。

法国并未深刻意识到殖民历史的影响，将非洲一些国家的做法视为俄罗斯对其影响造成的侵蚀，将非洲的“去法国化”现象直接与俄罗斯在非洲影响力的扩张联系起来。马克龙低估了西非地区对法国政策敌意的历史根源，将其归咎于诸如俄罗斯等战略竞争对手或当地煽动者的政治和舆论操纵。[②]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者阿列克谢·奇哈切夫（А. Чихачёв）指出，“法国曾习惯将非洲视为自己的‘后院’，如今却在非洲迅速地失去地位。按照马克龙的逻辑，法国昔日权威流失的根本原因绝非法国自身的错误，而是竞

① Nina Wilén, “Stepping up Engagement in the Sahel: Russia, China, Turkey and the Gulf States”, April 2025, https://www.egmontinstitute.be/app/uploads/2025/04/Nina-Wilen_Policy_Brief_375_vFinal.pdf

② “France’s Africa Policy under President Macron”, September 28, 2023, https://www.swp-berl in.org/10.18449/2023C51

争对手，主要是俄罗斯的恶意影响”[①]。法国议会调查报告认为俄罗斯对法国开展大规模信息战，特别是在萨赫勒地区，利用“反新殖民主义”的叙事放大非洲民众的反法情绪。[②]法国原外长塞茹尔内（Séjourné）也曾在议会上提到，“俄罗斯向海外散布有关法国的虚假信息，特别是在萨赫勒地区”[③]。这些说法也加重了法俄在非博弈的激烈程度。

殖民历史使得法国难以适应与非洲国家平等自由的贸易往来。法国理想的关键矿产合作，是基于法国在非洲积淀的传统优势，这种优势建立在大量牺牲非洲国家利益之上，与非洲国家觉醒的民族意识背道而驰。殖民历史还助长了法国的霸权心态，使其对非洲区域的新兴外部力量高度警觉，将他国在非的正常合作视为自身利益的流失。相比之下，俄罗斯历史上从未殖民非洲，而且“反新殖民主义”的叙事使其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更为紧密，也使其获得了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信任与支持。俄罗斯塔斯社专家奥列格·奥西波夫（О. Осипов）认为，“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几十年来一直在衰退，而俄罗斯重返非洲则受到欢迎，因为俄罗斯从未表现出殖民倾向，这与法国截然不同”[④]。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在访问俄罗斯时则表示，“俄罗斯为非洲国家争取独立作出了贡献”[⑤]。在关键矿产领域，建立在这种认识之上的法非合作关系本身就极难稳固，而俄罗斯没有殖民非洲的历史，更能以平等友好的姿态与非洲开展合作，其反殖民主义的宣传也能打消相关非洲国家的疑虑，增加互信。

（二）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

俄乌冲突的地缘外溢效应是指俄乌冲突的战略博弈已突破欧洲范围，外

① Франция в Африке: отступление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18 февраля 2025 г. https://ru.valdaiclub.com/a/highlights/frantsiya-v-afrike-otstuplenie-prodolzhaetsya

② “Lutte contre les influences étrangères malveillantes. Pour une mobilisation de toute la Nation face à la néo-guerre froide-Rapport”, le 23 juillet 2024, https://www.senat.fr/rap/r23-739-1/r23-739-18.html

③ “Déclaration de M. Stéphane Séjourné, ministre de l’Europe et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sur les influences étrangères, au Sénat le 18 juin 2024”, le 18 juin 2024, https://www.vie-publique.fr/discours/294710-stephane-sejourne-18062024-influences-etrangeres

④ Через оскорбления и обиды: сможет ли Франция влиять в Африке. 15 января 2025 г. https://tass.ru/opinions/22885037

⑤ Начало российско-экватогвиней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расширенном составе. 2 ноября 2023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page/45

溢至非洲等更广阔的地域，其影响力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层面，而是扩展至经济科技等更多元的领域。

俄乌冲突的性质已发生变化，演变成一场系统性冲突，其波及范围早已超出地区范畴。[①]截至 2026 年 8 月，欧盟已完成第 21 轮对俄制裁的正式通过与落地实施。该轮制裁首次将为俄罗斯“影子船队”提供协助的船只纳入制裁范围，进一步覆盖银行、加密资产、能源等核心领域。俄欧博弈随之蔓延到非洲关键矿产领域，并且形成了法俄博弈的明显态势。法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蒂埃里·布尔哈德（Thierry Burkhard）认为，俄罗斯认定法国是其首要的欧洲对手。[②]在此之前，2026 年 5 月，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说，马克龙以己度人，将其他国家称为“21 世纪的殖民者”，但没有人比法国人更懂什么是殖民主义。他还指出，欧盟和法国有官员曾言“萨赫勒乃至整个非洲都是欧盟的势力范围”。[③]非洲已然成了俄罗斯与西方阵营抗衡的前线。

法国专家乔纳森·吉法德（Jonathan Guiffard）等表示，“俄罗斯精英越来越多地将非洲视为与西方对抗的延伸”[④]。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中部和南部非洲观察站协调员蒂埃里·维尔库隆（Thierry Vircoulon）表示，俄罗斯之所以重视非洲，是因为非洲已成为俄罗斯与欧洲进行地缘战略竞争的场所，俄罗斯获得了这些国家的矿产资源，例如苏丹的金矿。[⑤]法国将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关键矿产领域与俄罗斯形成博弈之势，也是在欧洲之外加强对俄制裁的一种手段。

① 高飞：“世界百年变局与中国治世方案”，《俄罗斯研究》，2026 年第 3 期，第 8 页。
② “France l’une de Ses Cibles Prioritaires, déclare le chef d’état-major des armées”, le 11 juillet 2025, https://www.tf1info.fr/international/en-direcf-avant-le-14-juillet-le-chef-d-etat-major-des-armees-thierry-burkhard-detaille-les-menaces-qui-pesent-sur-la-france-avant-fete-nationale-annonces-macron-2382285.html
③ Лавров: Макрон меряет своим аршином, называя другие страны «колонизаторами XXI века». 15 мая 2026 г. https://tass.ru/politika/27421021
④ Jonathan Guiffard, Charlotte Escorne, Kevin Limonier, “Afrique: les rivalités stratégiques, Russie et Chine: le numérique, vecteur d’expansion”, le 6 août 2024, 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expressions/afrique-les-rivalites-strategiques-russie-et-chine-le-numerique-vecteur-dexpansion
⑤ Rachel Notteau, “Sommet Russie-Afrique. Quelle est la véritable influence de la Russie en Afrique?” le 26 juillet 2023, https://www.lepelerin.com/monde/decryptage/thierry-vircoulon-il-faut-relativiser-l-influence-russe-en-afrique-7797

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涉及诸多领域，对俄罗斯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因此，俄罗斯为寻找突破西方制裁的切入口，转向对非合作，寻求转机与生存空间。为应对金融制裁，普京在第二届俄罗斯-非洲峰会结束后宣布，俄罗斯与非洲国家计划在商业交易中采用包括卢布在内的本币结算。[①]2024 年 8 月 17 日，俄罗斯央行代表访问苏丹，共同讨论本币结算事宜。在非洲国家，卢布在结算中的份额同比增长了 37.7%，达到 98.3%。[②]通过卢布结算渠道，俄罗斯增加了外汇收入，缓解了受西方金融制裁导致的负面影响。俄罗斯与非洲开展关键矿产领域的友好合作，不仅可以提升卢布结算比例，使俄罗斯从与非洲的石油、天然气等贸易中获得经济收入，弥补西方国家制裁带来的经济损失，还可以使俄罗斯提升在非洲乃至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与认可度。非洲国家越发青睐俄罗斯，处于守势的法国就愈发感到不安，并急于维护原有的合作优势和势力范围，通过多重手段限制俄罗斯在非影响力的拓展，最终推动双方在非洲区域的博弈持续走向激烈化。因为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俄非之间正常的贸易合作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非洲国家自主选择贸易合作伙伴的政策空间。

（三）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资源权力效应

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资源权力效应是指在供应链流动的关键矿产资源已与各国在国际社会所掌握的战略筹码挂钩，这种权力将左右一国经济利益与话语地位等。

关键矿产已经从传统工业原材料演变成为能够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地缘政治博弈、高新科技竞争、绿色能源转型、航空航天建设、数字智能发展的战略资源。这种类型的战略资源会转化成资源权力，影响或制约一国的行为。掌握关键矿产的国家可以通过控制关键矿产的供应，制定关键矿产的标准，对其他需求国的行为产生影响或制约作用。事实上，仅仅拥有关键矿产不足以培育一个国家控制关键矿产的能力，唯有深度地参与建设关键矿产供应链，掌握供应链各个环节的核心话语权，才能把资源禀赋真正转化为资源权力。

① Путин заявил о планах перехода РФ и Африки на нацвалюты в 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сделках. 28 июля 2023 г. https://iz.ru/1551183/2023-07-28/putin-zaiavil-o-planakh-perekhoda-rf-i-afriki-na-natcvaliuty-v-kommercheskikh-sdelkakh

② Доля рубля в расчетах за российский экспорт впервые превысила 50 процентов. 16 июня 2025 г. https://ria.ru/20250616/ekonomika-2023150759.html

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显示，钴是军事装备电池以及航空航天工业中坚硬坚固金属的关键原料，而刚果（金）是全球最大的钴生产国。锑是生产弹药和阻燃材料所必需的，而南非是世界上最大的锑生产国之一。[①]尽管非洲国家天然地拥有关键矿产资源优势，但由于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始终居于供应链低端开采环节而无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可观的经济回报，这是非洲国家资源权力难以发挥、议价能力薄弱的重要原因。因此，非洲国家一直在谋求提升资源转化权力的能力。

非洲国家的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为法国与俄罗斯的博弈提供了空间与可能。法俄两国均以表达对非合作意愿的方式试图抢占获取关键矿产资源的先机。2025 年 4 月 23 日，马克龙在与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Rajoelina）会晤时表示：“我们可以在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且以光伏产业为例，发展相关产业链来提升这些资源的价值，而你们拥有发展此类产业链所需的一切要素。”[②]法国政府战略矿产和金属供应部际协调员本杰明·加莱佐特（B. Gallezot）表示：“关键矿产将成为今年在法国举行的 G7 峰会的中心主题之一。这些资源对工业发展和能源转型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并且这一领域的地缘政治和贸易限制正在加剧。”[③]拉夫罗夫谈到对非合作时提到：“俄罗斯和非洲国家都拥有巨大的资源潜力，尤其在采矿业领域，而采矿业在各国的经济发展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2023—2026 年俄罗斯-非洲伙伴关系论坛行动计划》中已明确规定要加强在该领域的互利合作。”[④]除争夺资源权力，法俄两国还有规避资源权力负面效应的需求。有限的关键矿产资源会致使一国处于被动状态，而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中断则可能对技术价格、制造业竞争力、通货膨胀和更广泛的经济

①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Critical Minerals in Africa*, April 2024, p.16, https://ru.scribd.com/document/724623953/Critical-Minerals-in-Africa#page=16

② “Métaux rares: la France en quête d’un partenariat avec Madagascar, où le secteur minier est à la peine”, le 06 mai 2025, https://www.lemonde.fr/afrique/article/2025/05/06/metaux-rares-la-france-en-quete-d-un-partenariat-avec-madagascar-ou-le-secteur-minier-est-a-la-peine_6603456_3212.html

③ “Transition minerals: placing Africa at the heart of designing standards ahead of the G7”, February 26, 2026, https://parispeaceforum.org/press-releases/transition-minerals-placing-africa-at-the-heart-of-designing-standards-ahead-of-the-g7/

④ Лавров отметил значимый ресурс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России и стран Африки. 30 октября 2025 г. https://tass.ru/politika/25497423

产生重大影响，也可能会严重阻碍多元化能源技术制造供应链的发展计划。[①]一方面，法国高度依赖外部矿产供应。法国本土金属矿石开采量极低，每年仅为 20 万吨。[②]法国所用的金属矿产中 99.7%依赖进口。[③]稳住非洲地区持续可靠的矿产资源输送，将断链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能够缓解法国对关键矿产资源匮乏的焦虑感。同时，作为欧洲最大的核电生产国，法国高度依赖安全且多元稳定的铀供应链来保障本国电力系统运转。扩大与非洲的矿业合作，不仅能帮助法国提升铀资源获取能力，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冲击，还可以帮助法国维持其在全球核能市场中的领导地位。因此，法国将非洲定位为法国重新夺回市场份额、确保供应链和加强长期能源安全的关键支柱。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希望参与非洲矿产开发，开展资源投资合作，寻求关键矿产来源多元化，提升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增强自身在全球资源竞争中的战略自主能力。法国与俄罗斯各自的利益诉求，决定了两国在非洲博弈的必然性。

为了实现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法国在非洲地区积极推行欧盟标准，规范非洲关键矿产出口贸易。根据欧盟条例，法国要求进口商对锡、钨、钽、金等关键矿产开展全链条调查，包括来源地风险评估、第三方审计等，确保从非洲等地区进口的关键矿产符合欧盟可持续标准。2025 年 8 月 27 日，法国发布了四项法令，对采矿法律框架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些法令要求对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进行强制性考虑，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安全、公共卫生与安全、公共与私人基础设施的保护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④]法国开发署首席经济学家朱利安·古尔东（Julien Gourdon）指出，与关键矿产相关的机遇需要推广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以促进更负责任的且可持续的做法。如果没有这些标准，非洲可能会成为在其他地方设计的生态转型的隐形受害

① “Overview of outlook for key minerals”, https://www.iea.org/reports/global-critical-minerals-outlook-2025/overview-of-outlook-for-key-minerals
② *État de l’environnement en France Rapport 2024*, p.25, https://www.notre-environ nement.gouv.fr/IMG/pdf/ree2024_rapport.pdf
③ “Ressources naturelles: entre dépendance aux importations et raréfaction”, le 31 mars 2025, https://www.notre-environnement.gouv.fr/ree-2024/4-grands-defis-pour-demain/ressources-naturelles/article/ressources-naturelles-entre-dependance-aux-importations-et-rarefaction
④ “French mining law reform: Publication of four new decrees”, September 19, 2025, https://www.whitecase.com/insight-alert/french-mining-law-reform-publication-four-new-decr ees

者。[①]普京提出，西方的优越感已经发展成为“公然的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这种“新”就表现在制定了一个利己的、拥有巨大领先优势的规则和机制系统。[②]非洲是否具备推行欧盟标准的能力，并未在法国的考虑范围内，这一标准的推广不仅约束了法非合作，也削弱了非洲国家在能力范围内实现资源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从本质上来说，真正尊重非洲国家的独立自主，真正帮助非洲国家实现长治久安，才能获得非洲国家的青睐，也就能真正在非洲建立起持久的影响力。

四、法国与俄罗斯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博弈的影响

法国与俄罗斯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的博弈，不仅影响全球供应链的发展趋势，也促使非洲国家提升自主性，还使欧盟的能源转型受到掣肘。围绕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权争夺已升级为地缘政治竞争。随着这种竞争态势不断加剧，全球对关键矿产资源的争夺不仅将深刻影响能源转型与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轨迹，更将决定全球南方众多国家的发展前景。

1. 加快关键矿产供应链格局重组。法俄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的博弈，会大幅提升局部供应链断供的结构性风险，从而加快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格局的重组进程。

一方面，法国关键矿产政策与欧盟关键矿产规则相协调，不断试图构建对自身更为有利的关键矿产供应链。法国依托欧盟框架，强化关键矿产供应链规范性要求，并推出“稀土联盟”，给关键矿产供应链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技术与规则的竞争从长远角度有助于提升关键矿产领域的安全水平，增加了全球供应链韧性。然而，“稀土联盟”之类则是较为封闭的关键矿产“小圈子”，即使法国等欧洲国家在非洲占有足量的关键矿产，相关的萃取提炼能力仍然存在短板，会引发部分矿产供应的阶段性紧张。同时，欧洲还借助“全球门户”计划投资非洲物流基础设施，参与非洲 11 条战略运输走廊建

① “Mines africaines: comment sortir du piège extractif?” le 9 avril 2025, https://www.afd.fr/fr/actualites/mines-africaines-comment-sortir-du-piege-extractif

② 郭晓婷：“俄罗斯对世界秩序的话语建构与叙事模式分析——基于 2014—2024 年普京在瓦尔代年会的主题致辞”，《俄罗斯研究》，2025 年第 2 期，第 113 页。

设，试图提升关键矿产运输效率与安全性，提升非洲大陆的交通流动性和贸易效率。[①]然而，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能力使得这种做法难以抵挡地缘政治变动与区域合作分歧的冲击。

另一方面，促进供应链多极化，关键矿产格局“去中心化”特点鲜明。俄罗斯通过灵活的安全策略快速切入非洲关键矿产领域，开辟出新的供应链通道，填补了法国相关产业撤出后形成的供应缺口，使得非洲关键矿产开发、运输格局更为均衡。且俄罗斯非洲矿产的通道主要通向亚洲国家、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市场，供应链呈现多极化的特点，非洲关键矿产治理格局“去中心化”特点突出。许多非洲国家基础设施较为陈旧，开辟绕开欧洲的运输路线并非易事，俄罗斯在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方面还有待提升，且各自开辟生产、运输等基础设施也会带来利用率低、维护困难等问题，加剧了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

2. 非洲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自主性提升。法俄围绕非洲关键矿产的政策调整，本质是地缘政治博弈在资源领域的延伸，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地位调整、法俄双边关系变化，更推动非洲地区权力结构重组与利益格局重构，引发地区稳定性的动态变化。

非洲国家自主选择空间扩大，提升了关键矿产议价能力。法俄调整对非关键矿产政策，为非洲国家提供了选择空间。中非总统图瓦德拉（Faustin-Archange Touadéra）被问及法俄力量是否存在不兼容性时表示：“如果我们与法国讨论，那是在法国与中非共和国的利益框架内，而这与同俄罗斯的合作无关。”[②]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 Ramaphosa）也认为，南非“不会被卷入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③]法国的传统影响力与俄罗斯的新兴介入形成战略竞争，使得非洲国家可以不再局限于与某个单一大国合作，转而采取多元平衡战略，对冲大国影响，通过大国间竞争倒逼合作方加大投资力度、

① B. Kavalov, A. Kucas, M. Kompil, P. Proietti, P. Sulis et al., *Global Gateway Support to Transport Corridors in Africa – Consolidated report*,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5, p.19, https://data.europa.eu/doi/10.2760/0495136

② “La Reprise de Coopération RCA-France Gêne-t-Elle la Russie?” le 9 août 2024, https://oubanguimedias.com/2024/08/09/la-reprise-de-cooperation-rca-france-gene-t-elle-la-russie

③ “BRICS: Ramaphosa Refuse ‘une Compétition entre Puissances Mondiales’” le 13 août 2024, https://fr.africanews.com/2023/08/21/brics-ramaphosa-refuse-une-competition-entre-puissances-mondiales

展开技术合作，并且要求合理的利益分配，逐步减弱对单一大国的依赖，实现关键矿产合作获益最大化。同时，关键矿产战略价值与广泛需求也提升了非洲国家的议价能力。刚果（金）于 2025 年 2 月下旬实施为期 4 个月的钴出口禁令，希望可以提振低迷的钴价格。[①]津巴布韦原矿产和矿业发展部长温斯顿•奇坦杜（W. Chitando）宣布，为了实施本地生产硫酸锂的工厂项目，锂精矿的出口将从 2027 年 1 月起暂停。[②]非洲国家依托丰富的关键矿产储量，借由法俄间的政策竞争获得自身政策调整的窗口期，通过提高开发许可门槛、限制原矿出口量、强化本土化要求等措施，争取更有利的合作条件，推动关键矿产收益向本土倾斜。

在全球供应链调整过程中，非洲国家提高了主动性，推动全球关键矿产资源治理向主权化、市场化方向调整。矿产国有化、自主定价、本地加工等诉求也强化并提升了非洲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自主性。

3. 欧盟能源转型成本不断提升，转型困难加大。欧盟能源消费结构中油气资源的占比较大，欧盟经济提升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即是否能实现“绿色转型”。苏联解体至 2022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前，俄罗斯与欧盟国家能源合作关系较为密切，俄罗斯被欧盟视为“能源库”。危机升级后，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双边关系目前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困难的一段时期。[③]欧洲开始了减少对俄依赖、增强自身安全的能源领域“去俄化”进程，加快可再生能源部署，推动能源绿色转型并努力开发替代能源。欧盟转而从美国、中东地区、非洲国家进口能源，这增加了欧盟的运输成本，致使其工业竞争力持续下降。与此同时，欧盟实现了对俄能源进口的断崖式下降与能源结构的加速重塑，但这也对国际能源市场和传统能源价格带来冲击。

作为世界上重要的能源出口国之一，俄罗斯一方面扩大对非西方国家的能源出口规模，另一方面通过在非洲、中亚等地区与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领

① “La RDC suspend ses exportations de cobalt, minerai essentiel à la fabrication des batteries électriques”, le 10 mars 2025, https://www.lemonde.fr/afrique/article/2025/03/10/la-republique-democratique-du-congo-suspend-ses-exportations-de-cobalt-un-parisque_6577892_3212.html

② “Le Zimbabwe va interdire l’exportation de concentrés de lithium dès 2027”, le 11 juin 2025, https://www.agenceecofin.com/actualites-industries/1106-129111-le-zimbabwe-va-interdire-le xportation-de-concentres-de-lithium-des-2027

③ 阿列克桑德拉•莫恰洛娃、谢尔盖•苏特林、李畅：“现阶段俄罗斯与欧盟经贸关系的问题和前景”，《俄罗斯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145 页。

域的竞争，间接增加了欧盟能源转型的难度。如欧盟国家认为核电是一种安全、清洁和可靠的能源，法国较为擅长利用核能发电。关键矿产是法国核电、高端制造的战略支撑。法国欧安诺公司在尼日尔投入前期勘探与基建成本，长期锁定尼日尔低成本铀资源，对铀资源的掌控成为维系法国核电工业领先的基础。2023 年后，尼日尔军政府推动铀矿收益主权化，切断欧安诺公司对铀的掌控，法国核电供应链出现“断供风险”。俄罗斯在尼日尔政变后，提升了与尼日尔铀资源合作的优势。2025 年 11 月，尼日尔军政府与俄罗斯谈判出售约 1000 吨铀矿，交易价值约 1.7 亿美元，并将通过布基纳法索运送到多哥的港口装船。[①]这样，再加上俄罗斯掌握的领先的铀浓缩技术，就形成了对法国甚至欧盟核电供应链的潜在牵制。欧盟被迫加速全球关键矿产多元化布局，加速推动《关键原材料法案》的落地实施，通过提升本土开采、加工与回收能力，降低对单一国家关键原材料的依赖。欧盟不惜成本开辟更多运输通道，与世界其他关键矿产富集国加大合作力度。[②]然而，能源转型成本提升也给欧盟经济复苏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五、结　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大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竞争不断加大。博弈各方竞争强度越大，核心权力节点移动轨迹越明显，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就越难得到保障，全球供应链稳定性就会不断下降。非洲一体化进程和非洲各国现代化建设都在加速，正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年来，随着俄罗斯不断加强和拓宽对非合作的领域与范围，依赖非洲关键矿产的法国产生了越来越强的安全焦虑，不断试图扭转自身在非颓势并增加在关键矿产资源领域的优势。法国、俄罗斯的博弈是众多大国在非洲博弈的缩影，法国还曾联合西方盟友在萨赫勒地区开展国际反恐行动，遏制俄罗斯力量。各方正通过与非洲国家在经济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增强矿产

① «Росатом» отрицает данные о покупке РФ уранового концентрата из Нигера. 7 ноября 2025 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8191802

② 参见张建、郭晓婷：“全球供应链重构视阈下美欧的中亚关键矿产政策”，《国际论坛》，2026 年第 1 期，第 46-47 页。

开发权、规则制定话语权等，改变非洲关键矿产格局，进而重构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这关乎各方的大国地位、地缘影响力与关键技术领先程度。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发展走向、非洲关键矿产的竞合博弈的态势，值得进一步深入追踪和研究。

特朗普第二任期高度重视“矿产外交”，在美欧矛盾加深、欧洲“战略自主”立场愈加鲜明的背景下，法国将更为重视非洲的关键矿产，欧盟也会加大力度争取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规则制度、运输通道等多方面优势。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非洲也将成为俄罗斯突破困境的战略支点。2025 年 12 月，第二届俄罗斯-非洲部长级论坛在开罗举行，这被视为 2026 年即将举行的第三届俄罗斯-非洲峰会的序章。法俄在非博弈是传统资源控制模式与地缘安全捆绑模式的博弈，将会持续，甚至以更为激烈的形式展开。

法俄在非的竞争与博弈为中国发展对非关系提供了启示：将合作与地缘政治诉求过度绑定，容易引发非洲国家的警惕和抵触，而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和意愿，注重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才能实现合作的可持续性。俄罗斯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的做法开辟了非西方路径的实践，但如果经济投入和配套措施不足、不能持续，缺乏与之合作的大国，也可能会导致环境、民生等领域的失衡现象。中非关系整体定位已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合作始终秉持正确义利观，并坚持互利共赢、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已在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民生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合作模式，在实践中打造全球南方产业链协同典范，为共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保障全球供应链有序、韧性发展不断努力。

（**责任编辑**　杨　辉）

俄罗斯经济

全球粮食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及其对中俄粮食安全合作的影响*

姜振军　亢艺颖**

【内容提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球粮食贸易格局正经历深刻而剧烈的重构。本研究借鉴食物体制理论与地缘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三条假设，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 2000—2024 年小麦、玉米、稻谷三大主粮的贸易网络，进行假设验证。研究发现，当前全球粮食贸易格局呈现出三大新变化：一是新兴出口国快速崛起，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二是区域一体化趋势显著增强；三是粮食安全议题不断泛化，多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普遍强化。也总结出影响粮食安全的三大核心因素：权力结构的多极化，空间结构的区域化和规则结构的政治化。这三大核心影响因素对中俄两国粮食安全处境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在明确中俄粮食安全核心诉求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核心因素驱动下中俄两国粮食安全合作的逻辑：供需互补，为中俄合作奠定市场基础；区域化浪潮下，中俄粮食安全合作有望提质升级；同时，外部风险加剧，不确定因素增多。基于两国粮食安全合作所面临的机遇与制约，提出新格局下双边务实合作的实施路径，以期为中俄持续深化粮食安全合作与探索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变革路径提供参考。

【关键词】粮食安全　粮食贸易网络　地缘竞合　中俄合作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6)05-0118(35)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粮食贸易格局演变背景下中俄粮食安全合作研究”（项目批准号：23AGJ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姜振军，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院研究员；亢艺颖，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粮食安全是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随着粮食系统一体化程度加深，粮食安全逐步上升为全球性议题。全球化的粮食贸易网络使各参与主体连成一个整体，使分散的、孤立的粮食系统走向融合，全球层面的粮食贸易重塑了粮食系统的基本结构。[①]全球粮食贸易格局反映了世界各国（或地区）粮食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之间相互影响的状态，表面上体现为粮食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流向，实质上隐含着不同国家在粮食贸易中的权力配置与利益分配关系。全球治理的政策和贸易协定是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而全球农产品贸易治理的参与者往往也是农产品贸易大国。[②]这意味着，全球粮食贸易格局不单纯是由市场供需和资源禀赋决定的，而是大国通过粮食贸易地缘竞合、规则制定、资源整合等方式，不断强化自身优势和寻求个体利益的结果。

当今世界正处于动荡变革期，世界秩序正在从“霸权更替”变革为多中心的“竞争共存”。[③]相应地，全球粮食贸易格局也正在经历深度重构。全球粮食贸易关系逐渐趋于复杂化，国家与地区间贸易联系增多。[④]传统西方主导、市场化运行、通道相对集中的粮食贸易格局逐步弱化，地缘竞合加剧、新兴力量崛起、贸易流向多极化、治理规则多元化的新格局已经开启。[⑤]近期，频繁爆发的地区冲突加剧了全球粮食市场的危机形势。持续的冲突将进

① 苏瑞娜：《全球粮食市场制度探源：兼论我国粮食安全》，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39 页。

② 熊启泉、喻美辞：“农产品国际贸易新格局形成中的中国因素”，《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3 期，第 78-93 页。

③ 鞠建东：《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年，第 132-135 页。

④ 参见聂常乐、姜海宁、段健：“21 世纪以来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空间格局演化”，《经济地理》，2021 年第 7 期，第 119-127 页；Z. Yin, J. Hu, J. Zhan et al.,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global major grain trade patterns”,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24, Vol.23, No.3, pp.1075-1086.

⑤ 参见姜汉：“基于社会网络的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 年；刘晓音：“全球粮食贸易格局演变对区域粮食安全的影响”，《粮油与饲料科技》，2025 年第 7 期，第 10-12 页；Joaquin Arias et al.,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Promoting Food Security”, *IICA and Insper Agro Global*, September 11, 2024, https://opsaa.iica.int/en/resource-1722-the-role-of-international-trade-in-promoting-food-security; Jayson Beckman, John Dyck, Kari E. R. Heerman, “The Global Landscape of Agricultural Trade, 1995-2014”, *USDA*, November 13, 2017, https://www.ers.usda.gov/publications/pub-details?pubid=85625

一步激化粮食供求矛盾，推高农业生产成本，正在加速颠覆现有的粮食贸易格局。[①]在一系列外部因素冲击下，各国越来越意识到粮食市场具有“嵌入性”[②]特征，随时会遭遇外部系统性风险，进而影响粮食安全。

在此背景下，全球粮食贸易格局呈现出非对称的结构性特征，地缘竞合带来了一系列现实性挑战。鉴于此，本研究参考食物体制理论与地缘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假设，前者对国际分工秩序的历史结构性演变作出解释，后者分析大国竞合博弈、相互依赖、安全需求等当代地缘经济要素，综合考察全球粮食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及其对中俄粮食安全合作的影响。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提出可检验的研究假设，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下文简称“SNA”）对 2000—2024 年全球小麦、玉米、稻谷贸易网络进行量化分析与实证检验。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研究国际贸易系统演变的规律，已成为一个成熟的研究方向。在粮食贸易领域，众多学者借助这一方法，围绕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演变趋势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稳健且脆弱”：一方面，全球化推动网络互联互通增强、密度提升，并未导致系统整体稳定性下降，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参与者越多，贸易关系越紧密，越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全球粮食贸易对少数核心出口国依赖度高，在外部冲击下仍具有脆弱性，过度依赖进口与片面追求自给自足均难以保障粮食安全。[③]

现有研究借鉴食物体制理论，揭示了全球粮食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以及由霸权更替与资本积累所引发的周期性粮食

① 参见钟钰、陈希、崔奇峰：“俄乌冲突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世界农业》，2022 年第 10 期，第 18-27 页。

② 卡尔·波兰尼（K. Polanyi）在其《大转型》一书中提出“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指出经济活动并非独立自足，而是嵌入在社会关系、政治制度和文化规范之中。本研究借用这一概念，是指粮食市场或粮食贸易无法真正脱离国家干预、地缘政治和社会文化等非经济性约束。

③ 参见和聪贤：“世界粮食贸易网络演变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21 年；M. Sartori, S. Schiavo, “Virtual water trade and country vulnerability: A network perspective”, *MPRA*, October 2014, https://mpra.ub.unimuenchen.de/59210; J. Wang, C. Dai, “Evolution of Global Food Trade Patter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ood Security Based on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Foods*, 2021, Vol.10, No.11, pp.2657.

危机。[①]已有学者将食物体制理论与 SNA 结合，构建亚洲国家的蔬果贸易网络，论证了亚洲高价值作物贸易已形成以中国、泰国、越南为核心的多极化网络。[②]以上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了食物体制理论的分析框架，为将 SNA 方法应用于全球粮食体系演化研究提供了可参照的学术范式，也为本研究构建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完备的文献支撑体系。

现有研究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承担风险的结构性弱势，以及在粮食治理格局中的被动处境。[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粮食贸易分工中的地位和角色并未发生根本性逆转，发达国家始终是全球粮食贸易的领导者和最大赢家。[④]

在此背景下，我国积极寻求与多国进行粮食安全合作，共同探寻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之道。[⑤]保障粮食安全，需要充分统筹和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一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学界多聚焦于中国与东盟、非洲等区域的粮食安全合作问题开展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⑥]与此同时，针对中国与俄罗斯的相关研究也积累了一定的基础。这些研究多侧重于农业合作层面，围绕贸易互补性、农业投资与产能协作等相关议题展开探

① 参见苏瑞娜：“从粮食制度理论视角理解全球粮食危机：一项新的研究议程”，《社会科学家》，2013 年第 4 期，第 69-73 页；许准：“国际粮食体系的危机与重建”，《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 年第 1 期，第 203-220 页；焦玉平：“粮食不安全：发展中国家是如何丧失粮食主动权的”，《文化纵横》，2024 年第 3 期，第 107-115 页。

② Kuan-Chi Wang, “Reimagining the global food regimes for relational spaces”, *Area*, 2021, Vol.53, No.4, pp.637-646.

③ 参见朱晶、张瑞华、谢超平：“全球农业贸易治理与中国粮食安全”，《农业经济问题》，2022 年第 11 期，第 4-17 页；林海、罗璇：“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研究”，《粮油食品科技》，2023 年第 4 期，第 18-27 页；T. Distefano, F. Laio, L. Ridolfi et al., “Shock transmiss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Food Trade Network”, *PLOS ONE,* 2018, Vol.13, No.8.

④ 参见封志明、赵霞、杨艳昭：“近 50 年全球粮食贸易的时空格局与地域差异”，《资源科学》，2010 年第 1 期，第 2-10 页。

⑤ 参见张帅：“全球发展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粮食安全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4 期，第 117-137 页。

⑥ 参见贺嘉洁：“国内实践、地区合作与东亚粮食安全——以‘东盟与中日韩紧急大米储备’机制为例”，《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 年第 6 期，第 97-125 页；崔海宁：“东亚粮食安全合作治理机制有效性分析”，《太平洋学报》，2022 年第 9 期，第 48-61 页；徐佳利、张利利：“地缘竞合视角下非洲粮食安全治理与中非合作”，《中国非洲学刊》，2024 年第 4 期，第 53-70 页。

讨。[①]既有的相关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注意到，既有文献较少以全球粮食贸易格局的新变化为逻辑起点，系统考察其对中俄两国粮食安全处境的影响。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本研究拟以此为切入点，在分析格局变动对两国粮食安全差异化影响的基础上，探讨这一变动如何作用于双方粮食安全合作的逻辑，进一步明确中俄粮食安全合作的长远发展方向和可落地的实施路径。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引入食物体制理论与地缘经济理论搭建全文统一的核心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三项研究假设。基于贸易数据搭建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引入社会网络分析开展量化测算，厘清粮食贸易网络形态演变的历史动因，为后文检验假设提供方法支撑。

（一）理论基础

全球粮食贸易格局的演变及粮食安全问题，是典型的跨学科议题。融合了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维度，需依托多学科理论融合的视角进行解析。因此，本研究选取食物体制理论与地缘经济理论互为补充，为研究奠定相关理论基础。

1. 食物体制理论。食物体制理论（Food regime theory）[②]是农业社会学的经典理论流派。这一理论从全球政治经济变迁的宏观视角出发，将全球食物体系变迁融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揭示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全球农业和食

① 参见傅国华、吕卉：“深化中俄农业合作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理论探讨》，2017 年第 2 期，第 89-92 页；蒋菁：“俄罗斯粮食安全现状与中俄粮食合作前景”，《东北亚学刊》，2022 年第 4 期，第 111-122 页；Лизовская В. В., Молдован А. А.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 задач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аграрной кооперации// Оригин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22. №4. С.187-194; Шагалов В. А., Сюй Ж.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оссии и КНР в област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2021. №3-4. С.27-33.

② 食物体制理论（Food regime theory），亦可称作“粮食体制理论”、“粮食制度理论”、“食物制度理论”等。本文选用“食物体制”译法，一是该理论提出时所包含的研究范围涵盖全部食物，“粮食”属于其中一个范畴。二是体制侧重于整体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方式，兼具规则秩序、权力结构、运行机制与历史演化等多重内涵。

物体系来形塑整个世界的。[①]1989 年，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n）和麦克迈克尔（Philip McMichael）正式提出食物体制理论，认为全球食物流通并非由个体交易行为决定的市场，而是形成了具有特定结构、运行规律与权力关系的跨境网络体系，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的贸易模式与治理秩序。[②]该理论借鉴了阿格列塔（Michel Aglietta）的调节理论和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强调“规则”和“体系”这两个核心概念，即当资本积累体制与霸权秩序相对稳定时，食物体制以相对固定的“规则”支配全球农业生产、贸易与消费，并维系以霸权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如英国主导的第一食物体制、美国主导的第二食物体制）。

当霸权衰落或秩序变更时，旧食物体制的规则逐渐丧失有效性，其组织的分工体系走向崩塌，新要素逐步发展壮大，并最终推动新食物体制的形成。时至今日，围绕“第三食物体制”的讨论依旧是学界的热点，对跨国企业主导的第三代食物体系是否成型尚未有定论。[③]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跨国粮企，其凭借垄断技术建立的新体制，强化了“核心–边缘”的贸易不平等和矛盾。

食物体制关注食物系统整体的历史性变迁，聚焦的主要问题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生产或消费何种食物？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通道由谁控制、遵循何种规则？[④]本研究关注的是更为狭窄和更具代表性的粮食问题，这一理论为理解全球粮食体系的权力结构与制度演化提供了宏观分析框架。

全球粮食体系是指世界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主导粮食生产、

① 熊春文、柯雪龙、李梦琪：“食物体制的演进及其中国意义——一个农业社会学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1–23 页。该研究清晰讨论了食物体制理论的内容和演进过程，可作为本研究学术史的补充。

② See H. Friedmann, P. McMichael, “Agriculture and the State Syste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al Agricultures, 1870 to the Present”, *Sociologia Ruralis,* 1989, Vol.29, No.2, pp.93-117; P. McMichael, “A Food Regime Genealogy”,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09, Vol.36, No.1, pp.139-169; H. Friedmann, “Commentary: Food regime analysis and agrarian questions: widening the conversation”,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16, Vol.43, No.3, pp.671-692.

③ H. Bernstein, “Food Regimes and Food Regime Analysis: A Selective Survey”, *BICAS*, April 2015, https://www.plaas.org.za/bicas

④ H. Bernstein, “Agrar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dern world capitalism: the contributions of food regime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16, Vol.43, No.3, pp.611-647.

交换、消费的种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安排。[①]食物体制理论从历史叙事角度出发，将全球粮食体系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对应特定的“核心-边缘”结构，用以解释全球粮食生产、贸易与消费格局的形成与演变。该理论的论证主要依赖于历史叙事和比较分析，缺乏量化工具衡量全球粮食体系的结构性变迁。粮食贸易格局演变是全球粮食体系变迁在贸易层面的显性表现，其可以具象、量化为网络结构。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中的核心国家分析等测算，可以进一步解析食物体制理论所描述的“核心-边缘”结构的演化轨迹。若核心国家群体趋于稳定，则“核心-边缘”结构稳固；若核心国家群体发生更替，则意味着原有结构松动甚至是体制更迭。此外，食物体制理论为区分不同国家在全球粮食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提供了理论框架，针对所处位置的差异，各国会采取差异化的粮食安全策略。由此可以提出，中俄两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定位和功能不同，对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诉求也存在差异。

2. 地缘经济理论。为了更全面的解释当前地缘竞合背景下全球粮食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及其产生的外溢影响，本研究引入地缘经济理论作为食物体制理论的补充分析视角。地缘经济理论侧重运用经济权力工具，服务于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地缘战略目标，关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双重逻辑。[②]当前，世界之变加速演进，随着地区冲突趋于长期化，局势持续紧张，以及部分国家奉行竞争、冲突与合作的战略，和平与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地缘竞合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化特征，粮食等大宗商品贸易不仅受到市场因素影响，更受制于国家安全战略、地缘政治、物流通道等因素。

粮食兼具经济、安全、战略属性，其贸易与供应链网络日益成为地缘竞合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地缘经济竞争逻辑下，各国通过竞争性手段寻求战

① 许准：“国际粮食体系的危机与重建”，《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 第 1 期，第 203-220 页。

② 参见薄荣康：“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演进和网络时代的地缘政治博弈”，《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5 年第 2 期，第 141-159 页；吴怀中、从伊宁：“国际变局下日本经济外交的战略性调整论析——基于‘地缘经济学’的分析视点”，《东北亚论坛》，2025 年第 4 期，第 59-75 页。

略优势，区域内部的联系趋于紧密，深刻重塑着全球粮食贸易格局。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上则表现为平均聚类系数与平均路径长度同步上升，团体化趋势加强，全球连通性下降。另一方面，各国也利用合作性机制维持全球粮食体系的稳定。[①]通过区域合作机制强化贸易联系，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上则表现为平均聚类系数上升的同时，平均路径长度保持平稳或下降。[②]

由此，以全球粮食贸易格局和中俄粮食安全合作为研究对象，借鉴食物体制理论与地缘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提出三条可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指标量化检验的研究假设：

H1：2000—2024 年，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密度增加，规模扩大。传统粮食进出口大国的加权总度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而巴西、俄罗斯、乌克兰等新兴国家的加权总度占比呈显著上升趋势；

H2：地缘竞合背景下，受合作逻辑驱动，全球粮食贸易格局呈现“区域性”[③]特征，表现为平均聚类系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平均路径长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H3：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中国的加权入度水平显著高于俄罗斯，俄罗斯的加权出度水平显著高于中国，存在供需互补关系。

（二）社会网络分析法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将食物体制理论与地缘经济理论的推演转化为可量化比较的指标，使本研究的三条假设可在数据层面得到验证或修正。以网络中的节点代表世界上进行粮食国际贸易的国家，每个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线共同构成全球粮食贸易的社会网络模型，以此将全球粮食市场的贸易关系组成一个抽象的网络模型，便于

① 参见徐佳利、张利利：“地缘竞合视角下非洲粮食安全治理与中非合作”，《中国非洲学刊》，2024 年第 4 期，第 53-70 页。

② 上述两种情况均指向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呈现“区域化”趋势。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区域化”趋势并非是持续稳固的，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出现团体性下降的情况，表现为平均聚类系数回落、社团结构稳定性下降等网络信号。在竞争或合作逻辑下，平均聚类系数未必一定上升，也可能出现下降的情况。各国还可能通过主动分散进口来源以降低对特定国家或区域的依赖，在网络中则表现为平均聚类系数下降。

③ 本研究所指的“区域性”概念，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地理邻近属性，而是扩展为由供应链关联度、贸易便利化水平、物流通道连通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功能性区域”聚类。“区域化”则是上述区域性关联不断深化的动态过程。

分析粮食国际贸易格局。

1. 数据选取。本研究使用的主要数据是 2000—2024 年世界各国小麦、玉米、稻谷进出口贸易数据，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一性，选取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中的数据，其中小麦、玉米、稻谷的 HS 编码分别为 1001、1005 和 1006。[①]为了保证各国和地区的数据完整有效，本研究参考了吴钢的国家和地区选定办法，[②]清洗后的数据包含了 180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独立主权国家有 170 个，独立的海外属地、自治区及其他特殊政区有 10 个。[③]

为了更精确地刻画网络结构，通常会依据不同情况进行数据清洗，将小额贸易流视为“非实质性经济联系”，通过阈值过滤提升分析效度。[④]本文选择粮食贸易额达到一定规模的国家或地区，即小麦、玉米或稻谷进口贸易额不低于 100 万美元的国家或地区，包括绝大部分有粮食贸易记录的国家。有关 2000—2024 年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关系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2. 网络构建。本研究的分析主要基于无权有向网络A^t和加权有向网络W^t两种形式（t=年份）。无权网络只反映节点与节点之间是否有连接，而不能表示这种连接关系的强弱，侧重于网络密度、平均聚类系数及平均路径长度等对贸易网络描述性和整体结构性的分析。加权网络能更真实地反映网络情况，更关注关系强度的差异。考虑到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是有方向

① 本研究所有涉及的全球贸易数据，若无特别注明，均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由于联合国并未对世界所有国家的进出口数据进行报告，所以本研究所构建的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仅包含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

② 吴钢：“人文关系网络对国际贸易网络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长沙：湖南大学，2014 年。

③ 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各报告国的进口数据和出口数据无法完全对应，考虑到各国海关监管和关税申报通常较为严格，以及 2022 年俄乌冲突升级后联合国停止更新俄罗斯的出口数据，因此本文选取了各报告国进口数据进行贸易网络的构建。如查询数据里缺失报告国（Reporter）从伙伴国（Partner）的进口数据，则通过查询伙伴国到报告国的出口数据来进行补充。

④ 例如，魏素豪在论文中将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量超过 1 亿美元、单边农产品进出口量具有超过 0.1 亿美元的贸易流量作为筛选标准。奎国秀和祁春节在相关研究中选取了柑橘进口额或者出口额不低于 100 万美元的国家或地区。参见魏素豪，“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结构、关联特征与策略选择”，《农业经济问题》，2018 年第 11 期；奎国秀、祁春节，“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世界柑橘贸易格局演化研究”，《世界农业》，2022 年第 6 期。

的，所以本文中的贸易网络为有向网络。

表 1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数据的描述性统计（2000—2024 年）

年份	节点数（个）	边数（边）	总贸易额（亿美元）*	有效贸易额占比（%）*
2000 年	161	969	293.28	98.62
2001 年	160	1036	297.66	98.58
2002 年	160	1078	324.51	98.68
2003 年	165	1160	359.46	98.69
2004 年	169	1171	418.23	98.88
2005 年	166	1177	401.23	98.89
2006 年	169	1251	450.63	98.95
2007 年	173	1359	671.59	99.26
2008 年	172	1617	958.96	99.40
2009 年	169	1518	689.29	99.19
2010 年	169	1603	768.10	99.93
2011 年	166	1560	1044.49	99.49
2012 年	165	1596	991.93	99.42
2013 年	169	1722	1038.53	99.44
2014 年	167	1699	1070.02	99.46
2015 年	174	1682	920.59	99.35
2016 年	169	1715	896.53	99.34
2017 年	171	1748	951.26	99.34
2018 年	172	1725	1023.11	99.42
2019 年	168	1721	999.64	99.41
2020 年	167	1763	1056.38	99.44
2021 年	168	1746	1374.10	99.56
2022 年	167	1762	1646.78	99.64
2023 年	160	1800	1464.33	99.61
2024 年	145	1644	1270.5	99.5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数据整理得出。①

① 总贸易额为：数据清洗并设置阈值后，所保留的整体网络中的总贸易额。有效贸易额占比为：设置阈值筛选后所保留的贸易额÷筛选前总贸易额×100%。

借鉴已有的研究方法，将国家记为节点，国与国之间的粮食进出口关系为节点之间的连线，看作“边”，则该贸易网络系统 G 可用 G=（V，E，W）表示。其中，V=$\{V_1, V_2, V_3, \ldots\ldots V_n\}$，$V_n$表示所有节点，即参与贸易的国家，E=$\{E_{ij}\}$为边的集合，表示粮食贸易主体之间的联系，边的方向可以反映粮食的出口或进口，权重矩阵 W=$\{W_{ij}\}$表示 t 年 i 国和 j 国的贸易额 w 的集合，应用于加权网络，当主体之间无贸易往来则W_{ij}=0。

表 2　网络结构特征主要指标、含义及公式

指标	含义	公式
网络密度	反映网络中各节点之间连线的疏密程度，其取值范围为[0，1]	$D_d = \frac{L}{n(n-1)}$
平均度	衡量网络中所有节点连接边数的平均值	$AD = \frac{M}{N}$
平均聚类系数	反映网络中节点的集聚程度，衡量“贸易小团体”的紧密性，取值范围为[0，1]	$\bar{C} = \frac{1}{N}\sum_{i=1}^{N} C_i$
平均路径长度	衡量贸易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平均步数	$AP = \frac{1}{N(N-1)}\sum_{i\neq j} d_{ij}$
加权度	加权度表示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贸易总额，在有向网络中还可以分为入度和出度	$S_i = \sum_j w_{ij}$
社团检测	基于模块度优化算法划分区域性贸易集团，分析贸易网络中小团体分化情况	$Q = \frac{1}{2L}\sum[A_{ij} - \frac{k_i k_j}{2L}]\delta(c_i, c_j)$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社会网络分析相关经典文献整理自制。

以上所选取的网络结构指标均基于前文假设的推导设定，各项指标并非独立对应单个假设，而是多项指标进行交叉验证，其中以加权度计算核心国家构成，辅以网络整体特征指标共同检验 H1，同时通过加权入度和加权出度的差异验证 H3 中俄定位分化。采用平均聚类系数、平均路径长度、网络密度、社团检测多指标综合检验 H2。

二、结果与分析：全球粮食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从 2000 年到 2024 年，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规模呈现稳步扩大态势。全球粮食年度总贸易额由 2000 年的 293.31 亿美元增长到 2024 年的 1203.69 亿美元，增长约 3 倍。参与全球粮食贸易的国家或地区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全球粮食贸易网络。

（一）网络整体特征

平均度表示平均每个国家有多少贸易伙伴；网络密度反映贸易关系的紧密程度，若密度低，说明贸易关系稀疏；平均聚类系数衡量区域性贸易集团的紧密程度，系数高表示区域化强，系数低表示贸易分散；平均路径长度衡量任意两国间平均需经过多少中介国才能完成贸易，路径短表示全球供应网络高效，路径长暗示供应链较为脆弱。由图 1 可以看出，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平均度从 2000 年的 6.019 增加到 2024 年的 11.338，说明各参与主体的连接性在增加，其中 2008 年粮食危机与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平均度均出现较大幅度提升，成为推动网络连接度扩张的重要节点。全球性的危机并没有如想象中的中断贸易联系，而是推动了粮食供应链的快速重构，各国通过寻找新的贸易伙伴促使彼此的联系更加紧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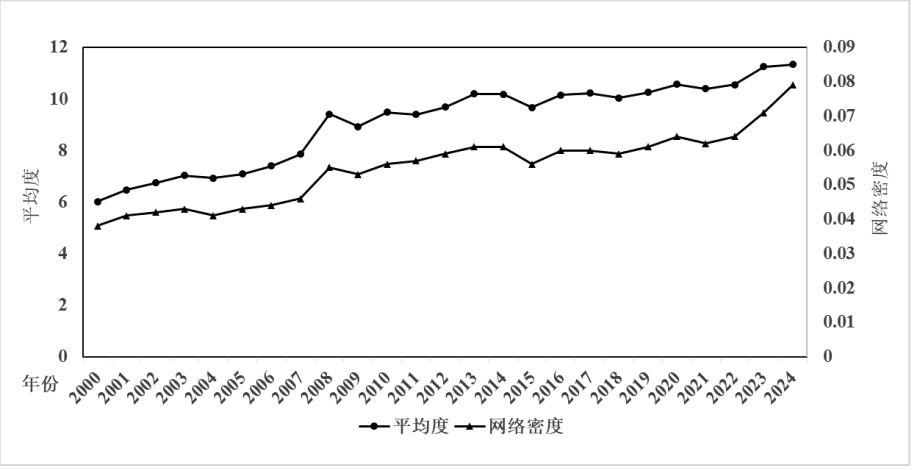


图 1　2000—2024 年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平均度及网络密度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 Gephi 统计计算的数据整理得出。

网络密度从 0.038 波动上升至 0.079，增长超过一倍。总体在研究期内呈上升态势，无明显回落。各参与主体之间的贸易关系日益复杂，一体化程度加深。但是，一般来说，网络密度处于 0.10~1.00，表明贸易国之间联系紧密。[①]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密度最高值为 0.079，依旧属于稀疏网络。平均聚类系数在 2000 年为 0.308，逐步波动至 2024 年的 0.357，总体趋势较为平稳，但偶有小幅波动。整体上保持较高水平，这表明网络中存在局部抱团趋势。2000—2019 年从 0.305 上升至 0.415，反映出全球区域性贸易增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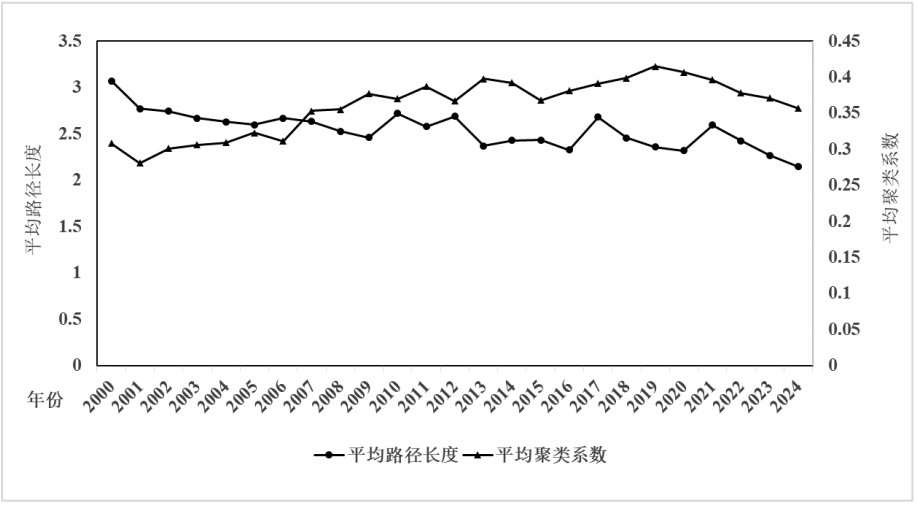


图 2　2000—2024 年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平均聚类系数及平均路径长度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 Gephi 统计计算的数据整理得出。

2019—2024 年小幅回落至 0.357，在此期间部分区域集群关联度在短期内弱化，但仍高于 2010 年前的水平，区域集群化仍是网络的核心特征之一。同时，平均路径长度从 2000 年的 3.072 逐渐下降至 2024 年的 2.145，表明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流通效率逐步提升，任意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距离减少，贸易流动变得更加高效。上述指标与 H2 的预期一致，平均聚类系

① 徐斌、刘杨倩宇、叶利莹等：“全球锡矿典型产品网络贸易格局演变与中国地位”，《经济地理》，2023 年第 12 期，第 113-125 页。

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平均路径长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地缘合作逻辑主导全球粮食贸易，呈现出功能性区域集群化格局。

整体来看，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呈现出：规模扩大、效率提升、关联紧密、区域化、多元化、复杂化趋势。

（二）核心国家

为了减少冗余数据，突出关键结论，本研究在分析“核心-边缘”结构时选取了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2020 年和 2024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以此覆盖 2000—2024 年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主要发展阶段。

在进行核心国家识别时，以加权总度占比累计超过 50%作为筛选依据。也就是通过对各国加权度占比数据依次累加，当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阈值时，所涵盖的国家即被界定为核心国家。相关年度核心国家及对应加权总度占比分布如表 3 所示。

在表 3 中，各年份的粮食净进口国如下：2000 年为日本、韩国和意大利；2005 年为日本、西班牙、意大利和韩国；2010 年为日本、埃及和意大利；2015 年为日本、埃及和越南；2020 年为中国、越南、日本、埃及和墨西哥；2024 年为中国、墨西哥、埃及、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其余核心国家均为粮食净出口国。

2000—2024 年，核心国家数量保持在 10~14 个，始终占据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约 50%的加权总度，说明全球粮食贸易网络长期由少数国家主导。在 2000 年，全球粮食贸易的核心国家主要集中在欧美和部分亚洲国家，核心国家的数量为 10 个，且美国在全球粮食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加权度占比高达 16.46%。此时，全球粮食供应者相对集中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核心国家的数量和结构逐渐发生了变化。到 2010 年，核心国家数量进一步增加至 13 个，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逐渐崛起，成为全球粮食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美国的加权度占比降至 13.19%，虽然依然占据领先地位，但其相对份额开始受到挑战，全球粮食贸易的多极化趋势逐步显现。在 2015 年和 2020 年，新兴经济体的加入使得美国的占比继续下降，全球粮食贸易的核心国家数量保持在 14 个，全球粮食供应端变得更加分散。

表 3　2000—2024 年核心国家加权总度占比（累计）分布表

年份	核心国家	加权总度占比（累计，%）
2000 年	美国、法国、日本、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中国、韩国、泰国、意大利（10 个）	51.91（16.46、6.15、5.47、5.45、4.16、3.53、3.29、2.48、2.46、2.46）
2005 年	美国、法国、日本、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西班牙、泰国、意大利、韩国、德国（12 个）	51.76（14.30、5.62、5.17、4.22、3.90、3.10、2.84、2.78、2.63、2.42、2.40、2.38）
2010 年	美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泰国、德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埃及、越南、印度、意大利（13 个）	50.38（13.19、5.19、4.01、3.55、3.15、3.14、3.12、3.10、2.68、2.47、2.31、2.31、2.16 ）
2015 年	美国、加拿大、法国、印度、巴西、乌克兰、泰国、俄罗斯、日本、阿根廷、澳大利亚、德国、埃及、越南（14 个）	50.47（10.18、4.02、4.01、3.82、3.65、3.38、3.07、2.98、2.94、2.64、2.53、2.49、2.39、2.37 ）
2020 年	美国、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加拿大、巴西、中国、法国、印度、越南、日本、埃及、墨西哥、泰国（14 个）	51.25（9.34、4.46、4.01、4.01、3.70、3.53、3.39、3.26、3.18、2.78、2.53、2.49、2.32、2.25 ）
2024 年	美国、巴西、乌克兰、俄罗斯、加拿大、中国、阿根廷、墨西哥、法国、泰国、印度、埃及、印度尼西亚、日本（14 个）	52.13（9.62、4.48、4.29、4.27、3.48、3.45、3.32、2.95、2.87、2.81、2.74、2.7、2.68、2.48）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 Gephi 统计计算的数据整理得出。①

通过整体网络特征和“核心-边缘”分析，结果验证 H1 成立。全球粮食贸易网络规模扩大、关联紧密。同时，传统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中心-边缘粮食分工结构正在松动。从根本上说，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粮食体系是难以持续的，这一点与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各种国际秩序类似。随着美国霸权

① 加权总度占比=（核心国家加权度÷全部国家加权总度）×100%，其中加权依据为国家间的贸易额。粮食净进口国界定为节点加权入度大于加权出度，即粮食进口贸易规模高于出口规模；粮食净出口国界定为节点加权出度大于加权入度，即粮食出口贸易规模高于进口规模。

的衰退愈加明显，未来以美国为中心的各项世界秩序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其中也包括国际粮食体系。[①]印度、巴西、俄罗斯、乌克兰等新兴势力的崛起不仅重塑了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力量对比，也推动全球粮食贸易体系向多极化的方向演进。

中国与俄罗斯都经历了从“区域参与边缘”到“全球关键核心”的演变，但是双方在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功能与角色定位有显著不同。从有向加权网络的流向来看，中国加权入度显著高于加权出度，属于需求端重要节点；俄罗斯加权出度远高于加权入度，为供给端重要节点。两国在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定位和功能存在高度的互补性，验证了 H3 成立，也为后续探讨双边粮食安全合作奠定了基础。

（三）社团演变

为进一步识别网络中联系紧密的国家集群，揭示功能性区域的具体构成，借助社团检测将分散的贸易关系转化为可量化的聚类结构。社团检测基于模块度优化算法，划分区域性贸易集团，分析贸易网络中小团体的分化情况，具体结果由 Louvain 算法计算所得。在实际网络划分中，当 Q 值在 0.3~0.7 之间时，说明划分效果较好。[②]选取 2000 年和 2024 年数据进行社团分析，能更直观地看出变化。两个年份的 Q 值均处于 0.3~0.7 适配区间，说明网络存在清晰且稳定的社团聚类结构。

2000 年美国主导的社团 1 包含 38 个国家，占全部样本国家总量的 23.6%，归属这一社团的还有：日本、埃及、菲律宾、委内瑞拉等国，涵盖了中美洲、加勒比地区、东亚、中东、非洲国家。这一时期日本、埃及、菲律宾等国大量从美国进口小麦和玉米，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大洲贸易圈。社团 2 占比 21.74%，由中国、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主导，中国与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亚洲国家贸易联系密切，澳大利亚则与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贸易联系密切。社团 3 占比 18.01%，以欧洲国家为主，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德国等国，同时连接部分非洲南部（南非、博茨瓦纳等）、

① 许准：“粮仓或是粮荒——走出两百年来的国际粮食体系”，《读书》，2022 年第 6 期，第 53-60 页。

② 刘清、杨永春、蒋小荣等：“手机全球贸易网络演化及供需匹配关系——基于复杂网络的社团分析”，《经济地理》，2021 年第 3 期，第 113-125 页。

南美（阿根廷、秘鲁等）国家。社团 4 占比 14.91%，由法国和巴西主导，分散于拉美、西欧、北非和中东。社团 5 占比 13.04%，由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国主导，包括：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乌克兰等国，高度集中于东欧地区和后苏联空间国家。社团 6 占比 8.7%，主要包括南亚（印度、巴基斯坦等）和中东（沙特、阿联酋、卡特尔等）国家。

相较于 2000 年，2024 年国家间贸易联系增多，网络更加密集，社团结构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2024 年社团 1 以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波兰等欧洲国家为主，占全部样本国家总量的 30.34%。社团 2 占比 20.69%，主要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埃及、西班牙、墨西哥等国，黑海贸易圈的影响力进一步增长。社团 3 占比 16.55%，主要包括美国、日本、哥伦比亚、加拿大等国，连接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国家。社团 4 占比 12.41%，主要包括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新西兰、科特迪瓦、塞内加尔等国，RCEP 成员国高度集中于此社团，还连接了部分非洲国家。社团 5 占比 11.72%，以印度、阿根廷、沙特、也门、卡塔尔等国为主。社团 6 占比 8.28%，主要包括：巴西、中国、韩国、智利等国，相较之前，中国从参与美国主导的社团转向巴西主导的社团，与南美国家贸易联系密切。

社团分析的结论补充验证了 H2，明确展示出区域性贸易集群的构成。结果为粮食贸易网络的集群划分并非单纯由地理空间的邻近性决定，而是基于国家间粮食贸易量的实际紧密程度。在实践层面，全球粮食贸易的区域化进程表现为：贸易伙伴组合从“零散分布”向“地缘集聚”演变，各国倾向于与贸易伙伴、经济互补国和制度框架内成员建立更加稳定的粮食贸易关系。

（四）全球粮食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通过 SNA 完成假设验证后，可以得出全球粮食贸易格局的三个新变化。这些变化会传导至中俄两国粮食安全的外部环境，进而深刻影响双方粮食安全合作的生成逻辑与发展空间。

第一，新兴势力崛起，竞争加剧。到 2024 年，俄罗斯、乌克兰、巴西等国已经稳定在核心国家圈层，也表现出全球粮食供给端从北美向黑海、南美等地扩展。实际上，真正驱动全球粮食贸易的“执棋者”是大型跨国企业，在各国贸易关系的表层之下，背后都离不开跨国粮商在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

布局与博弈。传统的国际四大粮商即美国的 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的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简称“ABCD”，是美西方主导地位的显著体现。四大粮商的核心运作模式可以概括为：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和运营金融化。[①]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搭建起集种植、生产加工、仓储物流以及销售为一体的巨大网络，其垄断地位与美欧等传统核心出口国的贸易网络高度绑定。随着俄罗斯、乌克兰、巴西、印度等新兴出口核心崛起，以及中国、埃及、墨西哥等新兴进口核心的需求多元化，以中粮集团、丰益国际、嘉能可、日本全农、奥兰集团等为代表的新兴粮商积极扩展业务，利用各自的优势，开始与“ABCD”争夺市场份额。

第二，区域一体化趋势显著增强。2000 年前后，全球粮食贸易仍带有一定的全球化分散特征。全球粮食贸易呈现出跨区域、多向化的分散格局，尚未形成边界清晰、内部高度集聚的稳定区域板块，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2000—2024 年，网络中的平均聚类系数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说明区域集群化特征日益显现。社团结构的演变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到 2024 年，欧洲国家基本聚集在一个社团，法国和德国也同处在一个社团。东南亚、黑海贸易圈、北美和南美则一直较为稳定，始终保持着内部集聚的特征。中美洲-加勒比地区长期依附于美国，变动较小。非洲、南亚-中东国家则频繁在不同大洲的社团间切换，是全球粮食贸易中大国博弈的焦点。

第三，粮食安全与贸易保护主义强化。全球性重大事件加速了全球粮食贸易格局的重构。粮食安全逐渐从经济议题转为安全议题，地缘竞合对全球粮食贸易格局的影响愈发显著。最显著的变化是，2020 年中美还共处同一社团，但是 2024 年中国已经退出了美国主导的社团，而与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构建独立的“中国-南美圈”。这种分化正是中美战略竞争向粮食贸易领域延伸的结果。2024 年俄罗斯与乌克兰仍共同主导黑海板块，证实了，即便冲突持续，双方与区域内国家的贸易网络仍紧密相连，短期内无法完全切割。

① 张秀青：“国际四大粮商运作模式研究”，《国际经济合作》，2014 年第 9 期，第 40-44 页。

2022 年的俄乌冲突再次引发全球粮食保护主义浪潮。联合国粮农组织搭建的粮食及农业政策决策分析（FAPDA）数据库，专门针对俄乌冲突做出了特殊筛选标签，数据显示，自俄乌冲突以来，针对谷物及其制品的政策决策有 128 条，大部分涉及小麦、大麦、玉米、稻谷等品类。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埃及、土耳其、白俄罗斯、阿联酋、印度等国都实施过出口禁令。粮食保护主义在全球蔓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地缘风险和极端自然灾害等，是诱发粮食保护主义全球蔓延的直接原因；第二，从深层次原因来看，粮食保护主义全球蔓延是逆全球化思潮的新表现。[①]实际上，区块化格局和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而是一种新的变革，即从过去的“单极全球化”，转向由多重力量共同塑造的“多极竞合全球化”。

三、核心因素影响下中俄粮食安全合作的逻辑

上述全球粮食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可以归结为三个影响中俄粮食安全合作的核心因素：权力结构多极化、空间结构区域化和规则结构政治化。对中俄两国而言，这些核心因素深刻塑造了各自的粮食安全处境，并由此催生了双方合作的基础。

在分析三大核心因素如何具体影响中俄两国粮食安全处境之前，有必要厘清一个基础性问题：中俄两国对“粮食安全”这一概念的理解与核心诉求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根植于两国不同的资源禀赋、历史经验与战略定位，深刻影响着各自的政策取向与安全逻辑，也是理解两国在格局演变中应对差异化影响、形成互补性合作的前提。

（一）中俄两国粮食安全内涵与核心诉求差异

中国是新兴市场国家，同时也是世界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2020 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粮食进口国，粮食出口则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这种“强进口、弱出口”的表现，反映出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是以自给自足为核心，并适度增加进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和《中国的粮食安

① 参见林发勤：“粮食保护主义全球蔓延的影响及应对”，《人民论坛》，2023 年第 10 期，第 93–97 页。

全》白皮书，我国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第一章第四条作出明确部署，统筹利用国内、国际市场与资源，加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发挥粮食国际贸易作用，构建科学合理、安全高效的粮食供给保障体系。[①]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目的在于服务国内供需结构的平衡，核心诉求是能否获得稳定的粮食供应，能否借助国际粮食贸易来补充国内需求。

俄罗斯与中国恰好相反，凭借其强大的粮食生产和出口能力，成为网络中的“核心供应国”，几乎不依赖国际市场补充供给。2020 年俄总统批准的《俄罗斯联邦粮食安全学说》官方文本，对“粮食安全”的定义是：粮食安全是俄罗斯联邦经济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保障粮食独立，并确保每个公民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符合法定技术法规要求的食品，其数量不少于为积极健康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合理消费标准。[②]该文本取代了 2010 年《俄罗斯联邦粮食安全学说》，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经济和物质的可获得性，兼顾合理的营养结构和饮食传统。2025 年 3 月 10 日第 141 号总统令对 2020 年《俄罗斯联邦粮食安全学说》进行修订，增补的全新章节“V1.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与主要任务”，标志着俄罗斯将粮食安全战略目标扩展至“维持世界市场稳定”，“粮食外交”的工具属性增强。俄罗斯同样强调自给自足，但其政策重心更侧重于将粮食出口视为国家实力的体现和地缘战略的工具。除了满足国内需求外，粮食更是参与全球地缘竞合的重要资源，其核心诉求是能否持续将粮食出口至国际市场，获得稳定的外汇收入，实现本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并对冲制裁带来的约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俄罗斯官方所表述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大概念，也可以翻译为“食物安全”，其中谷物排在评估指标的第一位，国内自给率不少于 95%。与之相类似，我国当前政策层面也提出树立大食物观，突破传统粮食安全的边界，从传统“粮食”到更广义的“大食物”，强调肉蛋奶、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中国政府网，2023 年 12 月 30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23387.htm

②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1.01.2020 г. № 20. 21 января 2020 г. http://government.ru/docs/all/125815

果蔬、水产品等多元供给。为使研究更加聚焦，分析更具可操作性，本文选取狭义的粮食安全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聚焦于“谷物安全”。考虑到我国大豆高度依赖进口，也将其纳入粮食安全范畴。

（二）核心因素对中俄粮食安全的差异化作用

中俄两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所处的定位和角色不同，对粮食安全的理解和诉求也存在差异。因此，全球粮食贸易权力结构多极化、空间结构区域化和规则结构政治化也差异化地作用于中俄两国粮食安全处境。

1. 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在中国粮食安全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全球粮食贸易权力结构从“单极主导”向“多极并立”的转型，有效拓宽了我国粮食进口的来源渠道。俄罗斯、巴西、乌克兰等新兴产粮国产能持续提升，逐步成为全球粮食贸易的重要供给国，降低了对单一国家或区域的依赖风险。以大豆进口为例，2000 年我国大豆进口总额约 22 亿美元，集中于美国、阿根廷和巴西，三者合计占进口总量的比重超 99%，加拿大及其他国家供给占比不足 1%，进口供给结构单一。到 2024 年，我国大豆进口规模扩张至 527 亿美元，新增长的市场空间大部分被巴西占据。2024 年自巴西进口大豆约 364.6 亿美元，较 2000 年（约 4.66 亿美元）增长了约 78 倍。同时，乌拉圭（约 10.36 亿美元）、加拿大（约 6.42 亿美元）和俄罗斯（约 3.04 亿美元）等多元化补充进口来源，长期来看，具备一定的大豆供应潜力。

全球粮食贸易权力结构多极化，不仅体现在产粮国、进口国供需格局的重构，也深刻反映了其背后长期由少数跨国粮商主导的权力格局的重构。长期以来，全球粮食贸易流通与定价体系长期被国际大型粮商主导，形成高度集中的市场格局。“ABCD”四大粮商垄断了全球 70%以上的粮食贸易，在全球粮食贸易中起主导作用，掌控全球粮食贸易的定价权。根据《2025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2024 年全球有 6.38 亿至 7.2 亿人面临饥饿问题，分别占全球人口的 7.8%至 8.8%，但是四大跨国粮商自 2019 年以来营收却获得了较为显著的增长。

近年来，以新加坡丰益国际（Wilmar International）、中国中粮国际（COFCO Corporation）、新加坡奥兰集团（Olam International）等为代表的

新兴跨国粮商正在崛起。以中粮集团为例，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集团整体营业收入分别达 6921 亿元和 6350 亿元，其在全球 36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有子公司及办事机构。主要贸易品类包括谷物、油籽、糖、棉花等，业务遍及六大洲，资产分布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年农粮经营规模 1.8 亿吨。虽然起步比较晚，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在世界粮食供应体系中已经表现出较大的影响力。

表 4　2019—2024 年四大粮商营收统计（单位：亿美元）

年份	美国 ADM	邦吉	嘉吉	路易·达孚
2019 年	643.41	457.43	1135	405.71
2020 年	646.56	411.4	1146	337.86
2021 年	643.55	414.04	1344	335.64
2022 年	852.49	591.52	1650	495.69
2023 年	1015.56	672.32	1770	599.31
2024 年	939.35	595.4	1600	506.2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公司财报及数据整理、制作。

尽管全球粮食贸易市场的多极化趋势明显和新兴势力逐步崛起，但传统跨国粮商构筑的全球粮食霸权体系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①]国际四大粮商在进行农业社会化服务中控制的重点不再是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而是注重操控数字化信息、技术资源以及与农民的契约关系，实现了对粮食和农业供应链系统的可持续控制。[②]短期内，我国粮企尚无法打破传统粮商的垄断地位，正处于加速追赶阶段。新兴跨国粮商在崛起过程中普遍采取与国家战略深度协同的区域差异化发展路径。我国粮企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与

① 焦玉平、郑执浩：“粮食‘霸权’：跨国粮商塑造下的不平等全球粮食体系”，《国外理论动态》，2025 年第 4 期，第 129-138 页。
② 邓少华、王哲等：“从产品控制到服务控制：数字化视角下国际四大粮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做法、经验与启示”，《世界农业》，2024 年第 8 期，第 53-65 页。

区域合作红利，正迎来近邻化粮源布局、全链条运营拓展与新兴市场突破的重要机遇。中粮国际拥有成熟的大宗农产品经营模式和较强的贸易、资产管理能力，资产布局深入南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等产区。除中粮国际外，我国中储粮、北大荒集团、爱菊粮油工业集团等粮食企业也纷纷抓住机遇，主动“走出去”开展海外布局，成为我国粮企参与全球粮食竞争、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补充力量。

其次，全球粮食贸易空间结构区域化、区域合作与多边机制的深化，为我国参与塑造更公平合理的国际粮食贸易秩序提供了重要契机。一方面，WTO《农业协定》等多边规则框架长期陷入僵局，对粮食出口限制、农业补贴、粮食公共储备等方面缺乏有效限制，并且无法约束非 WTO 成员方。另一方面，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粮食安全国际领导力陷入混沌局面。[①]以美国为核心的粮食体制，本质上是为其粮食霸权服务，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粮食市场的过程中逐步丧失粮食主动权。在此背景下，我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既是维护自身粮食安全的需要，也可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注入新的稳定力量。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倒逼不同地区、国家间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区域内成员间粮食贸易增长。[②]我国依托“一带一路”、金砖、RCEP 等国际平台，正在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务实的贸易新秩序。2022 年 11 月，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共同签署《中国-东盟粮食安全合作联合声明》，明确围绕粮食供给、获取、利用、稳定性四大支柱，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粮食安全合作。[③]此外，根据 RCEP 规定，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程度已提升至 90%以上，6 小时快速通关机制、简化检验检疫程序等贸易便利化措施，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提高通关效率。[④]近年来，全球粮食贸易

① 参见于宏源、李坤海：“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参与”，《国际政治研究》，2021 年第 6 期，第 83-103 页。

② 魏艳骄、郁淮娣、朱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域经济合作与全球粮食贸易增长”，《世界农业》，2024 年第 10 期，第 43-55 页。

③ 《中国-东盟粮食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2 年 11 月 11 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211/t20221111_10972995.shtml

④ 严瑜：“东盟‘鲜品’丰富中国餐桌”，《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 年 4 月 23 日第 8 版。

规则也在结算、定价、金融等领域不断优化，粮食贸易去美元化趋势显著，以本币结算为代表的新型结算方式被广泛使用。从区域经贸合作的制度创新，到粮食贸易结算体系的探索，诸多实践表明，全球粮食贸易正在向更加包容、公平、安全的新治理格局转型，给我国带来了提升粮食安全治理能力的重要契机。

最后，全球粮食贸易规则的地缘政治化，使我国粮食安全的外部环境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粮食贸易与政治深度绑定干扰了全球粮食自由流动的秩序。地缘冲突加剧导致的粮食武器化、粮食价格波动、海外投资政策变动等风险，进一步放大了我国粮食安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地缘冲突引发的连锁反应，导致国际粮食价格呈现大幅波动、高位运行的态势，实际上反映了全球粮食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在短期内，2022 年俄乌冲突直接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随后传导至化肥和能源市场，间接推高粮食价格。[①]这次地缘冲突冲击了中国粮食进口的正常运行，由地缘冲突所诱发的“蝴蝶效应”需要我国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以应对全球粮食市场供不应求以及粮价飙升。[②]俄罗斯还是全球重要的化肥生产和出口大国。缺少足量的化肥会导致粮食产量下降，进而引发粮食短缺和因供需不平衡而导致的粮食价格上涨。此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下文简称“FAO”）在 2026 年 3 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波斯湾是全球氮肥的主要出口区，占全球尿素出口的 30%~35%和氨出口的 20%~30%。约 30%的国际化肥贸易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2026 年 2 月 28 日美以伊冲突升级导致海运严重中断，每月约有 300 万吨~400 万吨化肥无法运出。化肥战略储备缺乏国际协调，很难应对供应中断。该报告估计，若危机持续，2026 年上半年全球化肥价格可能比正常水平高出 15%~20%。[③]化肥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将显著推高全球和我国的农资价格，并对未来一段时期的农产品生产产生影响。

从现实表征来看，当前全球地缘危机诱导粮食网络中的供给端生产减量、

① 蒋家敏、魏梦升：“地缘冲突下全球粮食危机的传导效应与中国因应之策”，《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4 期，第 35-44 页。
② 参见赵岚、李巍：“俄乌冲突的‘蝴蝶效应’与中国粮食安全的地缘风险”，《太平洋学报》，2023 年第 3 期，第 29-41 页。
③ “Global Agrifood Implications of the 2026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FAO*, March 19, 2026, https://openknowledge.fao.org/items/67a1fe95-98f2-4f23-8be7-99491bfd8343

粮食流通渠道减少以及主要口粮的价格上涨，从而加剧了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与地区的粮食不安全和饥饿现象，形成全球性的粮食安全危机。粮食网络结构中的核心国家与地区内粮食网络结构中的次核心国家的粮食武器化行为，则引发恐慌情绪并产生连锁反应，即便没有出现地缘政治冲突的国家也在逐步加紧粮食武器化进程，形成了全球范围内若隐若现的粮食武器化浪潮。[①]我国虽是国际上主要的粮食进口国，但是国际粮食市场却是卖方市场。目前，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处于粮食产业链的终端需求侧，位于粮食价值链的中下游。从深层次来看，粮食武器化的倾向破坏了国际社会建立的基于互信和互利的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框架。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处境使粮食安全的风险传导范围被进一步放大。

2. 对俄罗斯粮食安全的影响。俄罗斯在全球粮食贸易格局中扮演的是“新兴出口大国”的角色。因此，全球粮食贸易格局演变同样给俄罗斯带来了差异化的机遇与挑战。

第一，全球粮食贸易权力结构多极化显著改善了俄罗斯粮食出口处境。传统欧美粮食出口大国影响力持续衰退，西方对全球谷物出口市场的垄断能力下降，俄罗斯作为新兴谷物出口国，逐步摆脱对单一区域的依赖。2000 年，俄罗斯粮食出口集中在高加索地区、东欧和中东地区，其中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占比超 70%。到 2020 年，有 81 个国家与俄罗斯进行粮食贸易，网络中将近一半的国家从俄罗斯进口粮食。俄罗斯重点推进“转向东方”战略，形成了亚洲、中东、北非三大新兴市场，同时巩固独联体国家传统市场，构建起粮食出口的多元化布局。市场多元化降低了欧美制裁、地缘竞争对俄罗斯粮食出口的冲击。

作为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俄罗斯粮价上涨带来了出口收入增长的短期红利。从图 3 的走势可以清晰地观察到，2020 年下半年到 2022 年上半年，全球谷物价格指数快速攀升至每吨 170 美元以上，达到历史高位。全球粮价上涨为俄罗斯提供了短期收益红利，但俄罗斯粮食出口的持续增长更依赖于其粮食生产能力的扩张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当价格红利消退时，出口量的扩

① 参见肖晞、张一帆：“粮食武器化的演进历程、作用机制与应对路径”，《学术论坛》，2025 年第 1 期，第 110–124 页。

张是其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全球粮价上涨在推动俄罗斯谷物出口收益增长的同时，也潜在推高了农业生产成本。俄罗斯农业企业普遍认为，2025 年生产总成本同比上升约 10%~20%，种子、化肥、农药、能源、土地租金及劳动力成本均出现明显增长。[①]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直接压缩了农户的利润空间，导致部分中小农场陷入亏损甚至破产，使谷物生产的整体盈利能力显著下降。长期来看，俄罗斯粮食生产体系在面对全球市场波动时，缺乏足够的灵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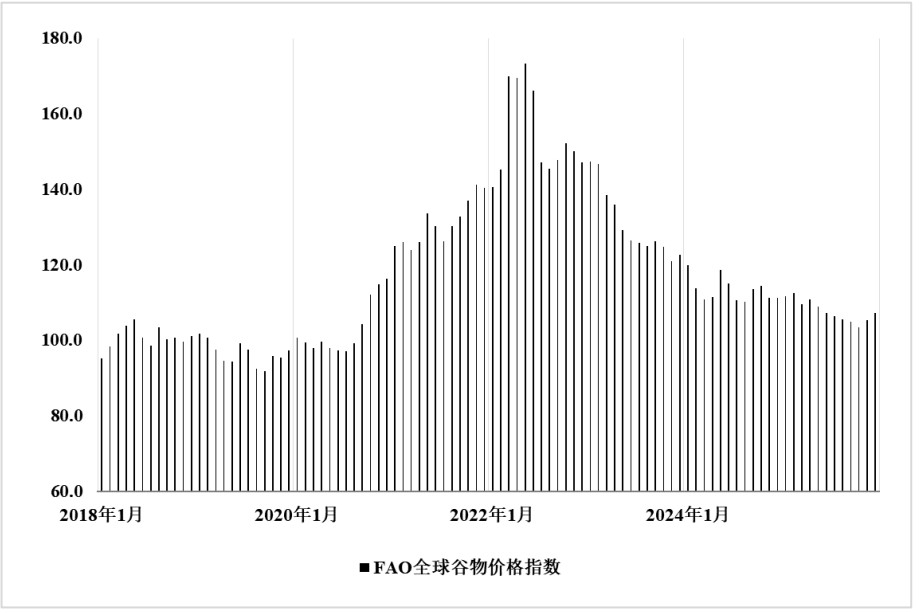


图 3　FAO 全球谷物价格指数（2018 年 1 月—2025 年 12 月）[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FAO 数据绘制。

在粮食出口市场扩大和收入增加的同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老牌粮食出口国在传统粮食市场持续占有较大份额，俄罗斯出口高度依赖小麦，才能保有一定份额。而非洲、东南亚、南亚等地区是粮食进口需

① Белая А. Что мешает аграриям и экспортерам зарабатывать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зерне. 9 января 2026 г. https://www.forbes.ru/biznes/552735-cto-mesaet-agrariam-i-eksporteram-zarabatyvat-na-rossijskom-zerne?ysclid=mn79wbbkva887716755

② FAO 全球谷物价格指数以 2014—2016 年平均出口贸易份额为权重，综合小麦、玉米、大麦、高粱及稻谷价格编制而成。

求增长较快的区域，新老粮食出口国面临激烈的竞争。此外，巴西、乌克兰等国具备玉米出口的优势，而俄罗斯出口品类高度依赖小麦，玉米出口则缺乏竞争力，制约了其在全球粮食贸易中的多元化布局。

第二，全球粮食贸易空间结构的区域化，使俄罗斯粮食出口更加自主可控和多元稳定。俄罗斯国土面积辽阔，与多个邻国陆地接壤，具有天然的跨境运输优势。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进程中，主导区域内国家不断加强地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取得一定成效。[①]普京在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会议上指出，联盟五国生产的农产品和食品已足以充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且欧亚经济联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方之一。[②]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各成员国积极寻求在联盟内部建立集体粮食安全保障体系。通过完善粮食安全领域的制度建设、改造跨境物流网络、推进农业技术进口替代，进一步开发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潜力，建立更密切的贸易关系。

第三，全球粮食贸易规则政治化对俄罗斯粮食安全处境产生了双重影响。当前，粮食日益成为大国间地缘竞合的工具，制裁、贸易壁垒、规则约束等行为对俄罗斯粮食贸易形成短期冲击。西方企业相继退出，给俄罗斯粮食生产带来成本大幅上升的问题，马铃薯、甜菜等作物的种子供给中断进一步加剧了产能短板。此外，俄罗斯粮食出口也受到西方制裁带来的汇率波动、物流与保险障碍等因素的影响，推高了实际交易成本。但外部危机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俄罗斯粮食安全的基础，反而在多重倒逼机制下，推动俄罗斯粮食安全体系表现出一系列积极变化。俄罗斯加速农业进口替代进程，在本土种业、农机制造、化肥生产等关键领域的研发投入持续增加，有效提升了农业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制裁对俄罗斯农业部门经济的积极影响包括：化肥产量增加，粮食产量创纪录，本土农业机械数量增加，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率提高。[③]同时，俄罗斯正处于农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对于俄罗斯来

① 蒋菁、张家星：“欧亚经济联盟粮食安全保障：区域实践与全球影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5 年第 5 期，第 141-160 页。

② Заседание Высшего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27 мая 2022 г.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8494

③ Немытых С. Л., Баскакова И. В. Эффекты санкционного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на аграрный сектор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е регионы в фокусе перемен: сборник докладов XVII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Ажур». 2023. С.798-803.

说，实现自给自足和加速数字化转型是必选项。数字化正在成为俄罗斯应对制裁、保障粮食安全的多功能工具。①

规则政治化的外部压力倒逼俄罗斯加速粮食贸易体系自主化、多元化转型。俄罗斯正在加速推进卢布结算体系建设，降低对西方支付系统的依赖。俄罗斯央行数据显示，2025 年俄罗斯企业在对外贸易合同结算中，卢布和友好国家本币在结算中的占比保持增长趋势，其中卢布占比超 53%，友好国家货币占比超 30%，而美元和欧元等不友好国家货币的占比降至 15%以下。②俄罗斯不断推进外贸结算“去西方货币化”，结算体系达到充分多元化，对外经济活动主体的风险显著降低。

（三）核心影响因素驱动下中俄粮食安全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中俄粮食安全合作，正是在全球食物体制处于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两个结构性互补的新兴大国，为应对外部压力、寻求粮食供应自主可控而作出的选择。

1. 供需互补，为中俄合作奠定了市场基础。俄罗斯拥有广袤耕地与富余粮食产能，急需开拓稳定的大规模海外消费市场，依靠粮食出口换取外汇收入；而我国人口规模庞大，居民饮食结构升级，大豆、饲料粮等品类需借助国际市场的补充。为此，亟须通过推动进口渠道多元化，寻找安全可靠的供应源。

从表 5 可以看出，中国与俄罗斯在部分粮食品种上存在显著的供需互补关系。在小麦品类方面，俄罗斯具备富余的出口产能，可作为我国小麦进口多元化供给体系中的潜在补充来源。大麦和燕麦属于有限互补品种，俄罗斯可满足部分的进口需求。此外，中国有巨大的大豆进口需求，但俄方供应占比不足 0.7%。俄罗斯的大豆供应潜力与中国的需求规模相差较大，短期内难以形成有效互补。但俄罗斯已经依托其远东地区的耕地开发与中俄农业技术合作，持续扩大大豆种植面积，提升单产水平与出口能力，有望在未来成为我国大豆进口多元化布局中的备选来源。

① Лясников Н. В., Анищенко А. Н., Романова Ю. А. Угрозы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нового витка санкционной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2023. №3. С.393-408.

② Итоги работы Банка России 2025: коротко о главном. 20 марта 2026 г. https://cbr.ru/about_br/publ/results_work/2025/razvitie-sistemy-platezhey-i-raschetov

表 5　2024 年中国与俄罗斯粮食进出口额（单位：亿美元）

品种	中国 进口总额	俄罗斯 出口总额	中俄 贸易额	供需匹配度
小麦	34.81	103.55	0.87	俄罗斯供应能力远超中国需求
黑麦	0	0.19	无	中国无进口需求
大麦	37.93	11.08	1.77	俄罗斯供应能力不足
燕麦	1.5	0.54	0.51	俄罗斯供应能力不足
玉米	37.58	4.92	0.36	俄罗斯供应能力严重不足
稻谷	9.2	0.11	无	俄罗斯供应能力严重不足
高粱	25.92	0.01	无	俄罗斯供应能力严重不足
荞麦及其他谷物	0.89	1.06	0.76	俄罗斯供应能力可满足中国需求
大豆	527.26	3.57	3.04	俄罗斯供应能力严重不足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数据整理得出。

2. 区域化浪潮下，中俄粮食安全合作有望提质升级。全球粮食贸易呈现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推进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尝试，“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中国拓展陆路经贸通道、构建多元化跨境供应链的开放型合作平台。“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有利于实现欧亚大陆的战略稳定。①

当前，欧亚经济联盟利用一体化机制积极推动内外合作，但在西方制裁

① 李冠群：“‘一带一路’对接欧亚经济联盟的三重路径分析”，《江南论坛》，2023 年第 12 期，第 15-20 页。

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难度加大。欧亚经济联盟将合作重点从西方转向发展中国家，计划与包括中国、东盟和南美等发展中国家及国际一体化组织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不断走深，中俄地缘邻近的区位优势日益显现。一方面，跨境口岸、铁路、粮食仓储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有效降低了双边粮食贸易对海运通道的依赖；另一方面，区域经贸规则协同持续推进，双边海关合作、检疫准入协商不断取得进展，制度性贸易成本稳步下降，为长期大宗粮食贸易与跨境产业合作扫清障碍。在此背景下，中俄粮食安全合作得以突破单纯粮食进出口贸易的约束，逐步向境外粮食种植、粮食深加工、全产业链协同扩展，为打造稳定的区域粮食供应链创造了有利条件。

跨境支付体系对接是“一带一盟”金融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依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中俄实现了粮食贸易资金的高效跨境流转，结算效率大幅提升。俄罗斯联邦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Александр Новак）在接受采访时提及，中俄双边贸易几乎 99%都是用本币结算的。[②]2025 年 5 月，黑河市爱辉区通过“边互通”数字贸易平台完成首单对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一批从俄罗斯进口的大豆经黑河公路口岸通关，边民通过手机 APP 向俄方商家下单采购，由哈尔滨银行完成跨境人民币支付，实现了爱辉边民首次以人民币跨境支付货款、系统自动开具税务发票等全流程电子化操作。[③]双方合作升级有力地推动了中俄两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与共同发展。

3. 外部风险加剧，不确定因素增多。首先，新兴势力崛起，中俄粮食贸易面临第三方市场的激烈竞争。2025—2026 年度，全球小麦市场呈现供给充裕局面，俄罗斯、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主要出口国和地区均实现丰产。[④]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在中国进口粮食格局中的边缘化风险进

① 蒋菁：“西方制裁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影响：发展趋势与‘一带一盟’对接”，《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142-156 页。

② Новак: доля расчетов Москвы и Пекина в нацвалютах достигла 99%. 3 ноября 2025 г. https://tass.ru/eko nomika/25527321

③ 爱辉区人民政府：“爱辉区：‘边互通’首单成功办理”，2025 年 6 月 4 日，https://www.aihui.gov.cn/ahq/c100747/202506/c11_33 0998.shtml

④ Белая А. Что мешает аграриям и экспортерам зарабатывать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зерне. 9 января 2026 г. https://www.forbes.ru/biznes/552735-cto-mesaet-agrariam-i-eksporteram-zarabatyvat-na-rossijskom-zerne?ysclid=mn79wbbkva887716755

一步加大，其原因在于俄罗斯粮食主产区多位于欧洲部分与西西伯利亚南部，而面向中国的远东及外贝加尔地区铁路、公路、仓储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运输线路长，冬季气候恶劣，导致粮食运输周期长、成本高。

其次，随着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各国普遍强化出口管制、配额限制和国内储备政策。俄罗斯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作为粮食出口大国，常用出口配额、浮动关税、地区差异化配额、转基因禁令、品种准入限制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维护本国粮食安全。例如，2025 年上半年的配额中，大麦、黑麦和玉米的出口配额直接设为零。[①]外国投资者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合规风险。真正隐藏在水面下的，是涉及严格的法律主权、关税配额、动植物检疫以及文化差异等综合性的挑战。普通投资者极容易陷入资金链断裂、农产品无法回流等陷阱之中。

最后，西方持续制裁的外溢效应给中俄粮食安全合作带来不确定的外部挑战。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俄办公室主任奥列格·科比阿科夫明确指出，尽管俄罗斯食物从未被直接制裁，但船舶租用和保险壁垒、港口挂靠和加油禁令以及金融交易困难，实质上产生了与制裁相当的效果。虽然俄罗斯凭借自身的资源和技术能力能够进口替代几乎所有产品，但存在成本和效率问题。[②]实际上，次级制裁最终会对中俄粮食安全合作带来成本和风险问题。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制裁的外溢效应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多数中小企业缺乏风险对冲能力，导致其难以进入双边粮食合作体系。

四、新变化下中俄粮食安全合作的实施路径

国家间进行粮食安全合作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安全水平，应对风险冲击与扩大影响力。合作并非意味着放弃自给率，而是为了更可靠、更高效、更具战略弹性地实现并维持各自的粮食安全目标。这是一种在“自主”前提下、

① Квота на экспорт пшеницы из РФ с 15 февраля по 30 июня 2025 года составит 10,6 млн т. 20 декабря 2024 г. https://www.in terfax.ru/business/999756

② Tatyana Karabut, “Food insecurity: Oleg Kobiakov, Head of the FAO Russian Office, speaks about the ‘Grain Deal’, the fight against hunger, and Russian bananas”, *FAO*, April 21, 2025, https://www.fao.org/russian-federation/news/news-detail/food-insecurity--oleg-kobiakov--head-of-the-fao-russian-office--speaks-about-the--grain-deal---the-fight-against-hunger--and-russian-bananas

追求更高水平的安全与稳定。粮食安全合作的出发点是各国资源禀赋差异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通过政府间主导与对接，在粮食生产、储备、贸易、物流及技术等环节上进行战略协作。

大豆是中俄粮食安全合作较为典型的品类之一，也是两国拓展粮食安全合作的重要尝试，能够为新阶段双方粮食安全合作提供现实参考。2024 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谷物和大豆总额为 7.33 亿美元，同期中国粮食进口总额为 675.13 亿美元，自俄罗斯进口占比约为 1.09%。尽管现阶段中俄粮食贸易合作的规模不大，但是推进速度较快，合作潜力巨大。此外，我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准入的范围不断扩大。2023 年 12 月，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关于俄罗斯联邦玉米、水稻、大豆和油菜籽输华植物检疫要求议定书补充条款》，我国取消了俄罗斯玉米、水稻、大豆和油菜籽输华的地区限制，俄罗斯全境产区获得对华出口资质。目前，俄罗斯获准对华出口的谷物产品清单已包含 24 个品种，双方正进一步推动 20 种新谷物产品的准入谈判。①

双方合作在贸易规模稳步扩大的同时，不断向农业投资、土地开发、仓储物流建设、粮食加工转化等环节拓展。以大豆为例，近些年中俄大豆领域的纵深合作获得了较快发展。2019 年 6 月，中俄签署《关于深化中俄大豆合作的发展规划》，就扩大大豆贸易及深化种植、加工、物流、销售、科研等全产业链合作达成重要共识。②2020 年，黑河市共有 20 多家对俄大豆产业合作企业，在俄开发土地面积 185.424 万亩，年实际种植面积 169.9 万亩，其中大豆种植面积达 152.65 万亩，占在俄开发土地面积的 82.4%。③2023 年 8 月，俄罗斯友谊集团启动在阿穆尔州建设一座大型大豆深加工厂项目，预计 2026 年投产。该项目投资超 142 亿卢布，建成后预计每年加工 100 万吨大豆。同时计划从中国采购最先进的油籽原料加工设备，将实现全自动化。

① Россельхознадзором открыты поставки пшеничных отрубей и маша в Китай. 3 ноября 2025 г. https://fsvps.gov.ru/news/rosselhoznadzorom-otkryty-postavki-pshenichnyh-otrubej-i-masha-v-kitaj/?ysclid=mqurltbjs6703334211

② 荣翌：“中俄大豆合作前景广阔”，2022 年 6 月 18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253741.html

③ 魏然、杨树果：“黑河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展大豆产业合作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南方农机》，2022 年第 10 期，第 38-40 页。

产品将在俄罗斯销售，并出口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①]

展望未来，中俄粮食安全合作潜力巨大。一方面，俄罗斯现有农业用地中，约有 1940 万公顷耕地未被使用。俄罗斯庞大的耕地资源与增产潜力，为两国粮食安全合作提供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另一方面，俄罗斯对我国粮食消费市场的依赖性有所提升，有望进一步深化合作。但传统的进出口贸易合作已经难以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在尊重各自粮食安全诉求的基础上，互利共赢是中俄粮食安全合作的共识。在全球粮食贸易格局演变的背景下，进一步深化中俄粮食安全合作的实施路径为：

第一，在确保检疫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扩大粮食贸易品种，推动进口品种结构优化。保障粮食质量安全是双方深入合作的重要前提，因此，须通过细化检验检疫规则，确保“标准对接，流程透明”。在此基础上，着力加大饲料粮领域的合作力度。由于我国国内居民肉蛋奶消费持续增长，畜牧业规模稳步扩张，进而带动玉米、大麦等饲料粮需求持续攀升。国内玉米供给总体有保障，进口主要根据国内供需形势进行弹性调节，以满足饲料加工需求。应重点推动大麦、玉米、大豆及其副产品等饲料粮的进口，为国内养殖业提供稳定、可控的饲料粮源，拓宽饲料粮进口来源的多元化布局。

第二，深化粮食全产业链合作，以科技创新驱动合作高质量发展。当前，中俄粮食安全合作的领域已经从货物贸易端向生产端延伸。2024 年，安徽长丰县红桥村率先在俄罗斯试种 2000 亩小麦并实现盈利，随后联合多个村集体与农业企业共同出资成立跨境农业公司，在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州落地 1.5 万亩豌豆规模化种植基地。不仅完成了境外土地开发、规模化田间生产，还联动省内粮食国企打通了农产品检疫、通关、国内分销的完整回运链条。这种境外种植合作模式既有助于实现国内乡村振兴，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还能丰富进口来源。应进一步鼓励各类型参与主体“走出去”，推广成熟的合作模式，构建自主可控的境外粮食供应渠道。在数字经济时代全面到来的背景下，中俄粮食安全合作同样需要顺应科技变革趋势，以农业科技创新为两国粮食安全注入新动能。进一步推动数字农业、智慧农机等科技成果的示范

① Второй завод по переработке сои построят в Белогорске. 30 августа 2023 г. https://prim.rbc.ru/prim/freenews/64ee76de9a7947562cbee3a6?ysclid=mnl6fu5b7h654738376

应用，推动合作从“资源互补”向“科技赋能”升级。

第三，完善跨境粮食运输通道与配套基础设施。跨境物流基础设施是中俄粮食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的重要支撑。要深入推进“中俄新陆路粮食走廊”项目，借助区位优势促进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在边境口岸建设方面，则要继续完善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布局，增强口岸粮食接卸与中转能力。截至 2025 年 12 月，满洲里口岸已经具备了通过铁路、公路多通道进口粮食的能力，有 4 处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开通了粮食“绿色通道”。应进一步推广此类“绿色通道”模式至其他重点口岸，降低粮食进口成本，完善进口粮食监管网络。

第四，完善政府引导与服务保障体系。首先要持续提升各参与主体对跨境粮食合作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的战略价值的认知，把境外粮源基地建设纳入粮食保障整体布局。企业和各类经营组织是落实中俄粮食安全合作的最终落实主体，要常态化组织涉外政策培训，帮助各参与主体熟悉俄罗斯土地法规、海关检疫、投资监管等制度条文，做到依法合规经营。其次，引导企业开展深度实地调研，充分尊重两国产业政策、土地制度、民俗文化的客观差异，坚持生产管理本土化布局，合理吸纳本地劳动力，依靠本土化运营降低跨国合作风险。此外，还应加快培养跨境涉农复合型人才，扩大培训范围，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第五，共同主动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在逆全球化、气候多变和全球性危机频发等多重因素叠加下，全球粮食安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全球最具威望的农产品期货交易所，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掌握着全球农产品议价和定价主动权。中俄应协同推进粮食贸易的本币结算进程，搭建粮食供需信息共享与联合发布平台，将有利于推动构建更加稳定、透明的国际粮食定价环境。现有粮食治理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全球粮食供应链波动的影响。中俄粮食安全合作应不止聚焦于双边供需保障与区域协同发展，更应立足全球粮食安全大局，主动参与并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优化升级。积极参与完善更加公平、非歧视的国际粮食贸易规则，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使粮食安全真正回归其人道主义本质。

五、结　语

粮食是全人类生存的基础资源，当少数国家长期垄断供应链时，粮食极易成为国家间博弈的工具。大规模国际贸易的出现，首先是历史上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结果，而主导国构建的粮食体系又会强化这种不平衡。从第一代食物体制中英国对全球粮食贸易的主导，到第二代食物体制中美国的崛起与霸权更迭，是美国历经数十年的积累、创新与建设逐步完成的。全球粮食贸易格局的演变，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缩影。在这背后，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单极霸权体系日渐式微，而多极化、多中心的世界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表明：全球粮食贸易格局呈现出新兴势力崛起、竞争加剧、区域一体化趋势增强、粮食安全和贸易保护主义强化等新变化。进而可以归结为三大影响粮食安全的核心因素：权力结构的多极化，空间结构的区域化以及规则结构的政治化。

全球粮食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差异化作用于中俄粮食安全处境，同时也驱动了两国合作的开展。开启粮食安全合作，首先需要明确各自的粮食安全诉求、外部环境带来的机遇和约束。就中国而言，诉求集中于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与供应链的稳定；就俄罗斯而言，则重在扩大出口市场，并提升在全球粮食体系中的话语权。而外部环境中，多极化、区域化、粮食武器化倾向，构成了两国粮食安全合作面临的复杂现实。因此，两国粮食安全合作需要从应对短期风险转向构建长期稳定的协作体系，更进一步地携手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推动全球粮食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且严峻。霸权体系难以长久维系，多极力量竞合将成为未来全球粮食治理的常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掌控全球粮食贸易秩序，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置身于全球粮食体系之外。唯有坚持合作共赢，摒弃霸权思维，方能行稳致远。中俄共同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走向多边共治，不仅是保障两国自身粮食安全的现实需要，也是引领国际秩序走向更加公平、包容、合理的重要举措；既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的落实，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具体实践。

（**责任编辑**　杨　辉）

Аннот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 политика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Китая

Лин Шэнли

【**Аннотация**】В период «15-й пятилетки» на фоне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и, порождаемой стремительным развитием глубоких глобальных перемен, первостепен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задач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общества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в ближайшем окружении Кит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создаёт серьёзные вызовы для кита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регионах, что обусловлено такими факторами, как 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здесь крупных держав, переплетение «горячих точек» и блоков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В этих условиях Китаю необходимо объективно и взвешенно оценивать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ую обстановку в регионе, рационально планировать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цели, чётко определять свои интересы и применять адекватны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меры, обеспечивая тем самым научно обоснованное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и точную реализацию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го курса Китая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Регион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дипломатия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а, отношения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АТЭС, инициативы «Пояс и путь» и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Чжан Цзяньпин, Дун Цзянье

【**Аннотация**】На фоне ускор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разворота на Восток», фрагментации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рядка и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евразийских транспортно-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ая среда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ретерпела

существен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больше не следу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через призму роста двусторон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или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го 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я, вызванного санкциями; ег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в рамках многоуровневой сист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с опорой на такие форматы, как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АТЭС), инициатива «Пояс и путь» (ИПП) и евразий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сследуется, к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интегрировано в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механизмы различных уровней. Автор обосновывает тезис о том, что эти три типа механизмов выполняют различные функции: АТЭС служит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площадкой дл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открытого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ведения диалога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олитики 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о-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сферах, не затрагивающих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е вопросы; ИПП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инструменты, в частности, проекты и транспортно-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коридоры, охватывающие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у, энергетику,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цепочки,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переходы и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евразий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формирует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ля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меющего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о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и опирающегося на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ые коридоры,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рынки, участие третьих стран и гармонизацию нормативно-правовой базы. Научная новизна работы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интеграц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механизм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через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е разделение на «окно», «инструмент»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а не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ся простой оценкой отдельных механизмов или перечислением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данных о росте торговли.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усилия следует сосредоточить на детальной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действий в таких сферах, как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коридоры,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переходы, стандарты, платёжные системы,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цепочки и механизмы участия третьих стран. Подобные меры призваны снизить уязвимость, связанную с зависимостью от отдельных финансовых,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ли рыночных систем, уменьшить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 вследствие ге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фрагментации и внешне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давления, а также повысить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инклюзивность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ую согласованнос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в Еврази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решая задачи мест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облюдения корпоративных требований и управления рискам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нициатива «Пояс и путь», евразийск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АТЭС, интеграция в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механизмы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ежегодном конгрессе Ассоци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ША 2026 года: о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я

Юй Бинь

【Аннотация】 Куда движется этот неспокойный мир и каковы его истоки? Как позиционируют себя китайские и западные те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процессе д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истории и реальности? На ежегодном конгрессе Ассоци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ISA) 2026 года, проходившей в штате Огайо –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м «Ржавом поясе» – под девизом «Назад к основам: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 знаний, практик и образов мира», автор уделил внимание широкому спектру тем: от те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до 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частности, касающихся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а также ознакомился с множеством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х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Получив богатый материал для размышлений, автор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ощутил сложность и неразрешимость ряда проблем: «декитаизации»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в США; влияния расового фактора,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пособствующего разнообразию и ведущего к отчуждению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преимуществ» и трудностей, с которыми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учёны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взлёта, динамики развит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 англоязычных журналов, посвящённых Китаю и китайским диаспорам в англосаксонском мире; а также вопроса о том, чем является история – бременем или «первородным грехом» – или же, напротив, движущей силой и опорой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За рамками виртуальн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ISA существует реальность: китайские учёные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и изучают «Ржавый пояс» США и активн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уют с ним, вынужденно сталкиваясь при этом с жизнью, напоминающей сюжет книги «Элегия Хиллбилл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союз с Россией для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Китая, «обеление», дискурсивный «железный занавес», назад в будуще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логик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глобальны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держав, а также ключев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ландшафте Африки

Чжао Ятин

【Аннотация】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всё активне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ется на Африку; однако эволюцию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ландшафта континента уж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объяснить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через призму эт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Примечательно, что Россия сумела утвердить своё влияние в ряде регионов в масштабах, несоразмерных её совокуп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ощи, опираясь н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обороны, риторику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гибк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нёрства. С начала 2020-х год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ландшафт Африки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четырьмя ключевыми тенденциями: ростом автономии, углублением фрагментации, перестройкой систе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возрастающ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значимостью ресурсных коридоров. Опираясь на существующ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свящённы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у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у порядку, африканской автономии и сетевой мощи, автор статьи декомпозирует понятие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ландшафте на четыре показателя: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формировать повестку дня, мобилизовать ресурсы,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региональную трансляцию влияния и выступать триггером изменений ландшафта. В работе предложена аналитическая модель, базирующаяся на сочетании «четырёх тенденций, трёх типов акторов и четырёх видов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На примере конкретных кейсов – таких как вступление Африкан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Группу двадцати» (G20), кризис в Сахеле, комплекс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егионе Красного моря и Восточной Африки, а также проект «Коридор Лобиту» -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доминирующие силы и механизмы их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 различ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ландшафта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ландшафте Африки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единого, неизменного доминирующего актора; напротив, этот ландшафт формируется благодаря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ным ролям, которые играют глобальные державы и вне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силы,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державы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а также ключев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бладающие различными типами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Глобальные силы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отвечают з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и мобилизацию ресурсов;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силы способствуют трансляции влияния и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рядка; а ключев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ыступают триггерами изменений ландшафта, контролируя сфер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есурсы,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коридоры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узлы. Различны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ландшафтам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т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е сочетания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и форм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при этом ориентация на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ю и сложны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определяют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ую логику эволюц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ландшафта Африк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ландшафт Африки, ориентация на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ю,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порядок, ключев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Франции и России в секторе критически важных минералов в Африке на фоне реструктуризации глобальных цепочек поставок

Чжан Цзянь, Ян Жунь

【 Аннотация 】 Глобальные цепочки поставок стали ключевым элементом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и Африка – благодаря своим обширным запасам критически важных минералов, таких как литий, кобальт и уран – оказалась в центре этог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Франция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обладает влиянием в регионе,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Россия, обладая советским наследием, выступает в роли крупной державы, чьё влияние здесь неуклонно растёт. На фоне обострени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и повыш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значимости африканских ресурсов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между Франц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в сфере критически важных минералов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смещением баланса сил: влияние Франции ослабевает, а влияние России усиливается. Эта тенденция прослеживается на корпоративн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ем уровнях – в таких сферах, как права на добычу полезных ископаемых, логистика, преференц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онтакты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и развит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механизмов; здесь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Франции утрачиваются, тогда как потенциал России в област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её влияние неуклонно расширяются. В основе этого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лежат такие факторы, как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травма колониального прошлого,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и влияние ресурсной мощи на цепочки поставок критически важных минералов. Данн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не только ускоряет перестройку цепочек поставок, но и повышает автономию и переговор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африкан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оно усиливает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вропой, усложняя процесс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перехода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ремитель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глобальных цепочек поставок критически важных минералов привносит новые переменные в развитие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го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и открывает перед африкан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конкуренцию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для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и развития. Анализ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Франции и России в Африке даёт цен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для Китая, помогая ему формировать более рациональную и эффективную политику в отношении этого континент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еструктуризация глобальных цепочек поставок, критически важные минералы, глобальный Юг,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ЕС, российско-аф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ов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труктуре мировой торговли зерном и их влияние на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фере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Цзян Чжэньцзюнь, Кан Иин

【Аннотация】На фоне масштабных глобальных перемен, не имеющих аналогов за последнее столетие, структура мировой торговли зерном претерпевает глубокую и радикальную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ю. Опираясь на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одходы, характерные для теори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х режимов и геоэкономики, авторы выдвигают три гипотезы и используют методы анализа социальных сетей для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я торговых связей по трём основным видам зерновых культур — пшенице, кукурузе и рису — за период с 2000 по 2024 год с целью проверки этих гипотез.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выделены три ключев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в сфере мировой торговли зерном: стремительный рост числа новых стран-экспортёров на фоне обострения рыночн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углублен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а также расширение проблематик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опровождающееся повсеместным усилением торгового протекционизма во мно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Также определены три основных фактора, влияющих на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многополяризация структур власти, регионализация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ых структур и политизация структур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Эти факторы оказали различ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ситуацию с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в Китае и России. Выявив различия в

ключевых потребностях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в сфере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авторы анализируют логику их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этой области, обусловленную указанными факторами: взаимодополняемость спроса 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создаёт рыночную основу для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процессы регионализации открывают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для повышения качества и уровн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нарастают внешние риски и усиливается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 С учётом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и ограничений, характерных для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сфере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статье предложены пути реализаци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 новых условиях; результат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ризваны послужить ориентиром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а также для поиска путей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сети торговли зерном,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Abstracts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in Northeast Asia and Chin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Ling Shengli

【**Abstract**】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mid growing uncertainty brought about by accelerating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dvancing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mong neighboring countri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Northeast Asia pos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its neighbors due to the convergence of major-power interests, the interweaving of regional hotspots, and intensifying bloc confrontation. Against this backdrop, China should make an objective and prudent assessment of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in Northeast Asia, formulate appropriate diplomatic objectives for the region, clearly define its regional interests, and adopt suitable strategic instruments, so as to ensure more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precis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Northeast Asia.

【**Key Words**】Northeast Asia, Diplomacy toward Neighbors, Major Country Relations, China-U.S. Relations

The APEC,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Eur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A Functional Comparison

Zhang Jianping, Dong Jianye

【**Abstract**】Russia's accelerating "pivot to the East", the region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landscape,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rans-Eurasian connectivity have significantly reshaped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China-Russi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should no longer be understood solely in terms of bilateral trade expansion or short-term substitution under sanctions, but rather as part of a multi-layered regional cooperation architecture. Focusing on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nd Eur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China-Russi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is embedded in regional mechanisms with differentiated functions. It argues that these three mechanisms have different functions. The APEC primarily serves as a window for engagement with the wider Asia-Pacific economy by facilitating policy dialogue and relatively low-sensitivity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The BRI

functions mainly as an instrument, providing projects and corridor-based mechanisms through infrastructure, energy cooperation,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border-crossing facilities, and subnational cooperation. Eur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stitutes a broader institutional space based on continental connectivity, regional markets, third-country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regulatory regimes. The article therefore proposes a "window-instrument-space"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gional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of China-Russia economic cooperation. This perspective moves beyond evaluating individual mechanisms in isolation or simply documenting the expansion of bilateral trade. Looking ahead, more institutional alignment should be pursued in areas such as transport corridors, border infrastructure, technical standards, payment systems,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and mechanisms for third-country participation. Such coordination can reduce structural dependence on single financial, technological, and market systems, mitigate the risks generated by geoeconomic fragmentation and external economic coercion, and strengthen the resilience, inclusiveness, and institutional coherence of Eurasian economic connectivity,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local development, corporate compliance, and risk governance.

【Key Words】 China-Russia Economic Cooperati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ur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APEC, Regional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The 2026 ISA Convention: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s – 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rea Studies

Yu Bin

【Abstract】 The 2026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 convened in March against a turbulent global backdrop – wars in Ukraine, Gaza, and Iran; the meteoric rise of AI; and a rapidly shifting socio-political landscape, particularly in the West. Under the theme "Back to the Fundamentals," ISA scholars tried to deconstruct the diverse world of myths and chaos, generating a wealth of new ideas and hypotheses even as they left more questions unanswered. Beyond my own IR/Russia focus, I was drawn to a host of provocative topics: pluriversal IR theory, "whiteness" and "decoloniality" in world ordering,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s, the politics of IR and area studies journal editing, the "eclipse" of Chinese identity in U.S.-based China studies, and the varied uses of history – burden, endpoint (Fukuyama), or as a path forward (a "back to the future"?). Beyond the ISA itself, the American heartland witnessed significant shifts in US-China relations over the past 50-plus years: from a pioneer for scholarly exchanges (Dayton's Kettering Foundation), followed by a

bittersweet manufacturing hub (Fuyao), now to a grave new world of the rise of far-right forces across small towns plagued by Hillbilly Elegy.

【**Key Wor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a studies, reverse Nixon, "whiten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S' ideational iron curtain, back to the future

The Logic of Interaction among Global Powers, Regional Powers, and Key States in Africa's Political Landscape

Zhao Yating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global power competition has increasingly extended into Africa. Yet the evolution of Africa's political landscape can no longer be adequately explained through a single logic of great-power rivalry. Russia, for example, has developed a level of influence in parts of Africa that is not entirely commensurate with its overall economic strength, relying on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sovereignty-centered narratives, and flexible political partnership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Africa's political landscape has exhibited four major trends: rising autonomy, deepening fragmentation, the restructuring of security order, and the increasing prominence of resource and corridor politics. Building on existing scholarship on great-power competition, regional order, African agency, and network power, this article disaggregates influence over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into four analytical dimensions: agenda-setting capacity, resource-mobilization capacity, regional transmission capacity, and landscape-triggering capacity. On this basis, it develop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four trends–three types of actors–four capacities". Drawing on four cases, namely, the African Union's accession to the G20, the Sahel crisis, the Red Sea-East Africa security complex, and the Lobito Corridor,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dominant forces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s operating across different political settings. It finds that changes in Africa's political landscape are not driven by any single or fixed dominant actor. Rather, they result from the differentiated roles played by global powers and other external actors, regional powers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key or nodal states across distinct dimensions of influence. Global actors primarily exercise influence through agenda setting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regional actors perform functions of regional transmission and order coordination; and key states shape broader political configurations by controlling critical nodes related to security, resources, transport corridors, and institutions. Different political settings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capabilities and modes of influence. Differentiated dominance and complex interaction therefore constitute the fundamental logic underlying the current transformation of Africa's political

landscape.

【**Key Words**】Africa's Political Landscape, Differentiated Dominance, Great-power Competition, Regional Order, Key States

France-Russia Competition over Critical Minerals in Africa amid the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Zhang Jian, Yang Run

【**Abstract**】At present, global supply chains have become a core arena of major-power competition. With abundant reserves of critical minerals such as lithium, cobalt, and uranium, Africa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rivalry. In Africa, France retains traditional influence, while Russia combines inherited Soviet-era legacies with a growing contemporary footprin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tensifying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he rising strategic value of African resources, competition between France and Russia over critical minerals in Africa has increasingly displayed a pattern of declining French influence and expanding Russian influence. This trend is evident at the corporate, governmental, and regional multilateral levels, particularly in competition over mining rights,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preferential policies, high-level political excha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France's traditional advantages and influence are gradually weakening, whereas Russia's cooperative advantages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continue to expand. The underlying drivers and strategic calculations behind France-Russia competition for Africa's critical minerals mainly include 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of colonial historical trauma, the geopolitical spillover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and the resource-power effects generated by critical-mineral supply chains. Their competition in Africa is not only accelerat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critical-mineral supply chains, but also enhancing the autonomy and bargaining power of African stat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ntensifying Russia-Europe geopolitical rivalry and increasing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European Union's energy transition. The accelerating reconfiguration of global critical-mineral supply chains adds new dynamics to the evolution of a multipolar world order and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African countries to leverage major-power competition in pursuit of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France-Russia competition in Africa therefore offers useful implications for China in formulating a more balanced and effective Africa policy.

【**Key Words**】Global Supply Chain Restructuring, Critical Minerals, Global South, Russia-Europe Relations, Russia-Africa Relations

New Changes in the Global Food Trade Landscape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hina-Russia Food Security Cooperation

Jiang Zhenjun, Kang Yiying

【**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found global transformation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global food trade landscape is undergoing far-reaching and rapid restructuring. Drawing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s of food regime theory and geoeconomics, this study develops three hypotheses and employ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construct trade networks for the three major staple grains, namely, wheat, maize, and rice, from 2000 to 2024 in order to test these hypotheses. The study identifies three major new changes in the current global food trade landscape. First, emerging food-exporting countries have risen rapidly,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in global markets. Seco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food trade has strengthened significantly. Third, food securit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liticized and securitized, accompanied by a widespread expansion of trade protectionist measures across countries.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further identifies three core factors shaping global food security: the multi-polarization of the power structure, the regionalization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rule-based structure. These three key factors have exerted differentiated effects on the food security situation of China and Russia. After clarifying differences in the two countries' core food security interests and priorities, the article further explores the logic of China-Russia food security cooper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se structural changes. Supply-demand complementarity provides a solid market foundation for bilateral cooperation; the growing trend toward regionalization creates opportunities to upgrade both the quality and scope of China-Russia food security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rising external risks and increasing uncertainties impose new constraints on such cooperation. In light of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facing bilateral food security cooperation, the article proposes practical pathways for China and Russia to deepen cooperation amid changes in the global food trade landscape. It seeks to provide policy and analytical insights for the continued advancement of China-Russia food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for exploring possible reforms of the global food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Food Security, Food Trade Networks, Geo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国际组织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一、来稿须知

1. 请使用信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传真：021-62238113。

2. 来稿字数 1.5 万—2 万字，需有 300-500 字的内容提要，3—5 个关键词。

3.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4.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二、注释示例

1. 中文文献

（1）著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6 页。

（2）期刊文章：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8 页。

2. 英文文献

（1）著作：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期刊文章：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8.

3. 俄文文献

（1）著作：Замятин Д. 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期刊文章：Лукьянов 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16. №2-3. С.175.

完整版本请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s://rus.ecnu.edu.cn/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俄羅斯研究（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6 年第 5 期（总第 261 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刘　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9 771009 721265 10

公开发行

定价：30.00 元